

湖南文史资料

第29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

第29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原 陈永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

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0,000
印数：1—11,000 定价：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011

●主 编 田伏隆

●责任编辑 高原 陈永芳

湖南文史资料

19188

目 录

(总第29辑)

企 业 沧 桑 录

- 我所知道的湖南省祁阳观音滩煤矿.....龙孔彰 (1)
湖南工矿业之回顾.....范澄川 (7)
“裕湘”的缔造与恢复.....聂光增 (21)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的水口山.....周怒安 (33)

名 人 与 实 业

- 陈渠珍与湘西实业.....陈桐初 戴亚东 (42)
唐伯球在实业界和军政界的经历...唐鸿钧 章劲柏 (53)
我的父亲段楚贤与锡矿山锑矿业.....段吉璋 (58)
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美籍华裔李国钦.....章执中 (75)

公 路 史 话

- 我所知道的湖南公路建设.....马成然 (81)
张叙丞与湘黔公路.....张远翊 (99)

金 融 与 贸 易

- 战时湖南省银行的片断回忆…………… 黄震德 (103)
复兴银行简史…………… 江文觉 (110)
薛岳筹办湖南省贸易局的内幕…………… 肖伯麟 (113)

工 商 人 物 自 述

- 我在工南新闻两界的经历…………… 蓝肇祺 (118)
沧桑五十年…………… 曾诚意 (131)
经营航运六十年…………… 胡德初 (143)
七十年来的回顾…………… 王悛端 (151)

难 忘 的 旅 程

- 记长沙市工南界1950年北上参观团…………… 黄曦龄 (157)

西 方 经 济 渗 透

- 清末日本对湖南的经济侵略…………… 彭国兴 (165)

特 载

- 我们所知道的刘廷芳先生…………… 蓝肇祺 朱曙永 (195)
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
——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 刘廷芳 (199)

我所知道的湖南省祁阳观音滩煤矿

龙孔彰*

湖南省祁阳观音滩煤矿（以下简称观矿），自1930年开办至1955年停办，为期20余年。它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三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北煤不能南运，粤汉、湘桂两铁路迫切需要铁煤，加之沿海内迁的工厂云集在祁阳及湘江上游城镇，需煤更多。观矿处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因而有了较快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全矿职工积极保护矿山，使之免遭破坏，为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

本文侧重记述观矿生产建设方面的始末。

一

观矿位于祁阳县东南部，距县城陆路10公里，水程上溯15公里，距湘江边凤凰滩码头1公里，上游至湘桂铁路黄阳司车站，水程45公里，至黎家坪车站陆路33公里，交通运桂尚称方便。

观音滩自清朝末年就有小煤窑开采。至1930年10月，收归湖南省建设厅官办，为当时省办四个煤矿之一（其他三矿是：醴陵石门口煤矿、湘潭云溯煤矿、宁乡清溪煤矿）。

1943年11月，湘南省政府与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合办湘南实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四矿归其管辖。抗日战争胜利后，公司撤销，由省建设厅接办。

* 龙孔彰曾任观音滩煤矿副总工程师。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观矿由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工矿处接管。1950年，观矿属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业厅。1951年，观矿隶属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煤矿总局。1955年停办。

二

解放前，观矿设工程处，全称是湖南省建设厅观音滩煤矿工程处，属湘南实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管辖后，改处为局，但不久仍恢复工程处，解放后改称湖南省祁阳观音滩煤矿。

在工程处时期，设处长、总工程师，下设总工程师室、工务课、营运课、会计课、福利社、矿场和矿警队。课下设二至六股，社下有职工子弟学校、医院、俱乐部和供销社。矿场有杨柏冲、水龙皂和九丘田三矿场，解放后曾设福祁矿场。

军管时期，除增设军管机构外，其余机构未动。

在此矿的重建时期，成立了中共湖南省观音滩煤矿委员会，设党委书记，领导全矿工作，行政系统除处长改为矿长外，其余组织机构也基本上未变。

职工人数据1947年12月统计：职员82人，工人1,224人。

历届负责人（先后为序）为：

处长：谭伯强、范柏年、陶勋（时范柏年改任总工程师）；

局长：白深耘（系醴陵煤矿局局长兼任，范柏年任总工程师）；

处长：范柏年（兼总工程师），解放前夕增设副处长，由王北海（原任杨柏冲矿场主任兼工程师）担任。

解放后：

军代表：田光；

党委书记兼矿长：戈楷（即毛泽普）、林春、赵福云；

总工程师：范柏年（1950年调湖南煤矿总局工作）。

三

观矿矿区范围：解放前以花山岭至陶家堰为第一矿区；陶家堰至南仙观为第二矿区。解放后经过勘探，略有变动，西北起自段家冲，东南止于长塘煤矿第19号断层，划分一、二、三井田，南北走向长约9公里，东西宽约0.5至1公里，含煤面积约5平方公里。

观矿地层成煤时代系中生界三迭系至侏罗系，含煤10层，其中有4层为主要可采层，俗名大槽炭、棚皮炭、两夹炭、沙河炭。煤层不稳定，呈鸡窝状，厚度变化大，最厚达20多米，薄至不可采，一般为0.3至0.4米。牌号为一号煤与气肥煤。煤质系中至高灰、中硫、低磷。

1930年10月，省建设厅设处开办，先以整修原九土窑为主，月产煤1000至2000吨。1937年9月，省建设厅拨款扩大建设，收购了商办人和公司的矿区及设备。次年增拨投资购置机械设备，开凿水龙皂第一直井（1942年7月被淹），后又陆续投资。1940年10月，开凿杨柏冲斜井，继而收购商办李家山斜井，并入杨柏冲矿场，另在水龙皂开凿第二直井及斜井各一处。1946年11月，收购商办德荣公司九丘田矿区，开凿九丘田斜井。到1949年解放时止，计有杨柏冲、水龙皂和九丘田三矿场。解放后，原私营福祁煤矿（系范柏年等人合股开办）交给观矿经营，增设福祁矿场。

解放前生产机械全系蒸汽设备，主要是蒸汽泵排水和蒸汽绞车提升。全矿有锅炉19台，计800匹马力；水泵30台，计700匹马力；绞车6台，计230匹马力。主要设备合计1730匹马力。矿部设有机修厂，担负大、中修及生产机器零配件任务，各矿场设有机修车间，担负小修任务，并自备40千瓦直流发电机发电，作照明之用。1950年开始建设火电厂，1952年

建成发电，装机容量为560千瓦（300、100、160千瓦电机各一台），输送电压为2,300伏。

解放前，井下采掘全靠手镐、手锤、明火爆破和人力运输。解放后，由于新建了电厂，增添了电动压风机，逐步改手镐、手锤为风镐风锤，排水通风亦换为电动设备。当时采煤一般采用房柱法与高落式采煤法。解放后，改革旧采煤法，根据煤层条件，推行水平分层采煤法或倒台阶采煤法，全矿平均年产原煤36,000余吨。

地面煤炭运输，自井口至河栈采用轻便铁路、V型矿车、人力推运，下河装船。然后水运至沿河一带工厂和湘桂铁路黄阳司车站，装火车外运。

1944年9月，观矿沦陷，全矿机械设备、器材、房屋等均被日军破坏，矿井淹没。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振旗鼓，恢复生产。

1947年，水龙皂井下发生火灾，为了抢救职工生命和国家财产，工程师郑伯乐、工程员方密等7人牺牲，为观矿历史上最大的伤亡事故。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范柏年处长为之立碑纪念。

四

1949年9月，祁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观矿进行了“保厂护矿”活动，当时地下党成员互不相识，人数多少也不清楚，有的成员是解放后公开身份才知道的，如邓英华原系河栈职员，早就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成员由于某种特殊关系，当时就知道，如笔者所知，当时地下党成员郑昌颜（祁阳观音滩附近人），负责冷水滩、黄阳司、祁阳县城、观音滩、白水等沿河一带的“保厂护矿”工作。他曾多次奔走沿河一带厂矿，秘密策划，由于笔者与郑昌颜系广西大学同学，且交

情莫逆，故他来观矿时，必住笔者家，密商护矿事宜，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三原（原职、原薪、原工作）政策”，号召职工安心生产，保护国家财产，不要破坏矿山，不要惊慌，不要撤离岗位。还宣传共产党坚持一夫一妻制，不要轻信“共产共妻”的谣言等。这些传单，清晨在办公室、宿舍及其他公共场所都能见到。事实证明，这些传单教育了广大职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在枪声四起的夜间，或在国民党残部撤退时围缴矿警队枪支的战争状态中，全矿职工都能坚守工作岗位，照常生产，秩序井然，直至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工矿处负责人梁春阳到矿接管和以田光为首的军代表进矿领导为止。

观矿在解放前夕能出现“照常生产、秩序井然”的局面，固然这是由于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也与范柏年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是分不开的。范在主持观矿期间，曾多次拒绝国民党和三青团进矿开展活动，矿警队枪支被国民党残部缴去后，范组织矿工保卫矿山，并预见到解放前后新旧（政府）不接的真空时期会产生混乱，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这些都是稳定局势的因素。

解放后，全矿职工及其家属都被发动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迫、剥削工人的把头统治，改革了旧的管理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主管理制度，废除了工程处的旧体制，建立了祁阳观音滩煤矿新机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当家作主，民主管理矿山，使生产力大大得到了解放。

观矿在解放前后虽经20多年的经营，但一直没有进行地质勘探，因资源不清盲目开采，后从生产实践中察知，煤层不稳定，除煤包外一般系极薄煤层，开采经济效益差，九丘田斜井于1950年至1951年上半年由此而关闭，尤其是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湘江洪水常常倒灌，成为矿坑充水之严重威胁。如1942年一直井就因湘江洪水倒灌民家湾小溪，鼓穿老窿面被淹

的，加之壶天灰岩含水层，岩溶发育，且有小断层使之沟通，与湘江有密切的水力联系，有的地段，煤层直接与壶天灰岩接触，成为矿坑底板突水的主要威胁。如1953年杨柏冲就因此而被淹井。基于上述原因，上级决定停办。水龙皂二直井和斜井于1953至1954年上半年关闭，福祁直井也于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关闭，全矿职工及机器设备先后调往其他国营煤矿，最后一批人员于1955年5月初调离。

五

有两件事不可遗忘：第一、观矿规模不大，年产原煤几万吨，全矿职员不过百来人，却安置了大学和中专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30余人，与当时同类型企业比较，可谓多矣。自1951年九丘田矿场结束至1955年全部结束期间，工程技术人员陆续调往省内其他国营煤矿（包括石墨矿）、矿务局、省煤炭工业主管部门，个别调往省外，这些人多成为技术负责干部或技术骨干，不仅工程技术人员如此，而且经济工作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全矿职工经过调动亦遍及省内外煤矿企业（主要在省内）和煤矿领导机关，他们积极发挥专长，努力工作，为我省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二、观矿职工子弟学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范柏年任处长时，兼任校长、亲自抓教学，严格选聘师资（教员多系省城师范学校毕业）。为了不使适龄儿童失学，4个学生也开班，成绩不及格者，降级，这个班最后剩下一个学生毕业。因学生素质好，升学率高，被誉为祁阳县第一流学校。学校还有一条制度，本矿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外出升学的，享受公费。建国前一般企业中，职工子弟能享受此优惠待遇的，为数不多。

上述二事，是与矿领导人范柏年一贯重视培养人才分不开的。（祁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湖南工矿业之回顾

范澄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东北的大好河山，这对华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我在北平工作，认为日军魔爪必有伸入山海关内之一日。为了免于当亡国奴，我曾几度筹划南归，迄无成局。1933年春，湖南省建设厅长余籍传来电相邀，实遂我心，乃不问工作性质，毅然首途，返湘后，即主持湖南公矿矿产营业处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13年间，我一直在湘、桂、川三省从事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

一

湖南省有色金属的蕴藏量十分丰富，到处都有开采。民元以后，私营矿业，归实业厅管辖；公营厂矿，则设矿务总局统一管理。后来，总局被取消，各厂矿改由建设厅领导，这种改变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各厂矿各自为政，富裕的单位，月计有余，不免随意开支，造成浪费。品位比较低的矿山，则经常负债，无力调整与扩充，终年向省厅要求补贴。其次，每一单位，都在省城设立办事处，人员配备少则二三人，多至十余人，纯属不必要的开支。其最重要的是省厅对于各单位的生产实况，不能掌握，也无法领导，形成无政府状态。为解决这些问题，省政府决定在建设厅下设置公矿矿产营业处，规

* 范澄川自1933年至1946年曾任湖南公矿矿产营业处负责人、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川湘盐运处负责人等职，现为国务院参事。

定所有各厂矿的产品，统由该处负责经销，各单位按月造具预算，由该处审核发放经费，这样统筹全局，既能节省经费，又能哀多益寡，互相调剂。行之有年，确见成效。我接管该处事务后，率由旧章，只因当时多数厂矿不景气，不得不经常向银行借贷，不免有捉襟见肘、绌短汲深之虑。

水口山所产铅锌矿砂，含量丰富，其中还可提炼出少量金银。湖南原有炼铅厂一所，1934年，饶澍工程师试制成了高温罐，因而增设了中国唯一的一所炼锌厂。这两个厂的设备能力不能消化水口山的全部矿砂，每当累积了相当数量时，就须运销国外。可是铅锌矿砂，属于战备物资，不许资敌。当时国内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运销日本，悬为厉禁。对于出口商人来说，日本一衣带水，运费比远销欧美要少得多，所以要牟取厚利，唯有偷运日本。前任建设厅长谭常恺，正是因为疏于防范，以致一批铅锌矿砂被奸商私运日本，招致各方的指责而下台。前车之鉴，引起我们的警惕。

1934年出售的一批矿砂，总数为2,000余吨，由矿产营业处经手标卖。在招标时严格规定：所有投标的中外商人，一律向中国银行缴纳规定的保证金，如经查明运往日本，即没收保证金作为罚款。矿砂运到欧美或美洲某一商埠后，除取得当地海关公文外，还要向该埠中国领事取具签证。这次投标，中国有三个进出口公司（张铭西主持的中央贸易公司、贺邨候主持的升华公司、罗筱玉主持的同昌公司）；外商只有英商安利洋行，该行资金雄厚，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数百处，在长沙也有分行。它声称投标，而不按规定向中国银行缴纳保证金。某日该行经理送来一封私函，是中国驻德大使刘文岛写的（刘在大革命时期和我认识，那时他任唐生智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信中证明安利洋行投标购运这批矿砂，经他调查，确保运销欧洲，希望我加以关照。我对该行的长沙经理黄伯昂

说，不要走后门，要遵守规定，该行最终没有诚意，我们取消了它的投标资格。可是该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另以陆可记名义，按照规定缴纳了保证金，取得了投标权，开标后，它的标价特高，一眼就可看出是存心运往日本的，我们没有受骗，又取消了它的中标资格，而由履行规定的本国三家公司，共同协商出一个合理价格，标购了这批矿砂。安利洋行怀恨在心，便在汉口英文《楚报》上刊登一条消息，诬蔑我和营业处负责人李介候受了三家公司的贿赂云云。

事有凑巧，湖南公路总局拟招标购进载客卡车40辆，由建设厅设立采购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该会的成员，料知安利洋行定来投标。因此将该行侮辱我们的经过告诉了大家，于是群情激愤，商定该行如来登记，一定让他先来见我，把问题说清，经我首肯，才让它投标。某日，该行长沙经理求见，我指定他们的汉口经理（此人兼任某国驻汉领事）在指定的时间来长沙矿产营业处亲自当众向我和李介候道歉。那天他是由黄伯鼎陪来的，我询明姓名，确实无误，他一见面，声称前次冒犯确属错误，希望原谅。我质问他：“那次投标，你们向银行缴纳保证金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他：“不纳保证金，能投标吗？”他说：“不能。”我又问：“陆可记和你们是一家吗？”他说：“不是。”“那么，为什么你们在英文《楚报》上替他说话呢？”他语塞。一口赔不是。我告诫他：“我们并不希罕你们的高价，也不看重你们的保证金，面是不准把我们的矿砂卖给我们的敌人，所以取消了它的中标资格，你们没有达到目的，就在英文《楚报》上对我们进行人身侮辱，你们以为我们不能奈何你们，那就较量较量吧，湖南今后的进出口贸易，安利就休想问津了！”他再三赔不是。这时，处内同仁听到有外国人来赔罪，认为是破天荒的大事，顿时拥来旁听，我看事已至此，可以适可而止，才打电话通知采购会，接受该行投

标，打发对方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产锑量占世界总产量80%以上，当时湖南华昌公司在上海、纽约、伦敦都设有办事处，随着战争的加剧，锑价不断上涨，获利倍增。为了防止别国夺取市场，我们有时故意压低价格，以提高竞争能力。为了未雨绸缪，在平常时期营业顺利的时候，锑业同仁议定从自己产品每吨价款内抽出若干，设立保证金，交锑业公会储存，以备在压价低于成本时作为补贴。因此，1934年世界锑价每吨稳定在150元左右（合我国当时银元）。但不久，长沙市场忽然无风起浪，经过投机商人哄抬和幕后操纵，不过两个星期，锑价抬到650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锑业公会有人违背初衷，宣称为稳定市场起见，从锑业公会所储存的保证金中，提出若干万，将市场所有现货，用每吨600元的划一价格，尽数收买。这样一来，保证金的大部份就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从外表上看来，这一举措似乎是权宜之计，其实这是某些人的预谋。几位颇有实力的官商人物，早就觊觎这笔闲置的巨额保证金，在风平浪静时期，他们不动声色地陆续抓进一批现货，在哄抬价格的时候，他们也装腔作势地抢购期货，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正是因为锑业工会存有大笔保证金，他们有权处理这笔巨金，这些人每人所囤积的现货或期货，一般都在100吨以上，到了锑价涨无可涨，势将下跌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职权，不择手段地把锑业经营者长期点滴集聚的保证金，掠夺一空。

二

1933年，省政府因湖南第一纺织厂所产纱布成本高于省外产品，形成滞销状态，乃采取地方主义，除停止向国民政府财政部缴纳统税外（每件纱7.3元），并在岳阳城陵矶设所管理进口棉

纱，按照省内外棉纱差价，抽取平衡税若干元，使纺织厂纱布能在市场立足，同时还靠此增加省库的收入。

在湖南农村，织布是一种副业，由于只能买到高价的纱来织布，成本偏高，不能同外省布匹竞争，因而大批停织，仅就长沙东乡而言，就有四五千家不闻机杼之声了。为了保全一个厂，不仅使人民衣着费用增加，而且冲击了农村的副业生产。能明察秋毫，却不见舆薪，昔之为政者，多坐此病。所以我在1937年纺织厂情况好转之后，曾向建设厅建议，取消这个病民的管制办法。但没有被当权者采纳。

1935年5月，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章勤济病危。省府会议通过决议，由我接任。这个厂开始时的规模是4万纱锭，20年代又增加了1万纱锭和250台纺布机，每一次变动，就增加一批工人，完全是一所官办工厂。我再三思量：大家把这个厂交给我办，是信任我，是要我把厂办好，不是要我来做官。有了这个前提，凡是有利于厂者，我就做，否则我就不做，决不计较个人荣辱，不顾及个人利害。我在该厂两年多，作风可能严肃了些，我当时的姓名是范新度，有人谐音叫范心毒，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我不以为忤。不过一年，厂子就扭亏为盈，而且能够使工人分到红利，进而还想与中国银行合作兴建第二个厂。

当省府通过任命我为该厂厂长的消息传出后，各方推荐职工的函件，如雪片飞来，建设厅长余籍传，也开了一张10来人的名单，要我录用，我当面说明，除随前厂长一同去职的缺额，我已有适当的人选可以递补外，决不再增一人，他认为理由充足，撤回名单，并告我，何主席的夹袋里还有不少人，要我注意。我有了思想准备，因而在与何见面时说：“所有工作，只要按照正确的计划实行，就能作出成绩。只有一件事，我觉得难于处理。”他问什么事？我说：“是人事，这个厂坐

组织过于庞大，裁汰还来不及，何能添人？这几天，省府和各厅的科秘人员，给我来了上百封介绍信，他们是上级机关，今天我不应所求，将来就会有寸步难行之日。”何键听罢，沉吟一阵，便叫我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说明原委，一概谢绝。这样，何键自己夹袋中的名单，就无法出笼了。我离开的时候，他竟一破惯例，送我到门口，然后囁嚅地对我说，他在汉阳驻军时，所办训练班中，有一个姓黄的学生，现在纺织厂任副警卫长，希望我保留，我风闻此人有问题，答应看情况再说。6月1日接任那一天，我下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开除这个黄某。站在我身边的总务课长吴宗伯和技师张燧农等苦苦求情，我坚决不允。我告诉大家：“纺织厂每月发放工资两次，每逢这个日子，厂后银盆岭，就大开赌局，上自湘潭、下至霞凝，流氓赌痞，蜂拥而来，工人们辛苦得来的工资，大部分被他们囊括而去，而这个黄某，正是赌局的后台！他有恃无恐，坐地分赃，因此，不把他铲除，就不能刹住赌风，保障工人利益。”三天之后，省府秘书长易书竹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忘记了何主席的嘱托？我说没有，便将开除原因告诉他，说这正是顾全何主席的名誉，请他代为转达。无私才能无畏，这是我到纺织厂的第一天所做的第一件事。

湖南纺织厂每年暑期放假，工人回家，只有保全部工人留厂修理机器。回家工人希望缩短假期，早日回厂，为了提早完成修理工作，我们与工会商妥，保全部工人每日延长工时半小时（原为10时半，延为11小时），不料暑期第一天开工的早晨，忽报保全部工人罢工，一小时后才复工。经查明罢工系工会组织的，我根据蒋介石不准罢工的禁令，开除了四个工会理事。工会策动长沙各行业的10余名负责人，一同到厂要求收回成命，而我坚决不同意。

这个厂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工人太多，同样规模的

厂，有目前人数的一半就足够了，所以作适当的裁汰是必要的。经与技术人员商议，据云其中有500余人，进厂较晚，技术不够熟练，可以黜退。当时我们也曾考虑把两班制改成三班制，这可以不裁人，但当时的中外纱厂，都是两班制，我们不能独异。在此以前，天津宝成三厂，曾一度改作三班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我们这个落后厂，何敢轻易学步？同时有许多工人住在山后农村，有的距厂十余里，做三班时，有一班必在黑夜交接，女工上下班是有顾虑的，所以断然忍痛，采取精简办法，在暑假后开工时，就没有通知这500人来厂上班，让这么多人失业，这是我一生中碰到的不想做而不能不做的事。我嘱咐人事方面，把被裁的工人住址保留，考虑以后办新厂时，把他们召回来。后来我在常德筹设衡中纱厂时，首先想到了这批工人，后因日军深入，未能遂愿。

我接任三个月后，会计给我送来一张2万元的支票，说是厂长的份内收入。我问款从何来，他说是棉花磅余款，每季约2万元，全年共约8万元，例由厂长收纳。我寻思棉花进仓和入厂，份量并无变更，只因经过看磅人一压一抬，便创造了一份财富，结果是亏了工厂，肥了厂长。我当即通知会计主任周永年把这笔款记入公帐，并备文到建设厅。揭开这一黑幕，从而取消了这一恶例，健全了原材料的管理制度。

这个厂生产的棉纱，绝大部分是16支，每天不过80余件，根据纱锭的生产能力，日产还应大大提高。产量不高的原因，除技术管理方面还需要改进外，其最大症结，还在于设备方面的缺陷。

通常纱机配备，每1万纱锭，须配梳棉机40台。本厂5万纱锭，应有梳棉机200台，当时只有160台，整整少了40台，因而形成了瓶颈，大大影响了产量。我出了问题，我们就请建设厅向省府提案，在车间面积许可的限度下，向国外增购梳棉机

35台。当时某些省府委员怀疑我别有用心，第一次会议竟没有通过，在第二次会议上，经我列席说明，并保证增加生产，才得以通过。不久补充了梳棉机，产量就提高到了每日150件，出现了盈利局面。

1936年，我去上海，看望了我在宝成一厂的同事李云生先生，他是宁波人，在民国元年筹备湖南第一纱厂期间，吴作霖任总办，他以内行身份被邀任会办。他听到我在设备方面补充了35台梳棉机后，他连声叫好，并告我，在民元筹备该厂时，与外国洋行签订了4万纱锭的合同，价格都已议妥，不料政府中有人伸出手来，向洋行索回扣。洋行便只交梳棉机120台，以40台的价款来满足他们的需索。其时李明知后果严重，却不便反对并隐忍至今，我听后方恍然大悟。

还有一件小事亦说明当日官场之堕落！我们把厂房修缮好，补充了梳棉机，生产蒸蒸日上之后，循例由建财两厅审计委员会派员验收。事前厂里的同事们嘀咕开了，说这些验收人员懂得不多，可是不能得罪，应付得好，可以顺利通过，如有差池，他们是善于吹毛求疵的，我听了，一笑置之。那天，他们来到草湖门外办事处，总务方面立刻用汽划船送他们过河到厂，走马看花地绕了一圈后，便大鱼大肉饱餐了一顿，他们表示一切没有问题，验收任务完成了。不料把他们送到河边时，我们那只唯一的汽划船，因公到了河东，只好屈尊他们坐木划子。他们认为不恭，一气之下，马上回到厂里，说里面还有不少问题，须要复查一下，尽管没有问题，他们以后还是拖了一年多才盖章。总务科同事劝我设法疏通，甚至说要送几个钱给他们，我坚决不同意，直到我辞职，也未求过他们。

第一纺织厂和日人在中国办的“内外棉纱厂”都是民元兴办起来的，“内外棉”因经营得法，已扩充到10来个厂，而我们不仅只抱残守缺，还弄得自身难保。因此，1936年湖南第

一纺织厂盈利147万元后，我们立即向省府建设厅建议，向中国银行借款凑足300万元，另办新厂，得以批准。1937年我与中国银行湘行经理吕越祥一同去沪，与中行总管理处接洽，据该行总稽核霍宝树告知，该行正拟在湘设厂，如省府有意，双方可以合作，无须用借贷方式。我电告省府征得同意后，当即与中行议定，在湘办四个厂，以“衡中”为名，“衡”代表湖南，“中”代表中行。先在常德德山小港开设第一厂，股本350万元，中行占股70%，省府20%，商股10%，由我负责筹备。随后，我到常德购地备材，准备兴建，所购英国纱机，也已运抵香港，后因广州沦陷，无法内运，遂于1938年停止建厂，退还股息。多年梦想，竟成泡影。

湖南工厂的职工分得红利，是从第一纺织厂开始的。1936年，我列席一次省府会议时提出，纺织厂年度总结如有盈利，应提出15%作为职工红利。其时在座各省府委员，因这个厂多年亏损，不信会有盈利，所以很轻易地通过了。不料1935年至1936年度，居然获利，可提出22万余元作职工红利，某些省府委员面有难色，谓湖南无此先例，经我力争，还是发放了，每人分得了6个月工资。后来省府议决给我1万元，以示酬奖。我则以纺织厂之有起色，建设厅有关人员均有贡献，遂将一笔红利，交请余厅长酌情分配给科技人员。说起来，职工分红，是件喜事，谁知“福兮祸所伏”，1937年竟因红利问题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湖南省党部的权力，掌握在“钻子派”手里，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团组织，但因为我在湖南工作，有人就以为我属于“皮刀派”。

1937年工会改组，湖南党部不甘心纺织厂的工会组织权力长期落在别人手中，所以指使“钻子派”的人出来竞选，他们宣称，如果他们获胜，一定要厂方预发红利（即1936年至

1937年的红利),其实红利迟早是要发的,不过必须等决算之后才能发放,这是常识。改选结果,“钻子派”上了台,就提出早分红利的问题,当时湖南的工厂,只有纺织厂分发红利,再则决算没有出来,如再预支,将影响其他各厂工人情绪,省府、建设厅都主张缓发。这时,省党部认为丢了面子,便推波助澜,以致酿成工人罢工游行,集矢于我。作为对立面,省府又派了一营士兵到厂弹压。我见自己平白无故地介入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认为太不值得,便急流勇退,呈请辞职。同时再三叮嘱省府派来的营长黄某,士兵不能上刺刀、装子弹,务必保全工厂,避免流血。我自己就到常德筹办“衡中纱厂”去了。

1943年,在重庆余籍传作东道主的宴会上,我第一次遇见赖琰,有人提及他在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内发生的第一纺织厂工潮事件,他见我在座,便直率地自承当时所持的理由站不住脚,只是欲罢不能,骑虎难下而已,阖座为之大笑。

三

1938年,半壁江山沦于日军之手,国家和个人都进入最艰难困苦的年代。【常德衡中纱厂既已停办,香港中国银行来电要我去港,海运机器经越南转昆明,另开局面。我因家中人口多,老幼妇孺,需要我就近照顾,决定留湘。

因为时局不定,通货膨胀。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办工厂,并说: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倒把。我认为人生在世,应该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不能一意只谋个人的利益,发展工业生产,合乎我的心愿。那时海口被封锁,汽油不能进口,因此我与堂弟范仲连合伙在零陵开办了一个“新新”面粉厂后,于1939年又邀合几位朋友,在桂林开设“群力厂”,制造法国高安氏无烟煤汽炉,装在汽车上,可代汽油作汽车行驶的动力。这种产品用无烟煤,发动快,节省劳力,好处虽

多，可是不大受司机的欢迎，因为改装之后，就断了某些人盗窃汽油的门路，往往一经装上，他们就千方百计使它失灵，以致车主只好退货，我们也只好退钱，大半年中所制成的100套产品，销售出去的不到十分之一。我曾多次函电交通部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派员检验收购，却一直没有回信。在万分困顿之际，英国慑于日军的声势，封钱滇缅公路，更使我们陷入绝地。但这一突发事变，却使交通部慌了手脚，却连电我们那个小厂，要收买所有存货，并准备长期预订。我因此得以摆脱了困境，股东收回了本息，还获得了红利。后来，这个厂移交给沈宜甲工程师经营，一切资财，全盘奉赠，他接办后，改变了性质，不敢再生产煤气炉了。

四

在结束这个厂的一个月以前，我回长沙时途过衡阳，植物油厂厂长胡安恺向我转达了湖南矿务局长赵君迈的口信，说有事相商。次日我便和赵见了面，赵说湖南食盐，向由江苏、广东供给，现在武汉、广州相继沦陷，盐源断绝，须另开新路解决困难。过去湘西五县食盐由四川供给，目下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这条路线的运量，以供全省70余县之需，拟在四川酉阳县龙潭镇设立川湘盐运处董理其事，要我担负起这副担子。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盐务方面人才济济，而我并不是运输专家，对川东情况，毫无了解，表示不敢轻易承担这个责任。并把桂林“群力厂”的困难情况告诉他，说明不能舍此就彼的原因。他说衡阳盐局有不少汽车，用得着煤气机，可以连厂带存货整个接收，一则解决我的困难，二则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我看到颇有诚意，但又觉得事不简单，答应回桂林看看情况再说。回桂林后恰好滇缅路封锁事件发生，为我解决了困难，加上余籍传从未阳（战时湖南省府所在地）来信，要我解决湖南

3,600万人民的食盐问题着想，勉为其难，这样，我才不揣冒昧，当上了一次客串的盐官。

1940年7月，我去四川酉阳龙潭镇设处，路经沅陵，那里的朋友们都替我担心，批评我太莽撞。他们说，川东土匪如麻，经常杀人越货；川盐运道，离不开涪河（即乌江）和酉水，中间有270水里路，要翻越三座大山；涪河从龚滩至涪陵这200多里中，有323个险滩，洪水季节，顺流而下，一日可达，溯流而上，藉助牵力，往往需时两个月，川盐运潮正是逆水行舟；当然，也还有一条公路，自彭水至龙潭为350公里。可以行汽车，不过也是坡度大，弯路多。照他们的说法，我只有打退堂鼓了。还有人说，这些盐官们，平日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好象只有他们有能耐，一旦到了非常时期，碰到困难，就往别人身上推，真是太没有道理！怎么刚巧就碰到你这个不顾利害的人，来替他们顶缺！我说，他们看得起我，不是诚心嫁祸。我既然答应下来，一诺千金，就义无反顾了。

我邀请了一些有才干的人，在龙潭设了处机关，下设几个分处和十几个站，招募运夫2万余人，组成陆运总队，分大、中、小队。由工程人员逐段修理运道；找来船只千余条，募足了纤夫；另募了公私汽车约300辆，就这样这条运道总算打通了。

我这个外来人，打入盐官禁地，被叙为乙级。发放第一个月薪金时，我被吓着了，500银元之外，还加上900银元的特别办公费。我想，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被敌人侵占了半壁江山的国家，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社会？一个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值得收受这样多的报酬？抚躬自问，真是汗颜无地！当时，川东、鄂西、湘西是第六战区管辖范围，陈诚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驻在恩施。六战区在龙潭设有军粮运输处，与我们望衡对宇。我们是川盐运潮，他们是湘粮运川，适成对

流。为了使车辆不至回空，唯有盐粮对运，双方既能增加运量又可降低运费，也就降低了粮价和盐价。我有见于此，便与粮运处商定实施。1941年夏，六战区召集一次大型交通会议，由陈诚主持。交通部代表、参事王国华、招商局总经理施某，川湘陕联运处长任显群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川湘路上盐粮对运的做法，进行了肯定。

湖南邮政总局因大宗外来邮件积压在衡阳，时间长的达一年以上，急于运往重庆。该局叶局长又派人与我商定邮盐对运，邮件运价又高于粮的运价，因此更有利于我，只因衡阳盐局之无理干扰，以致作罢，至为可惜！

1941年，衡阳湖南盐务局又在川湘盐运之下，派一批税警组织一个川盐运输所，叠床架屋，所为何来？令我莫测。函电询问，也不置答，看来川湘运道，已经打通了，我已完成使命了，已经用不着外行来客串盐官了。因此我就辞去职务，依然经营我的工厂去了。

五

1942年，我还住在龙潭，正在筹设一个植物炼油厂，这年春我去重庆，回来时，爱人对我说，陈诚前几天到湖南去开会，路过龙潭，曾派他的政治部主任柳克述（剑虎）到我家约我谈话，我问为什么？她答曰不知道，柳说陈是到湖南榆树湾（今怀化）与薛岳见面的，回头会再来找你的。几天之后一个晚上，柳克述果然来了，说陈在粮运处，要请我过去谈谈。我问找我干什么？他说：“自伍仲衡去世后，湖南省粮政局长，一直尚未补人，陈诚早就有意于你，这次陈诚在榆树湾，已经和薛岳商量定了。”我说，我决不干这种性质的工作。请他在旁边敲边鼓，不是敲成，而是打散。他答应了，我面见陈诚后就婉辞此职。但陈诚说：“你不要怕和薛岳搞不好（伍仲衡

是在薛威逼之下自杀的），他不会和我推荐的人过不去。”我说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不善于做行政工作而乐于办工厂，现在我正在黔江郁山镇筹办一个植物炼油厂，地点在恩施与重庆的途中，将来可供给战区的原料。陈这才转移话题，问我过去办的是什么工厂，我把湖南省府与中国银行合股筹办衡中纱厂之事告诉了他，他为之动容，说他也曾与宋子文约定：抗战胜利后，由中行与湖北省府合办纱厂，总数约为100万锭。说着又要我替他筹备训练工人，我辞以为时尚早，将来一定效劳，他这才不再坚持。

我以为经营裂变植物油为汽油，比制造无烟煤气炉要少担风险。1942年我选定黔江县郁山镇这个川湘鄂三省交通孔道和盛产桐油之地，开设了天华炼油厂，雇用100余工人，每日产汽油1万加仑，柴油80余吨。谁知国民党政府规定，汽油必须服从几个月才调整一次的官价，不能随农村植物油价不断上涨而进行调整。所以开办伊始，还有微利可图，此后就是亏损，而且愈亏愈多，三年之中，一亏到底。

不让我炼汽油，我就去蒸馏酒精，酒精不是也可以作汽车燃料吗？这得到了朋友们热情而大力的支援，1944年，我又在湖南桃源陬市开办天风酒精厂，原料供应不成问题，技术也过了关，职工人数不多，而产量高于炼油厂，营业方面，与王耀武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签订了合同，不愁销路，所以业务顺利开展，直至日军投降，才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我应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电召，于1945年冬赴重庆组织人力去青岛接收日本人经营的9个纺织厂，从此离开了湖南实业界。

“裕湘”的缔造与恢复

聂光培*

1942年初，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从欧美毅然返国，在重庆被国民政府经济部聘为简任技正，靠撰写些纺织救国的文章度日，深感无聊时，路易·艾黎组织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把年内生产10万条军毯供八路军使用的保密工厂——毛纺织厂的设计任务交给了我，我设计了具有一整套手工洗毛纺毛、铁木织毯机的工厂。后来，国民党特务破坏了该厂，还宣称要抓我，经请示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和拜会邓颖超等首长，他们建议我暂回湖南老家躲避。1942年秋，我转入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43年初，我改任交通银行湘支行副经理，并筹办纺织厂。

我通过调查发现：湖南省棉田面积有168.6万市亩，皮棉产量年约50.7万市担。当时省内纺织工厂规模较大的，只安江的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及第二纺纱厂两家，纱锭为1.5万余枚，小型工厂亦不过二三家，仅有1,000余锭。但旧式手工坊甚为普遍，系农民的家庭副业，惟其产量有限，且需要大量机制棉纱作为织布原料。另外，我还得知湖南第一纺织厂在文夕大火前拆运5万锭（系英国ASA LEES厂所制）存放在湘西柳林汉，后来，除选出1.5万锭运往安江复厂外，尚有约3.5万锭弃置未用，而交通银行正发愁没有抓到好的企业可以投资，且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试制的国产纺纱新机没有找到认购对象。另一方面，军用衣被、铁路与邮递员的制服及民用衣被都十分

* 聂光培当时任“裕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缺少。所以我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反映并得到他的首肯。1943年7月1日，钱董事长在重庆特邀湖南省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湖南省银行、粤汉与湘桂铁路管理局、黔桂铁路工程局（三铁路局各认5%股，而黔桂局在缴股款时，因尚在基建阶段，取消其股权由董事长指定三北轮船公司认顶）等单位发起在湘筹办一棉纺织厂，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把预备在湖南设立的纺织厂定名为“三湘纺织股份公司”，并设立筹备处，推钱永铭为筹委会主任委员，余籍传、张兹闾为副主任委员，我为委员兼总干事，俞鸿钧、徐继庄、赵棣华、虞洽卿、丘国维为委员，股金定为5,000股，合法币5,000万元。纺织设备除由湖南省政府在原湖南第一纺织厂所存柳林汉的织机中选出2,600锭，并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订购经纬纺织机器厂监制的新机2,400锭。7月17日，第二次筹委会议召开，增聘黄仁浩、赵季言、沈熙瑞等为筹备委员，筹委会拟定厂址在祁阳军政部第三被服厂附近，并指定我负责建厂筹备事宜。会后，我离渝返湘，经过实地勘察，认为厂址选在祁阳军政部第三被服厂附近很不恰当，因为第三被服厂剩余电力只有120匹马力，不敷应用；并且该处房屋密集，目标显露，防空困难；距铁路车站甚远，江水至冬季亦浅涸难行，水陆运输均感不便。通过勘查，我认为衡阳县东阳渡是理想的厂址，该地南距衡阳市15公里，位于湘江东岸，旧有石级码头可供起卸，地势高亢，面积宽大，粤汉铁路、衡阳至宜章公路在此经过，水陆交通均称便利；附近山丘起伏，便于防空掩护；湖南省玻璃厂即在此地，该厂内有空地及多余房屋可以借用。筹委会同意我的意见，10月16日，筹委会决定厂名为“湖南第三纺织厂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因法币贬值，预算费用不敷，决议将资本额增定为法币7,500万元，由各股东按原认股额比例增加。11月8日，公司宣告成立。会中通过公司章程

程并由各公股股东及非公股股东分别派定及选出的第一届董事、监察人及股额如下表：

单位名称	股额法币 (万元)	公股或 非公股	董 事	监察人
湖南省政府	1,900	公股	余籍传、唐伯球、黄 仁浩、毛炳文	朱毓麟
湖南省银行	500	公股	丘国维	周天贤
经济部工矿 调整处	825	公股	张兹闾、姚文林	
中央信托局	750	公股	钟 鐸	潘承炯
邮政储金汇 业局	600	公股	徐继庄、沈熙瑞	
粤汉铁路局	375	公股		杜镇远
湘桂铁路局	375	公股		石志仁
交通银行	1,800	非公股	钱永铭、赵棣华、 侯厚培、聂光培	徐景薇 李钟楚
三北轮船 公司*	250	非公股	虞洽卿	
聂光培等*	125	非公股	聂光培	

11月10日，第一届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召开，选举钱永铭为董事长，余籍传、张兹闾、丘国维、钟鐸、徐继庄、虞洽卿为常务董事，并聘聂光培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琬如为协理。

湖南省政府所拨原湖南第一纺织厂的旧纺机2,600锭，作

* 原黔桂铁路工程局认5%股额在增资缴款时，仍在基建阶段，不能缴，由铁董亭长将该股额转让三北轮船公司。但该公司不肯缴所增资部份，再由董亭长用电报指令衡厂在限期内就近凑齐，我等紧急凑齐法币125万元，在限期内缴足全部股额取得营业执照，才能开始动工兴建，如期投产。解放后不久，我调省计委（前身省财经委员会）工作，即将我和友人名下的这笔私股全部捐献给人民。

价法币600万元，计有给棉机一台，开棉机一台，库来登机二台，尘格匣一座，弹花机头道一台，二道一台，梳棉机十二台，并条机（三节七眼）二台，粗纱机头道一台（90锭），二道二台（每台124锭），三道四台（每台160锭），精纺机纬管七台（每台400锭），小打包机二台。经总技师傅干臣，技师孔昭潜，技佐黄汉森、陈起旭等清理选配，用木船9艘，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4年1月21日才全部运抵东阳渡，3月5日起卸完竣。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所订的新纺机2,400锭，计有弹花机三道一台，库来登机一台，梳棉机八台，并条机（二节四眼）三台，精纺机六台（每台400锭），双连摇纱机十台，小打包机一台，作价法币1,500万元（分批运进厂的五批纺纱机在“衡厂”开工时已装上运转，尚有一部份机件因交货较迟，在渝待运。湘北战事已起，衡阳告急，即予停运，后该两部份机件均运往长寿设立分厂，配成1,200锭复工）。

在厂房建筑工程上分三期开标发包，计在开工前完成厂房、仓库、机修房、动力房、男女工宿舍、职员宿舍及各项工程建筑费合计法币1,000多万元，购地350余万元。衡厂动力系自购120及140磅锅炉各一座。45匹马力蒸汽引擎一台，150匹马力蒸汽引擎二台，125KVA发电机二台，各型电动机49台及全套机修和配制机件与白铁、锻铁、翻砂、木作等工场。

1944年4月下旬，建厂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纺机安装工作作为提前试车计，将清、梳、并、粗、精纺等机，每种同时装齐一部分，试行成龙开花，预定6月初局部开工，先开800锭，8月起增开1,600锭，11月起开齐5,000锭。

1944年5月1日，第二次董、监联席会议在衡阳召开，大会通过了试车投产安排计划。并决定采用“雁峰牌”商标，又选定我兼任厂长，傅锡禹升任副厂长。购棉资金为法币2,000万元，向有关股东、行局洽借。我很重视员工生活，因30

年代筹建棉纺织染实验馆时，去过日本五次，看到日本纺织女工生活的艰苦，后到欧美工厂任工程师阶段，看到凡对员工生活关心的企业，其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所以在建厂之际，同时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开工之前，厂内即已办有农场、儿童乐园、员工消费合作社、员工纺业合作社等项事业。农场面积甚广，占地百余亩，除耕耘及种菜外，并饲养有各种家畜，其中有巴西猪、瑞士羊、安哥拉兔，意大利蜜蜂，均系国外良种。儿童乐园辟有一个宽广的草坪，设置各种儿童运动器具，专供员工子弟游戏。员工子弟学校亦在筹办中。员工消费合作社售卖各种日用物品，并设有食堂，面点、便餐、酒席，供应齐全。员工纺业合作社分有缝纫、碾米、制造豆腐、豆汁等部门，皆由员工及眷属分任工作。因此厂内员工及员工眷属均有工作，老幼亦有所安，厂内员工及其眷属生活皆得到调剂，工作兴趣亦为浓厚，东阳渡厂自成一块乐土，备受当地人士称誉。

1944年6月2日，工厂开始试车，情形良好，6日正式开工。是时湘北战争再度爆发，形势突然紧张，人心惶恐。我当时为筹策厂务安全，一面开工，一面将未装机件及重要材料先行疏散，将眷属及谷米、衣被等运出。同时呈请钱董事长，必要时先迁贵州独山，再图重建（并已呈准湘府及其有关部门备案），6月11日，我用民船将未装机件和重要材料运往祁阳方面。不久长沙失守，形势危急，奉省府转国民政府命令，指定湘境内新中机眷厂、华成电器厂及本厂三家由经济部工矿调美处协助内迁。待欧犯衡山，急进行第二步骤，于20晚赶眷纺机全部拆卸，星夜装船，亲督员工守到22日清晨，待第二批物资一一运出后，我仍留守。直到欧军前锋抵郊区，达泉溪市，距厂址25华里，我才率领最后一批员工徒步散退。

衡厂的全部机件物资，装火车四列，我亲自在车站月台督

促抢运，民船分三批运员工眷属、煤、谷、棉花、棉纱及机件物资等，大小船只共60余艘，分别西行，航至祁阳以上，湘江水浅，大船不能行驶，爰改装稍小的船共80余艘，7月初安全到达冷水滩。随即，我们将船运物资机件在冷水滩及黄阳司站分装火车30个车皮，由湘入桂，迳驶柳州，一部分原车直运金城江，计共运到机器材料338吨，原棉490余吨，员工行李、煤炭、谷米等尚不在内。我从衡阳后撤，途经祁阳、冷水滩，事无大小，多亲为指挥照料。至桂林后，为洽拨车辆，朝夕奔走呼号，结果幸获解决。但是运费浩大，张罗无力，时桂林紧张万分，董事长虽批准向昆明纺织界借贷，苦于远水难救近火。正束手无策时，幸得友人之助，介绍搭得由昆明运军火至桂林的回程军用机，飞往昆明。抵昆后，经与云南及裕滇两纱厂商谈，承允以棉花作抵贷借给法币1,000万元，物资疏运费始有着落。使第一步西迁工作差幸完成，但物资由柳州运至独山一段，其运筹之艰苦，经历之危险，则非笔墨所能尽其万一。

衡厂物资运抵柳州后，军事形势日紧，铁道车皮愈感调度不灵，不是车皮无风管（运棉花必需通风，否则易于起火），就是机车缺燃料，加之军人扣车肆无忌惮，行车误点，操纵无方，我在滇借款返柳后，在柳州、宜山间几经踟涉，唇舌焦敝，始获允拨得风管车皮四列，将柳州大部机料运至金城江。然而尚有机件30余吨及原棉80余担，在装上车时被征为军用，卸滞柳州南站，无法运出。机棉过金城江后，原以为可以安全运往独山，不意行至加必屯、八贡等地，遭日机轰炸，等运抵独山时，只剩下原棉260担，及钢丝、针布、马达数件而已。

我抵独山后，眼见迁运益为困难，乃着手自筹交通工具，11月初，在贵阳筹款购得木炭酒精两用卡车二辆，开始抢运。同时并商得交通部材料运输处及云南经委会同意，拨车代运。心稍安定，不期柳州又于11月11日陷敌，时机急迫，忙筹款预

付给交通部材料运输处，该处拨给的6辆汽车于次日即运物下驶。26日我抵独山时，战局万分紧急，金城江、河池相继失守，南丹亦岌岌可危。云南经委会允为本公司代运的回程车在29日被军队扣留，无法利用。材料运输处6辆车虽然已经驶返独山，但其中2辆已坏，其时谣言纷起，人心浮动，我急率员工将原棉154包搭装4辆车运筑，余127包及钢丝、针布、羊皮、刺毛辊等，则另搭西南进出口物资督运委员会车。此车并载有本公司职员及职眷，连同行李30余件，于12月3日行抵都匀以上协昌地方，忽奉令他驶，旋以某桥梁被空军炸毁，车行受阻，车上本公司物资及职眷行李即于此地全部损失，员工及其眷属惟有徒步南行。时除上述4车分运物资外，尚余原棉200余担，机料6箱，无车装运，暂存独山，独山收复后，此6箱机料尚属完好，后已商请工矿处贵阳运务处派车代运贵阳，但存独山原棉200余担及食米全被人抢走。独山应变我也是自行殿后，11月30日下午，员工及其眷属撤尽后，我始徒步向筑转进，1945年1月12日全部到达贵阳。计自衡阳到贵阳经历千余里，历时6月余，锋镝余生，互相庆幸，惟环顾遭遇，行李全失，无衣无褐，则又感慨系之。其时我的最大责任，为员工救济与厂务善后工作。迁运既告段落，一时不能重建，乃将共患难的大部员工忍痛资遣，酌留20余人，办理善后事宜。

物资机件运到贵阳后，我便从事未到物资的清理和复兴计划。清查结果，综计由衡内迁损失数字，依当时价值估计，约为法币12,000余万元，并向经济部善后救济总署及花纱布管制局请求救济，但始终没有结果。

运抵贵阳的物资只有原棉5,613市斤，纺机1,200锭。后来就把纺机运往云南曲靖交给裕滇、云商两纺织厂，作为本公司所借1,000万元借款的信用抵偿，余棉则在贵阳出售，以维厂用（内有470市斤棉花当时已发给职员，弹制棉絮棉衣，以

度寒冬)。1,200锭中，计有钢丝机即梳棉机4台，并条机全部，粗纱机2台及细纱机一部份。如欲复工，至少要补置清花机与粗纱机及钢丝机2台，细纱机一部份。虽然本厂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几经周折，才得到工矿调整处及裕丰纱厂协助，配借齐全。

生产工具有了着落，就进行经费筹措，觅地建厂，最先计划厂址拟设在泸州，以后又找到长寿野猫沱，两相比较，以长寿有水力发电，可以保证本公司所需的电力，地近重庆，鄂棉湘棉进口便利，1945年2月28日第二次股东会议在重庆举行，决定在长寿复厂。当在野猫沱购原建国炼油厂房地基，计面积56,387平方英尺。我安排傅干臣工程师主持建筑厂房，装置机器，向资源委员会长寿水力发电厂洽妥用电，斯时存贵阳的纺纱机器全部运到，员工眷属数十人亦已由重庆移居长寿。由于员工齐心努力，1945年8月开始试车，情况尚好，并生产出棉纱8件，品质均佳，⁶深得各界称誉。不期开工未久，即逢抗战结束，物价狂跌五六成。在当时，大后方一般工商业本已凋敝萎缩，经此大跌价的打击，许多厂家纷纷倒闭。本分厂在建设过程中，集资筹款，原已呕尽心血，手足胼胝，不期基础未固，惨被摇撼，迫不得已，暂行停工。当于1945年11月1日在重庆举行第三次股东会议，决定返湘增资复厂，长寿分厂就地出租，将1,600锭纺纱机及技术人员暂行让与长寿安定企业公司，议定每月按产量提出成品十分之一作为租厂费，分厂员工由安定公司借用，并在安定公司支薪，得到本公司批准后，于4月间签约租出。从1945年4月至1947年12月15日，安定公司租厂期满，由本公司仍委黄伯坤为长寿分厂厂长，除收购安定公司剩余纺织物料外，并在重庆贷入原棉300市担，于当年12月21日正式开工，因机件大多陈旧，效率甚差，但由于职工努力，平均每月仍产棉纱约60件。四川省解放后，长寿分厂交重庆市纺织局接

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厂各股东以本厂系由湘省各有关机构所筹办，自应返湘增资复厂。遂于1945年11月1日在重庆举行第三次股东会议，决定返湘复厂。1946年初，我率领员工陆续由川返湘，在长沙设立办事处，筹备复厂事宜。关于厂址，以“衡厂”厂房等建筑物已在沦陷时全遭破坏，荡然无存，如欲复厂，必须重新建筑，为求原棉供应及成品运销的便利，我们想在常德德山设厂，趁董事余翥传返湘之便，请他与省政府接洽，得到省政府的同意。并拨给德山恒中纱厂旧址作为本公司复厂厂址。1947年1月15日，第五次董监会议决定设新厂于德山，并请省政府从速从廉估价，至于我厂在衡阳的旧址，则仍予保留，备作将来设分厂之用。我们到德山勘查后认为：德山建筑物缺少，山地高低不平，就山建厂，耗资亦非少数，且临港码头与基地高达十余丈，引水动力和原料运送，均感困难，德山设厂又作罢论。经反复磋商，决定要求省政府将长沙银盆岭的湖南第一纺织厂旧址作价拨让，该地面积广，原有建筑虽已大部被破坏，但原织布车间屋顶虽烧毁，四康的砖墙损坏较少，稍加修理，则籍容纳1万纱锭，况原厂址的四周仍有一部分围墙，原有码头经修理后仍可使用，经省主席王东原同意后，本公司推出在湘股东代表及有关单位组成估价委员会，共同估价，估定湖南第一纺织厂厂址及地面建筑共值法币146亿多元，与省政府应缴股款相抵。估价既定，我们就着手接收厂址，新厂建筑开始了。

为了恢复本厂，1945年11月1日，第三次股东会议决定按原资本额法币7,500万元增资9倍，由股东照原股额比例，分期缴齐，后以物价上涨，增资不敷复厂费用，复于1947年2月15日召开第四次股东会议，决议再修原资本额，增资40倍，仍请各股东认缴，两次共增49倍，资本总额增为法币37.5亿元。1947

年12月12日，第五次股东会议决议，再照资本额法币37.5亿元增资11倍，增为资本额法币450亿元，仍由各股东认缴。三次增资已全部缴齐，所收资金拨作复厂设备及工程费用。

本厂三次增资，终因股款分期缴纳，个别股东缴款拖延甚至不缴，而物价波动过速，致每次预算都是不敷甚巨，前为谋一次筹集资金，积极复厂开工，我曾在上海进行开工借款，8月中旬，并向私营四行联合会总处洽妥业务借款法币5,000亿元，中央银行工矿顾问委员业已通过，适时，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停止贷款，该项借款又告落空。幸得交通银行协助，才得以把所需款项筹借到手。

1946年3月24日，董监事在上海举行第七次联席会议半决定将增资股金换得美元储券50万元在沪购置英国 PLATT 旧纱机9,440锭，以美金30万元购买成功，至于动力设备，已将20万美元在沪购得英国、意大利产马达33部，总马力为450余匹，及在沪与善后救济总署申购了加拿大和美国合作制造的500千瓦新式发电机一套及配电板全套，效力极佳。

一切购置齐全后，我便带人督修厂房，至1948年7月上旬，第一步工程已全部完成，共占地280万亩。计有纺纱房、动力房、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仓库、警卫室、堤岸码头、水池、水塔、烟囱，围墙等。

1948年3月15日，第八次董监联席会议召开，决定更改厂名，采用“裕湘”二字，到7月1日，内部开始改用“裕湘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到10月1日，就对外使用了。由于增加了资金，董、监也有变化（董事长是钱永铭；常备董事：欧阳仑、王恢光、李维诚、程远帆、谷春藩、杜镇远、侯厚培；董事：李锐、邓介松、刘业昭、王子建、何墨林、虞顺懋、赵棣华、庄权豪、聂光培；监察人：李树森、刘岳厚、欧阳扶九、仲龙、何纵炎、汤筱斋、余籍传），聘我为总经理兼厂长，赵夔

为协理，傅锡禹为总工程师。并于1949年元旦正式开工。解放前夕，本厂有职工437人，1949年底全厂职工598人，纱锭5,000余枚，生产的红“寿”字纱被人们争相抢购。在职工福利方面，我特别重视，设有职工福利社，除第一次由厂拨出一笔开办费外，经常在售出的纱款中提出1%充作福利基金。关于消费、娱乐、医药各项设施，均初具规模。教育方面，有工余学校，设有会计、缝纫、常识各科，教师均由职员有偿兼任。在政治方面，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主办“康乐社”墙报等，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经济方面，从开工半年后结算，已将从1943年7月筹建纺织厂起到1949年6月底全部的亏损完全清还，帐面上取消了赤字，至解放前夕，帐面上已有盈余。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在长沙市迎解大会上，我代表全厂职工向省政府敬献光洋3,000元。8月25日，长沙军管会派军代表何渊、易群、周洁来厂接管，我向军代表汇报我厂情况：国民党溃逃前夕，国民党绑架了我，企图勒索银元棉纱，我置生死于不顾，未给他们分文寸纱。我被释放回来后，坚持按中共地下党“护厂不停一分钟，不损一点物，不伤一个人，安全投向人民怀抱”的指示，组织了纠察队，请马隆安任队长，进行护厂迎解斗争，因此长沙市迎解委员会聘我为顾问。军代表听了我的汇报后，宣布在我厂实行“三原”政策（原职、原薪、原机构），要我继续担任厂长。同时，成立接管委员会，清产核资。8月29日，市总工会主席袁学之领导市工、妇联合工作组进驻我厂，开始协助筹建党、团和工会组织。至9月份，党、团、工会、妇联等组织普遍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党的领导，全厂到1949年底共有职工598人，产棉纱470吨，产值按1950年不变价格计算合人民币158万元，总产值192万元，工资总额26万元，余为缴清税款后的利润。

建国后，我厂隶属中纺部中南纺管局与省工业厅双重领导。购销关系是自购自纺。1950年2月底，湖南省计委（前身省财经委员会）主任宋乃德及秘书徐虹来厂接我去省计委工作，规划和筹建全省棉、麻纺织印染成衣企业。厂长由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陈钧接任。他对我在职期间所组织的精干科室及职工培训颇为赞许。向湖南省政府申请投资扩建，7月获得投资额人民币695万元。拟在厂部南边扩建厂房。11月，陈钧厂长从省计委借我等技术人员到上海大隆纺纱机器制造厂购置33,000锭纺纱机设备。我为南厂进行了全面设计，边安装边投产，于1951年全部投入生产，之后我仍回省计委筹建兰麻纺织厂，从此，我便告别了“裕湘”。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的水口山

周 悠 安*

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是举世闻名的，但在40年代初期，平均年产铅锌矿砂只有1万吨，附产黄铁矿石（俗称磺砂）数千吨，全部铅矿卖给湖南炼铅厂（原在长沙六铺街，1938年长沙大火后迁至松柏河边，距水口山仅6公里，有轻便铁道可通），炼成纯铅（年产1000吨）。锌砂销路较滞，部分供给湖南炼锌厂（原在长沙三汊矶，文夕大火后临时迁松柏），冶炼纯锌（年产150至200吨）；另在长沙旧厂辗压锌片；还有一部分卖给衡阳国泰颜料油漆厂，生产锌白粉（即氧化锌），剩余部分，积压销不出，在露天堆存。磺砂更没有充分利用，只将部分选矿尾砂，卖给矿商，用土法熔炼硫磺；其余或堆存。或倾入废洞老窿。

当时水口山的矿石采选，已经部分机械化，如重力选矿，通风排水，提升运输，都是使用蒸汽动力带动的机器，后来因开采深度达到250米左右，地下水又大，以致蒸汽排水日显困难。选矿场有两套日处理原矿石250吨的重力选矿设备，另有机械修理厂，发电厂（供照明用）等；湖南炼铅厂有两套日处理原料50吨的鼓风炉，以及相应的碎矿筛分机、烘砂锅、精炼反射炉、吹灰提银炉、鼓风炉等，也是使用蒸汽动力，整个矿局炼厂的设备不下数千吨。

那时水口山的职工眷属、矿商（包括其所雇佣的工人）

* 周悠安在1946年至1948年任水口山矿局湖南炼铅厂联合管理处处长。

等的有二、三万人。1944年秋，水口山沦入日军魔掌，这些人几乎全部失业，因为该矿开采较早，矿山废水及炼厂烟尘，侵蚀禾苗，附近农田大都变成不能耕种之地，一旦无工可做，生活就成严重问题。加之日军施放细菌，更给他们带来不幸，造成极大的死亡和病疫。据说日军想继续开采，只因复工工程浩大，又处于穷途末路，才没有正式开采，但将矿上机器设备拆卸外运，除部分已运至其他矿山外，其余均沿途抛弃了，从矿山松柏河边一直到衡阳江岸，甚至到长沙，沿途都弃有机械部件或零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建设厅设立了水口山矿局湖南炼铅厂联合管理处，派谭丙任处长，主要任务是对劫后的水口山财产进行清查、整理和保管。但谭除对少数住房进行了修葺，拆掉了一些危房外，别无建树，对散失的机件根本不予搜集和运回。

1946年5月，省政府改组，李毓九接替李毓尧任建设厅厅长，那时我恰从浏阳回来，失业在家，偶悉李毓九爱人与我爱人在小学同过学，只得走这条裙带路线，找个事儿，李将我安排在建设计划委员会当委员。当时湖南工矿行业的厂矿负责人，大部分是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即湖大前身，简称高工）毕业的；而建设厅第三科（管理矿业）和第四科（管理工业）的科长、技正，甚至技士，也大都是高工或湖大毕业的，这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帮派，李毓尧是学地质的，而且当过湖大的校长，因此当他任厅长时，第三、第四科比较拥护他，但是对李毓九则不然，认为他不懂工矿业，所以并不怎么买他的帐，李毓九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对下面一方面是笼络，譬如在家里宴请各工矿局（处）长、厂长，另一方面将他上任后安排的人员，由建设计划委员会调到厅里来，安插在第三、第四科。6月份，我就被派到第三科当技正，当时厅里称这些人为“少壮派”，李为了了解所属厂矿情况，就派了几批人分赴各地考察，我被派

往祁阳的湖南机械厂、水泥厂、观音滩煤矿以及常宁水口山等处，当我到达松柏，一眼就看到遍地堆存的锌砂，一片雪白，不少锌砂（硫化锌）因年久变成了氧化锌，矿山内外到处是散乱的机器部件和零件，厂房和宿舍大多成了断壁残垣，四周的居民，个个面黄肌瘦，愁容病态，不忍卒睹。回长沙后，我提出一个利用废砂，提炼纯铅的建议，这时，李毓九正逐步将物色来的人员，派到各厂矿去当主管人，谭丙与他有世谊，原不想换动，但有人控告谭丙贪污、盗卖公物等等，李就不得不考虑，恰好碰到我提出这样一个不要拿钱出来，反而有钱可赚的建议；于是就派我去接替谭丙。

1946年8月中旬，我到了水口山，详细了解情况后，拟出具体计划：即利用水口山废砂，用人工选洗出铅精矿砂，冶炼纯铅。为了获得修复厂房及所需机器设备的资金，我决定先行预售一批纯铅、硫磺（用堆存的及选出的矿砂熔炼）以及积存的部分锌砂。我带了这个计划到厅里去请示，李毓九到南京开会去了，第三科不肯批复，不知他们是不相信这个计划，还是不愿负责任或者故意与我为难。直到李毓九回来才批准实施。

关于所需复工经费，主要由建设厅营业室筹措，即靠抛售若干吨纯铅收入现金。营业室主任朱紫良是李毓九的亲信，营业室的职责是经销厅属各工矿的产品，掌握他们全部的资金，倘若是真正本着搞好建设出发，对各工矿进行盈虚调剂，那么，这个营业室也算起了应有的作用。无奈李毓九的目的不在此，而是把钱攥在手里，进行非法活动，如在钱庄放息、买卖黄金，以及从事其他投机倒把活动。但在复工初期，他怕我搞不好生产，以后会失掉一个摇钱树，所以尚能按时寄款。等到我如期投产后，他的态度就不同了，不问你是否需款，何时需款，就擅自抛售纯铅，并将钱扣住不汇出，有时竟达三月之久。1947年以后，法币日渐贬值，他这一手，有时害得我反而

要向银行借款度日。

生产期间资金的周转，除靠自销和营业室代销外，在1945年夏秋，还靠衡阳公私银行接济不少，这个关系是通过黄炳烈来打通的。他是我中学同学（低几班），当时是衡阳复华花粮行的经理，他跟各银行的关系非常密切，举个例子来说：银行下班或星期日不办公时，我们如需要款了时，他都能支取到手。于是，我就请他当衡阳办事处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替我在衡阳金融界联系，并购买粮食和五金器材，凡从营业室汇来的款项，都自他领出转入水口山户头，在这一领出存入的过程中，挪用一两天是不易发觉的，这样就等于增加了他的资金。至于水口山向银行贷款，是用的衡阳办事处的名义，从表面上看来，是省立机关向公私银行借贷，可是在那种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若主管人没有好处可得，他就不会贷款给你，而会推说银根紧急，暂停放款的。好在我是请黄炳烈出面，由他去打通关系，只要矿山急需款项时，能有钱用就行，至于他们怎样从中获利，我是从不过问的。黄炳烈挪用款项后，则按照钱庄行情付给我利息作为报酬。

关于生产情况大致如下：1946年底，一方面我开始指挥修复炼铅厂的各种炼炉、厂房和通风、供排水设施，以及运输斗车等；另一方面往各地招雇冶炼技工，因为炼铅厂由长沙迁松柏后，做技术工作的大多是湘潭人，本地工人（除小部分烘砂炉工外）大半只做非技术工作。水口山沦陷后，我们找到几个工头，由他们再去联系技工，另外我还找来一批以前跟我搞过冶炼的技工。至于人工选洗，本地工人有丰富经验，无需外求，所以在修复炼厂的同时，就着手包工选洗废砂。当时采用的废砂有两种，一种是历年来选原矿石甩掉的废石（块石），含铅尚富，除地面堆存一些外，还有的多填塞在洼地或废窿内，譬如局里一个大操坪，就是用这些石头填起来的，我们除

洗选地面废砂外，还发动老工人寻找那些埋在地下的含铅废石，他们四处挖掘，周围居民谓之“刮地皮”。另一种其实不是废石，而是手选过的锌精砂，是沦陷前堆存下来的，其中含铅仍然很高。以上原料数量均不是很多，若采矿正常，谁也不会理睬。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总算在1947年的春天点火开炉了，到夏初就生产出第一批纯铅，第二批和第三批是在1947年冬和1948年夏出产的，共计约三四百吨纯铅和千余两银锭。

由于事先考虑“到刮地皮”不能持久，不能不排除窿内渍水而相机开采，但是要全部排除，以当时财力物力是办不到的，根据老工人的意见，只有排除100米以上的渍水，采掘残砂，以补充炼厂原料。所以在第一批纯铅出厂后，我就积极准备排水，向观音滩煤矿订购大量烟煤，收购大量木料、五金材料，修理通风、排水、提升运输、铅炉等设备，并向湖南机械厂添购水泵两台。当时的排水工程，主要由张炳臣工程师负责，那时他年近七旬，是水口山机械开采工程的开拓者和负责人之一，对坑内情况非常熟悉，中间一段因故离职，值此暮年才返矿。当时我惟恐厅里不同意排水，就来个先斩后奏，所以在一种急于求功的思想支配下，行动上就未免草率，本来考虑在一坑斜井和二坑竖井同时排水的，但由于发电设备一时搞不到，用旧式蒸汽泵在井内排水比较困难，并且过于相信两台新购的4吋水泵可以在二三月内排除100米以上的渍水，于是在机械设施和燃料初步安排好，试泵出水后，就上报厅里请予批准排除部分渍水采掘残砂。李毓九认为最好不要搞，不如将赚的钱交给厅里，买些黄金储备或调剂其他厂矿，我不肯，他也就没有往下说，并批准了我的计划。可是我们排水并不顺利，水泵经常出毛病，观音滩烟煤阡石太多，锅炉烧不起磅，每每白天排水一尺，黑夜便涨五寸，甚至两台水泵同时发生故障，水反而涨控

起来，搞了二三月进度很慢，这时只得另打主意，四处托买发电设备和电动排水设备，因一时买不到合适的，只好买一台坏发电机，将线圈重新绕过使用，买半封闭式电动机自行改装为封闭式，费了不少精力，在二坑竖井就用离心泵排水，可是电动机封闭不严，不到几个钟头就潮湿了，线圈被烧坏，只好将它送到衡阳去修。排了四五个月眼看只差5至6米水位。就可以采砂了，但恰巧李毓九调资委会第二特矿处当处长，新任厅长王恢先继任后，就下令水口山停止排水，并且派曹技正来矿监督执行。当我向全体职工宣布这个命令时，很多工人请求不要停工，他们情愿不要工资，也要再干几天，但最后还是被迫停止排水了。

我到水口山不久，就招雇了一批炼硫工人，熔炼硫磺，根据当时销售情况，有时多开几座炉，生产多些，少开几炉产品就少些，日产量约在几十斤到二三百斤之间。水口山被日军占领之前，矿局很少自炼硫磺，一般都是出卖磺砂给磺商去熔炼。在往年，硫磺销路不错，残渣又可制土红和青矾，所以有一些商人经营这一行，大约有10余家，而且矿局职员，大半都入了股，这些磺商与矿局职员合伙，过年过节送礼，平时邀牌聚赌，更属常事，他们还广交建设厅第三科的人员，得以在松柏河对岸的河口一带设立磺厂，雇佣了不少工人。磺商中的有名人物如康明德，父亲原是水口山采矿工头，当包工头赚了钱，买田造屋发了家，要儿子当了磺商。沦陷后，许多包工头都受了损失，大部分改行不干了，只剩下康明德、曹理云、郭清栋几家。最初，他们仍向矿局购买存砂，签订的合同是提取部分产品（硫磺）抵作砂价，本来他们也想照老办法拖我下水，但是我考虑水口山这个烂摊子情况复杂，如果与他们合伙，势必受到钳制和包工，于是没有答应。但在逢年过节时，双方请客，互有馈赠。后来，我们开始排水，康明德请求开采新冲（那里的地势高

些)的磺砂,我们借给锅炉、水泵等,他们采出的磺砂部分缴纳,附产铅砂全部卖给矿局。后来他们居然掘到了一个小小的铅砂砂包,储量约10余吨,但由于地下水太大,设备陈旧,开采效率不高,加之1947年秋季以后,磺磺销路不佳,资金周转不灵,在1948年春终于停工。

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曾命令水口山成立区党部,我因自己不是国民党党员,对成立这个机构不感兴趣,起初没有理睬,后来总务课长(国民党党员)蔡恢先要求成立,我不便反对,就答应由他去办理。区党部成立后,由他任书记,进行了老党员的登记,但没有发展新党员,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威信扫地,很多人对它失去了信仰,同时也没有搞什么活动,只在选举“国大”代的时候,蔡恢先代表水口山去参加了投票,并协助行政上搞了一下五人联保登记,再没有起什么作用。与此同时,国民党省总工会曾多次指示成立工会,有一个工头,过去是工会委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曾问我:“上级有指示,要水口山成立工会,不知是否有此事?”我说没有看见通知,其实,寄来的文件我都撕碎丢到字纸篓里去了,我心里想:你们想利用这个组织搞名堂,我又掌握不了,不如不搞。

那时,失业工人多,全都处于贫困交加之中,极盼早日复工生产,但由于当时的生产极不正常,对工人的雇用,就不能不分别处理,外省请来的技工就固定下来,本地非技术工人,需要时雇用,不需要时辞退,对选洗工人则采用包工收货形式来对待,这样一来,工人虽大大减少,但工资仍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1947年以来,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很快,月月调整工资也无济于事,那时每人每日配发两斗谷子(按照原购入价格),其余的发法币,可是配发工资时,折换稻谷后所余法币就不多了,故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斗争的事经常发生,他们采用怠工、旷工以至罢工的方式,要求增加工资,我对这些工人

轻则记过，重则开除，并且威胁工人，如果谁煽动罢工，就作为共产党抓起来，送去法办，尽管这样，工人还是不畏强暴，竭力反抗，迫使我不得不让步。至于一些失业工人因生活极端困难，看到遍地乱丢的机件废铁等，顺手拈去偷卖的事也曾有过。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几个失业工人在松柏河边偷运机器零件，被放哨的矿警发觉追捕，其中一个跳河逃生，不料被矿警击中毙命。次日，死者家属请求埋葬，开初我不同意，经一家属再三请求才批发了安葬费和抚恤金。事后呈省建设厅，反遭驳斥，说死者罪有应得，不能发款。

此外，在工人反征兵的斗争中，我也为他们撑过腰，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处征兵补充，水口山附近保长四处抓壮丁，这样一来，许多青壮年工人就不敢来上工，影响了生产，所以我命令矿警队，如果保长抓了局里工人，不管是固定的或是临时的，一律要抢回来。有一次，一批运输工人，推斗车运送上红至松柏河边，松柏保长想抓其中两个人。其他工人一涌而上，把他打了一顿，他向我哭诉说工人抗拒征兵，还打伤了他，要我交人，我说他们是临时工，我管不着。后来，他告到省政府说我包庇打人的工人，我回说局里没有这两个矿工，所以，当时保长在水口山附近抽壮丁，均无结果。

1947年底，矿井停止排水后，洗选废砂仍在继续，但由于纯铅、硫磺等滞销，选出的铅砂也不多，于是在1948年春开炉熔炼第三批纯铅后即停炉。随后，矿山全部停工，只留下极少数工人护矿，其余都遣散了，职员不愿留的也予遣散。同时加速对全部财产的清理、造册，不但将散失抛弃在湘江沿岸的机件运回，还将日军运至醴陵煤矿的机器也运回来了，为了排水，还接收了湖南酒精厂迁移至益阳桃花江（现属桃江县）的全部器材，我米矿之后大量添置的排水设备和购买的燃料等共计为数几千吨器材均在清理之列，这些设备不但要点数，而且还要

过磅，清理工作在夏季季中可以完成。于是我召集全体职员开会，说明我将于6月携眷返长，职务委托工务课长代理，并转告了共产党“要保证矿山安全”的秘密通知，因此要求不愿跟国民党走的人，要好好地保护矿山，我自己先到长沙迎接解放。

当时，水口山处在极混乱的状态中，经过全体留矿职工的努力，总算将整个矿山财产安全保护下来。譬如，我在长沙听说湖南物资供应局想抢走我们存留的纯铅，我就急函矿山将纯铅秘密埋藏起来；国民党军队工兵筑工事，想劫去我们存放在河边的木材，经请他们吃饭并送钱行贿后，他们也就手下留情了；为了避免枪枝被夺去，矿警夜肩着枪弹游动，方得幸免等等。经过这一系列斗争，矿山才得以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陈渠珍与湘西实业

陈树初 戴亚东*

陈渠珍（号玉璽）自1927年就任湘西巡防军统领，驻防保靖，至1949年10月作为沅陵行署主任，正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洽谈和平解放凤凰及沅陵行署的接交等有关事宜止，统治湘西近20年，在各方面有一些建树，1928年，陈渠珍在凤凰用汽油机带动水泵抽水灌溉农田，是湖南拥有和使用现代农业机械之始。但在此期间，陈渠珍为创办湘西实业还作过更多的努力，并经历了一个四起四落的过程。

在 保 靖 期 间

湘西地处湘、鄂、川、黔边境，山高水险，交通不便，陆运依靠肩挑背驮，水运仅靠沅江、峒河、猛峒河、澧水等几条狭窄水道中的木船，总航程不过200公里。长期以来，这里闭塞落后，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工业基础尤为薄弱，到民国初年，仅有些作坊和其他手工业。1921年，南北军阀混战不休，民生涂炭。偏偏天公不作美，发生了60年罕见的旱灾，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尤其是苦难的湘西人民，几乎在生死线上挣扎。这时，陈渠珍接受了谭延闿任命的湘西巡防军统领之职，移驻保靖，他在《自传》中说：“鉴于内战日亟，徒苦吾民，乃决心以保靖息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帜志，专意剿匪，不问外事。”他除提出“保靖息民”的口号外，还认为取

* 陈树初系陈渠珍长子，戴亚东曾任沅陵沙坪乡长。

得人民的拥护，是巩固政权最基本的因素。于是，他利用人民痛恨土匪的心情，自命“吊民伐罪”，实行“剿匪安民”的政策；在很快肃清土匪，统一湘西后，便通过办乡自治、设立学校等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在西藏时，亲眼见到赵尔丰办学对治边的益处，他对赵的治边措施极为赞赏，并极力效法，也在湘西发展教育。1921年秋，他派员赴省，洽聘师资多人，在保靖县大兴土木，建筑校舍。适值旧友董禹麓从西安回来，盛赞山西自治。当时，国内大小军阀纷纷割据称雄，有的占据一省，有的占据几省，纷争不息。而阎锡山自民初占据山西省后，便打着“保境息民”的旗号，自搞一套统治措施，任凭军阀纷争，他既不参加混战，也不容许其他军阀进入山西境内扰乱。因而，山西成了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董禹麓对此称赞道：“阎锡山之所以称霸一方，莫敢谁何者？有赖于地方自治。”陈很感兴趣，专于9月份召开了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会上，他报告说：从来武力不足恃，秦始皇武功盖世，不二世而亡；楚项羽百战百胜，亦自刎而死。故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目前必须偃武修文，与民休息。我认为办乡自治、设学校是当务之急，希望大家一心一德，共襄盛举。”会后，即派秘书长陈伯齐率同教职员工20余人赴山西考察。并聘请国内名流梁漱溟、瞿方书来保靖襄理自治之事。

考察团返回后，他召集乡制审查会进行商议，决定立即推行地方自治。他一再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混战多年的湘西，今已平安，为政之道，在于偃武修文，使民自治。”于是，他们草拟了地方自治条例，组织了10县联团委员会。以乡为自治单位，^①选出乡代表^②5至7人，^③互推乡长^④1人，组成以乡长为首的自治委员会，分设教育、实业、慈善、团防四组。并成立保卫联合团，10人一班，两班一排，枪支由地方派款购买。随即，各乡着手进行办教育、办工厂、修街道、济灾民等几项

自治建设。与此同时，陈渠珍又提出“不与民争食”的口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统领部成立了军农、军工各一大队，寓兵于农于工。军农队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常驻苗乡，兼负保卫边区任务。军工队在保靖境内办起了几个工厂：军工修造厂，设在保靖考棚内，仿造汉阳枪，并造子弹、掷弹筒，技术人员是从四川聘请来的；被服厂，设在保靖祖师观，产品主要是军服，同时也生产民用产品。在十字街设“军工产品发行所”，销售皮鞋、棉纺品、棉花；皮革厂，可制“文皮”、“烤胶”；木工厂，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师傅，传授木工技术，打破了本地落后的“沙刀木匠”作业方式；笔工厂；火力发电厂，筹建许久，从武汉购来锅炉一座，其他设备也已运到。1925年，川军熊克武假道赴粤，突然从慈利、石门进攻花垣、永顺、保靖，陈渠珍措手不及，湘西巡防军一时难以集中，保靖所有工厂被摧毁，火力发电厂停建，统领部也被烧掉。为此，受到湘西人民的责难，说陈事前毫无准备，以致湘西各县遍遭蹂躏，损失惨重。于是，陈引咎下野，由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重领湘西军政。

陈渠珍这次初办实业虽然为政治形势所迫而失败，但他在办实业时培养的技术骨干和所办的训练技术力量的学校，如女子职业学校（分针织、扎花、缝纫等科）、模范小学（附设工艺科、皮工科、藤工科、毛笔科、雕刻科、印刷科等）、茶叶讲习所、棉花讲习所等各类专业学校训练出来的各类人才，却为以后的湘西开发和大办实业打下了基础。

驻 军 凤 凰 期 间

1926年，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为结好于陈渠珍，任命退驻乾城的陈渠珍为湘西屯边使。1927年，陈通过唐生智、贺耀组的关系，复被任为独立第19师师长，遂回驻故乡凤凰。1930年，

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在南京的湖南人士纷纷指责何键。蒋介石为了牵制何键，直接任命陈渠珍为新编第34师师长，每月津贴3万元。从此，他便“名正言顺”地大肆扩充部队，编了5个旅及各县保安团，全师人枪超过了3万。从1927年至1934年，继续推行地方自治。所设“湘西十县联团委员会”由各县豪绅任委员，常驻凤凰，作为咨询机构。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努力开发地方经济，大办地方实业，一时商旅云集，凤凰成为了当时湘西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

这一时期，陈渠珍在凤凰所办的实业有以下一些：

一、造枪局。1929年创办，地址在太平宫，有人员五六十名，多是以优厚待遇延聘的技术人员，来自长沙、常德、保靖、宝庆（今邵阳）等地，其中以宝庆人最多，长沙人赵品三主持厂务。造枪用的煤炭、钢材来源也很困难，多是通过关系从外地购进。造枪局最初以制造“上甲板”（一种仿汉阳造的步枪）为主，兼事枪械修理，全部手工操作。一人一月只能造一枝“上甲板”，但诸如枪筒、枪仓、枪柄、枪托等全能制造。工人工资每月银元30块。1932年，造枪局迁至老营哨，添置了一台5千瓦的发电机、一台车床，于是改部分手工操作为机械加工，继而制造出土式迫击炮、掷弹筒、地雷、榴弹枪等。榴弹枪被命名为“凤造枪”，有落地开花与空中爆炸两种弹头。此外，造枪局还多次试制过枪弹，都因技术未过关而失败。1935年，陈渠珍离开凤凰，造枪局随之解散。但造枪局留下的技术人才和设备，却为凤凰以后的机械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印刷厂。清末民初，凤凰县一直沿用木板活字印刷。至1928年，孙淑荣添置了石印机三台，圆盘机一部，方开始使用石印和铅印，用于印名片、信封等杂件。1929年，陈渠珍在沙湾万寿宫设印刷处，有石印彩色机一部，对开铅印机一部，圆盘机一部，主要印师部书刊，以后又印湘西农村银行钞票。直

至1941年，凤凰县先后开办印刷业务的有文化书局、文星书局、谭泰记、寿洪大、大智书店等，均以石印为主，印刷业颇为活跃。

三、吗啡厂。1931年，湖南省主席何键主动提出与陈渠珍合伙在湘西设吗啡厂。何、陈几度磋商之后，达成在凤凰开设吗啡厂的协议：共同负责，利益均分，严守秘密。陈当时感到军费短绌、弹械缺乏，认为与何合力经营吗啡，既无损失于军事，经济上又可得到好处，便派戴季韬与刘益章接洽筹办该厂。1932年，吗啡厂在凤凰昭忠祠开业，由禹清吾、刘益章、翁小斋主持，每月用鸦片烟土100余担。次年夏，迁厂至沅陵麻城巷。第三年春，何键与贵州王家烈合力进攻湘西的前夕，吗啡厂停办。

四、皮工厂。地址在火神庙内，所制“文皮”、“烤胶”很有影响。

五、木工厂，地址在西坨，引进了先进木工技术。

六、火力发电厂，地址在西门坡，既供生产用电，又供照明，但未普及到民间。

由于陈渠珍提出了“不与民争食”的口号，大办实业，所以，这一时期，凤凰县民间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从1927年至1934年，凤凰县的手工业已从几种铺店发展到19种行业：铁业、木作业、油漆匾对、篾匠、铜匠、锡匠、缝纫、染业、银匠、鞭炮、陶瓷、印刷、压面、纺织、造纸、制革、制笔、卷烟、刺绣等，人员增加到800多人，出现了作坊和半机械化生产（缝纫机、压面机），生产效率相对提高。

另外，陈渠珍苦于湘西无金融机构，还联合凤凰、麻阳、辰溪、泸溪、永顺、保靖、龙山、永绥（今花垣）、吉丈、乾城（今吉首）等县，于1932年9月1日，集资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行址在凤凰县城东正街（道门口）。该行系官商合办性

质，资本原定官方筹30万元，湘西11县人民合筹30万元，实收资本30万元，内部组织分发行、会计、出纳、营业、文书五课，职员共20人。该行普通营业，亦分存款、放款、汇兑三种。存款包括往来存款，特别往来存款，暂时存款。放款包括定期放款，活期放款。借贷以农村为主，汇兑则以省内小款汇兑为多。因储蓄营业不甚发达，并入存款科目经营。该行经湘西地方当局特许发行了货币，计分一元、三角、一角数种，总额30万元，但实际发行额仅在10万元左右。董事长肖官璘，总经理为黄翊湘。

1935年春，何键以陈渠珍与贺龙的联络员覃甫臣有来往为借口，指责陈“剿共不力，有通共嫌疑”，逼迫陈部接受改编。将其部队由顾家齐、包轸率领开出湘西。陈以“省政府委员”的空衔移住长沙，结束了他在湘西的割据局面，所有工厂和银行也因此而停办。

在沅陵行署和湘西绥靖公署期间

1937年9月，陈渠珍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的帮助下，利用凤凰苗胞抗租反屯的炽热情绪，于幕后策动屯务军指挥龙云飞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革屯”运动。有屯七县纷纷响应，矛头直指何键。由于“革屯”运动的兴起和国民党上层的相互倾轧，何键被调离湖南，由张治中主持湘政。因革屯军首领多为陈的旧部，张治中就起用陈收拾残局，于1938年3月将沅陵绥靖公署改为沅陵行署，以陈渠珍为行署主任。同年6月，张治中巡视湘西各县，在沅陵时邀陈到对河凤凰山上看望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将军。当张治中看到湘西人民吃的是包谷、红薯、野菜、葛根时，发出感叹，表示非常同情。他与陈谈起了两大任务：第一，安定湘西；第二，开发湘西。这时，陈受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思想影响，变得比较开

明，决心安定和建设湘西大后方，为抗日战争作点贡献。于是，沅陵行署拟订了《湘西开发计划》，经张治中、朱经农、尹任先审定后实施。从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的一年间，陈在湘西实业方面下了大气力，湘西经济东山再起，一度出现复苏的局面。这一时期，陈从以下几方面作了努力：

一、派大庸人田季瑜率领勘探队赴湘西各县探矿。沅陵的柳林汉金矿、凤凰的汞矿、花垣铅厂等厂矿，都是这一时期勘探的。经勘探后认定有开采价值的，就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开采。现在，这些厂矿几经变迁，仍在经营。如沅陵的柳林汉金矿，已发展成现在的湘西金矿；花垣的铅厂现在已成为猫儿乡的多办企业；凤凰的汞矿更是兴旺。明末以后，各地矿商先后在凤凰县猴子坪开采汞矿，常有矿工100余人。由于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矿洞内时有工人窒息、中毒和塌方事故发生，死亡者甚多。1939年，陈渠珍派人在此地进行勘探后，上报经同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湖南省政府决定合办汞矿，与5月份成立了汞业管理处，接收了猴子坪汞矿，至1943年11月因“产量不旺”而停办。1951年，湘黔汞矿公司路腊汞矿接管了猴子坪矿区，设为该区的一个坑口。1962年，并入新晃汞矿，至今该矿的生产仍在发展。此外，陈渠珍还开办了靖县金矿，淘取沙金，因入不敷出，不久停办。

二、在麻阳办糖厂炼制白糖（厂长黄其镇），由杨幼衡主持，用野生纤维织布、野生植物（土茯苓、刺梨）酿酒；还在洪江办了纸厂（厂长谭天平）。

三、办纺纱厂。清末至民国，湘西纺织业都是家庭分散作业，用手摇车纺纱，一天只能纺几两纱。木机织布，一天一人只能织一丈多布，扣面很窄（一般1.2尺至1.6尺），多为用户加工或自产自销。在这种情况下，陈渠珍创办了凤凰三一纺纱厂和乾州三一纺纱厂。凤凰三一纺纱厂有200工人，厂长由朱

鹤楼担任，棉花由湖北等地购来，也从外地采购一些“洋纱”。纺纱厂开始用铁机织布，但只有两部铁机，其余均为木制弹花机、脚踏纺纱木机，因此，从弹花到织布形成了一条龙的生产线，可生产府绸条子、太阳尼、绒纹尼、白绒布、帐子布、条子花布、格子花布、秋花尼等品种，自产自销。在乾州小溪庵创办的另一个三一纺纱厂，厂长由向敦五担任，招收湘西各县女青年进厂学习纺织技术，规模曾发展到约千人。他们自制了木质纺纱机，每次能纺30根纱，可生产毛巾、白布和各种花棉布。年产布匹800匹，产值80余万元，布匹销往川、黔地区。以上两厂因年需要棉纱5,000斤，而棉花又是向国家农本局借的，所以成本较高。为了解决这两家纺纱厂的棉花来源问题，沅陵行署曾几次专门行文，号召当地群众大种棉花，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棉业技术培训班。这些技术人才成为解放后凤凰县和吉首县办棉织社、工艺厂、纺织厂的生产技术骨干。

四、办沼气。陈渠珍就任沅陵行署主任后，曾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生活燃料这一问题。湘西地处山区，木材资源丰富，煤炭开发却很小，因此人民生活主要靠烧木材。如何做到既不毁掉林木，又能解决生活燃料问题，陈几经周折，聘请了湘潭文光汉，引进了沼气制作技术。他首先在沅陵行署建起了沼气池，并获得了成功。那一时期，沅陵行署点灯、烧火、煮饭都用上了沼气。只是还没有推广到民间，政局就发生了变化。

五、办实验农场。为了发展本地农业，引进先进农业技术，陈渠珍聘请了金陵大学农作系毕业生熊南波，在乾州对河办起了实验农场。主要实验项目有：棉花培植、水稻栽培、西红柿栽培、油桐栽培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进行了推广。如油桐一项，湘西一年就可收30多万担。这些油桐大多在1958年被砍掉。

长沙文夕大火后，张治中离职，薛岳继任湖南省主席，沅陵行署改为湘西绥靖公署，仍以陈渠珍为主任，职权不变。

1939年5月，薛岳撤销湘西绥靖公署，将绥署所属部队编为新6军，辖暂5师、暂6师、任命陈渠珍为新6军军长，实际军权由副军长沈久成掌握。陈明知这是薛岳的调虎离山之计，拒不就职，径往重庆辞去此职。由于薛岳主湘，陈辞职后不愿回湘西，便到已故生母的故乡四川省南川县，搞起实业救国来。

在 四 川 南 川 前 后

1939年至1944年，陈渠珍离开军政界，在四川省南川土桥和贡家湾，开始了造机纺纱、笺书训子、不问政治、醉心实业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对几年来的处境作了这样一番回顾：“予二十八年三月来川，今已五载。携眷远寓数千里外之南川，此梦想所不及也。予生平不善治生，而处此生活高压之下，穷愁交加，亦即三载，更梦想所不及也。予何以处此？亦曰‘知命乐天而已’。予五载以来，所处之困苦，在旁观皆为予感叹苦者。岂知此五载中得以纵观经历，涵咏有得，著述之书皆有多种复稿，此一幸事也；予历年治军乡土，军事倥偬，竟无一日之暇……近即专意课督两儿，日进不已。授以经史，亦自得益不少，此二幸事也……陈殚心著述，垂诸久远而外，更悉心纺织，精研机械，此又一幸事也。”这一时期，他作了这么几件事情：

一、创办南川县三一棉麻纺织社。全社人员最多时达500多，并设组导班，组导即组织、领导之意，由刘文蛟任班主任。招收四川各地青年来组导班进行培训，结业后到各地推广纺纱技术。他在三一纺纱机“纺纱须知”的封面上这样写道：“鸳鸯绣出任君看，愿把金针度与人”，表明了他的胸志。他还曾尝试过向农村推广一次能纺10多根纱的纺纱机。

二、专心研究木质纺纱机、手摇灌田机。他经反复研究，自行设计了木质纺纱机和手摇灌田机的图样，请木工、铜工制造

出一种新式的纺纱机、灌田机，试用一段后又加以改进，重请匠人制作。这样，经常改进，不断试用，每改一次，便有一大批旧机器作废，因此，年年亏损。由于纱厂也连年亏损，陈囊空如洗。一次，陈只得写信给蒋介石、何应钦、陈果夫、张治中，反映薛岳提走他的电台，要求索价退还。结果，得蒋批还7万元，遂解燃眉之急。那时，虽国难当头，但各地购买纺纱机的人，都纷纷来到南川陈的住处，要求购买。陈还把军委会抗属工厂交由周亚伟等人主持，该厂办得很兴旺，产品打向了四川成都、自贡，云南昆明、蒙自、开远，贵州印江、思南等地。陈在推广技术方面肯下本钱，既送机器又送技术，每运一批机器出去，就要派去专人前往购货厂家观察机器功能，搜集意见，以便进一步改进。在重庆等地展览的机器，也是边展览，边推销，边传授使用方法，以致于机器销路一时打开，连巴基斯坦等国也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前来购买。

三、研制弹棉机。1944年，陈渠珍应旧部田士珍、肖泽远、田瑞成之约，迁居贵州印江。印江人民有纺纱、种棉的传统，以纺纱、种棉为副业。陈渠珍到此后，一心研制弹棉机。不久，便制成一批弹棉机，销往全国各地。

1945年8月，薛岳离湘。陈渠珍从印江返回故乡凤凰，便推广使用5年来在南川等地研制的纺纱机、灌田机、弹棉机等，并且发动当地人民从事水力弹棉和种棉，把棉花与牛毛混纺编织成冬帽等日用品出售，湘西的纺纱业、手工业等实业一时又有了兴旺的迹象。

1949年6月，陈先后接受了宋希濂和省主席程潜委任的湘鄂川三省边区绥靖副总司令及沅陵行署主任的职务，并移署乾城，又重新控制了湘西地区。

1949年秋，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向大西南挺进，陈由乾城退避凤凰黄丝桥。经中共湖

南省委、中共湘西区党委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多次派员向陈做工作，陈于10月中旬，欣然接受邀请，去沅陵正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洽谈了和平解放凤凰及沅陵行署的交接等有关事宜，其后所办的实业都交给了人民政府。

陈渠珍在湘西创办实业虽经历了四起四落的过程，但为湘西解放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田太平 整理）

唐伯球在实业界和军政界的经历

唐鸿钧 章劲柏*

先父唐伯球离开我们已有29年了。时光易逝，往事犹新，他勇于负责，坚韧不拔，毕生为振兴湖南工矿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在湖南和平解放运动中，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精神，更使我们永志不忘。兹就记忆所及，概述他的平生事迹，以志怀念。

一

先父原名启虞，后改名伯球，以字行。1891年3月出生于湖南桃源县漆家河乡。其父世思，前清秀才，因不满清政，与乡人聂岸湖参加反清运动被缉拿，隐名游学于慈利，林伯渠即是他当时的学生。事态平息后，在漆家河乡设私塾，后又与聂岸湖创办常德高等普通学校，并在常德中学任国文教员。覃振在该校读书时，公开从事反清活动，在街头演说，散发传单，当地军警包围学校搜捕。他把覃藏于自己寝室的床底下，得以脱险。事后常德知府兼学台朱其懿，念其年轻，仅开除学籍了事。

先父兄弟4人，他居长，与二弟仲庸先后同在长沙明德中学及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高工）学习，于1916年毕业。他学采矿科，仲庸攻读机械科；三弟叔赤和四弟谦益在

* 唐鸿钧、章劲柏系唐伯球的女儿、女婿。

乡务农，雇一长工，共同耕种，遂成大户。

先父于高工毕业后，在衡阳甲种工业学校矿科任主任教员。护国战争时，在林支宇手下任湘南民政处技正；1918年，林伯渠任湖南财政厅长时，他任矿务科长；1920年，唐生智之父唐承绪任湖南省实业司司长时，任该司秘书兼科长；实业司改名为湖南省建设厅后，父亲专任第三科科长，主管矿务。1924年，林支宇奉孙中山命北伐，与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同驻常德共同讨伐赵恒惕时，他先任湘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后改任第一军警卫团团团长。湘军失败，林离湘去沪，将警卫团改为正规团，他仍任团长，驻扎麻阳。不久他将部队解散，去沪闲居。1929年，出任湖北枝江县长。1930年回到湖南，仍任湖南省建设厅第三科科长。1932年至1937年任水口山铅锌矿矿务局局长；1938年至1946年任湖南省纺纱厂厂长。其间，先后在安江改设第一、第二两纱厂，直至两厂合并，仍任该厂厂长。在他初任厂长时，正当抗战局势日趋紧迫之际，时艰任重，特别是长沙大火后奉令迁厂安江期间，限于当时条件，万吨以上的机件物质在只能用木帆船装运疏迁的情况下，先由长沙迁移沅陵柳林汉地方，然后改迁黔阳县安江建厂，实属不易。如此辗转搬迁、溯沅水而上，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他经常亲临前线指挥，与船员、职工一道同甘共苦，任劳任怨，坚持不懈，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于1940年在安江建厂开工。其时上海、青岛等地纱厂相继陷落，后方棉布奇缺，所幸安江纱厂适于此时开工生产，人民生活，实赖于此。纱厂开工不久，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派其同乡亲信雷泽榴任副厂长，雷恃薛为后台，刚愎自用，厂权独揽，先父难以与其共事，坚决辞卸厂长职务，请准在安江大塘坪地方将长沙文夕大火后运到安江的残余机件，清理擦洗，陆续拼凑约4,000锭，筹设第二纱厂，开工生产，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二两厂合并，雷随薛去职，

先父又被任命为该厂厂长，1946年辞职。

他于主办省工矿事业之余，曾经探测地下矿藏情况，跋山涉水，走遍湘南、湘西10余县，多次发现锑、钨等稀有金属，除与同学皮名振合著《矿冶学》一书以应实用外，还集资创办了双利钨矿公司。当湘、贵的纱布奇缺时，他又集资创办以印度纺织机为主体的展溪利民纺织厂，以解民困。

1946年，先父被选为湖南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我们曾问过他：“您本是实业界人士，为什么要竞选参议员？”他说：“抗战八年，创巨痛深，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民怨鼎沸，敢怒不敢言，我竞选省参议员就是要借议会一席之地，替人民说话。”

二

早在1920年间，先父在长沙经周震鳞、覃振介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后来未再登记。1948年3月他去南京，由戴朝震陪往上海，与当时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郭春涛取得联系，经郭、戴两人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被派回湖南任民革筹委会常委，发展组织，并资助组织加强地下工作。同年8月经家兄唐鸿烈函介，他去香港向李济深请示反蒋机宜。李除指示积极发挥参议会作用外，还要他在湘西组建民主联军，期与解放军配合维护地方治安，他以久离部队，又与当时地方军队并无联系而婉辞。

程潜从南京回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前，由于不满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又与先父无历史关系，曾嘱由鸿烈迳电先父去南京面商，藉以了解湖南情况。此后赵恒惕辞职，同年12月省参议会改选，他经程支持被选为议长。当时，鸿烈任监察委员兼内政委员会召集人，并作为程的私人代表住在南京，经向程推荐戴朝震任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

任。同年12月底，鸿烈离职回到长沙居家，即向程和先父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情况，说明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溃，力劝相互配合，及早起义，实现局部和平。在此前后，先父曾在参议会内组织座谈会反对“以战求和”，主张“反战求和”，他于1949年1月间以省参议会名义通电呼吁和平，提出取消“动员戡乱”，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主张。同时推动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又先后提出了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实行自保、自卫的主张。他除邀请周震麟自宁乡来长沙，并面请仇鳌与程合作外，又于1949年二三月间两次亲赴东安县面邀唐生智与程共策和运大计。

同年4月间，经鸿烈介绍，先父与解放军地下策反组织3130负责人之一王灿然和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分别取得联系，此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和平运动浪潮高涨后，他与程潜的配合也日益紧密。举凡有关和平部署与措施，凡程潜不便公开出面的，他则挺身而出，通过参议会以民意行之；或由参议会作出决议，请省政府执行；或提出强烈呼吁，迳与白崇禧对抗。例如停止征兵征粮，反对以田赋抵借券搜刮人民粮食；反对用金圆券向人民收购金银等。此外曾向程潜建议封存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不许动用、转移，以及通过当时湖南省银行发行辅币券，并自铸银元，用以抵制日益贬值的金圆券在省内流通。为了加强湖南人民团结自救，曾将“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组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在委员会内设“自救总监部”，负责编组各县地方武装，实行自保、自卫，推唐生智主持，以有利于唐、程合作。当时白崇禧已由武汉溃退长沙，白惑于形势发展于己不利，曾把唐生智逼回东安，解散自救委员会，并迫使程潜下令停止一切和平活动。“自救委员会”被迫解散后，先父又发动组织“湖南救灾委员会”，以赈救灾民。

湖灾民为由，提出了供应驻军粮食，要求客军出境等口号。当李宗仁欲将程调离湖南改任考试院长时，曾配合鸿烈利用矛盾，发动以李默庵为首的在湘黄埔高级将领通电拥护程潜主持湘政，先父则以参议会和各民众团体名义电请挽留，李、白阴谋未能得逞。

三

1949年7月下旬某日，白崇禧率武装警卫来到先父寓所，迫令他即日离开长沙，否则“人身安全不负责”。他看到湖南和平解放已成定局，遂随同程潜赴邵阳暂避，然后又同返长沙，于8月4日参加了通电起义，是为先父一生政治生活中重大的转折点。

解放后，他于1950年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8年，被选为民革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事，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9年3月，因患心肌梗塞症逝世，终年70岁。

我的父亲段楚贤与锡矿山锑矿业

段吉璋*

我的父亲段楚贤，名震寰，号蚩龢，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漩塘湾（今属冷水江市）一个手工业主家庭，1953年9月因胃癌去世，终年64岁，葬于香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父亲一生主要是在锡矿山飞水岩经营锑矿业。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压之下，父亲胸怀大志，有振兴祖国实业的决心，也有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想法。他在1924年左右开设了开源锑矿公司和源和冶炼厂等企业。当时中国锑矿的产量，按地理书上的记载是世界第一，而飞水岩锑矿产量之多，质量之纯，又冠于全国。在生产最旺时期，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每天的收入高达10,000余银元。因此，父亲所经营的事业，曾经鼎盛一时，他也成为矿业界的知名人物，被人誉为“锑矿大王”、“银菩萨”。他所走过的，是典型的旧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道路。

一、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我们祖上从新化化溪迁到橡木山。橡木山距锡矿山飞水岩约五六里，依山傍水、阡陌相间，松树成林，风景秀丽。祖上以种田为生，祖父段仲昭从小丧父，除旧板房二间外，家无恒产。青年时，靠卖豆腐、织布养活寡母。后来，祖父到新化县城

*段吉璋系段楚贤长女，现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一位堂姑母开的“致中和”商店协助做生意。祖父精于心算，不要算盘，只凭五只手指，略加考虑，便能把一些数目算得丝毫不差，管帐跑外，办事负责，又擅于经营，深得堂姑母信任。祖父在“致中和”逐渐积蓄了一些钱，便辞工回家，想自己经商。临行前，堂姑母感于他勤勤恳恳的工作，便慷慨以冷水江漩塘湾某庄屋的五六间木板房相赠。从此，祖父便离开祖居椽木山，搬到了漩塘湾经营煤炭及铸钢厂，并将该处取名“大兴庄”。

漩塘湾大兴庄，在资水之滨，水路上可通邵阳、武冈，下经益阳入洞庭湖直达武汉，是冷水江地区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该地煤很多，尤其是小型的露天煤矿，随处可见。如田再湾、仁德冲、岩里、黄家山、郑家岭、臭皮溪、段家湾、株木山等都盛产煤，价钱极低，每担只需铜钱数百文。祖父抓住煤多的有利条件，便经营炼生铁（当地叫“筒子铁”或“猪屎铁”），建有好几十排土高炉，同时又开铸铁厂。据说所有的铸件，除了缝衣服的针外，如铁钉、铁锅、秤砣、饭鼎、蒸烧酒的天锅、地锅等等一应俱全。在当时市场上铁钉极少供应的情况下，祖父经营的铸铁厂，光铁钉的品种竟有30多种。

祖父生意越做越旺，便在田再湾、仁德冲等地买煤矿，雇人开采，既作为炼铁铸锅的原料，又开煤庄作“毛板生意”。每年阴历三四月，涨“毛板水”（头河水）的时候，运煤到汉口去卖。船是一种用未经刨光的、粗糙的木板钉成，所以叫“毛板”船。船大的，每艘可装煤2,000多担，因汉口缺乏煤和木材，运去的煤卖完后，可将船拆开，好的木板做料，拆烂的也可当柴卖，据说祖父的“毛板”船出发时，多时竟达四五十艘。如船能顺利到达，则获利甚丰。祖父生意顺利，钱越赚越多，便逐步买田购地，并在大兴庄旧房四周购了一些地皮，扩建房屋。

祖父共生四子，父亲居三，长子、次子均早夭，四子也于22岁时因肺癆病故。父亲少即聪颖，读私塾，习魏碑，10多岁时，去长沙明德中学求学，毕业后，也跟堂兄段汉卿一起到汉口学做“毛板生意”。

祖父创建了颇为可观的家业，唯恐儿子不肖，不能守业，每逢夜不成寐时，必将父亲唤至床前，谆谆教以勤俭自强，创业守成之道。

祖父死时，留下的产业，除新化各地的住房、厂房外，田产每年可收租谷1,000余石。

二、矿山开采始末

锡矿山锑矿的发现，最初是在陶塘、谭家冲一带。据说，早在明末这一带已发现矿藏，当时误以为锡，故名锡矿山。因为迷信，怕破坏“风水”，一直不敢开发。到清光绪年间，风水先生刘履斋，在这里找到了矿藏，经化验才知是锑。光绪中叶，巡抚陈宝箴设局开采，私商亦应运而生。

陶塘的黄金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制造武器需要锑，所以出口量大，日产最高可达1,600多吨。欧战结束后，陶塘矿藏亦采掘殆尽，产量已不多了。

父亲经营的矿区，是在飞水岩。这是一块盆地，北面有一条大瀑布，从10多米高的悬岩上倾泻而下，宛如巨练临空，颇为壮观，故叫飞水岩。从前，这一带原是乱石成堆的不毛之地，居民稀少，孤陋寡闻，见到有人骑马走过，竟大惊，以为是不长角的牛。

祖父生前，以十六吊铜钱买了飞水岩的一些山地。祖父死后，附近的罗家边、羊牯岭一带已发现了矿脉。这些地方，分别属于父亲的族叔样柳公及族祖延沛公的产业，他们均无意开矿，父亲便卖去一些祖田，以银洋4,000元买了罗家边，8,000

元买了羊牯岭，于1920年左右开采锡矿。这里的地质结构属上泥盆纪，岩层倾斜，丰富的矿床成脉状及袋状等形态，蕴藏深达50至80米。所以，最初开采很深，耗费了大量资金，还不见矿砂。父亲很清楚，如果在关键时刻顶不住，那会导致一败涂地，甚至破产。他去请教专家，借鉴别人的经验，坚定不移地继续开采下去。终于见到了矿砂，品位十分高，前景可观，于是在省有关部门立案，于1924年左右，成立了开源锡矿股份有限公司及源和冶炼厂，正式大量开采及冶炼。因陶塘、谭家冲一带开矿在先，习惯上称为老锡矿山，一般称的锡矿山，则是指飞水岩一带。

三、矿山的开采及管理

开源公司自己直接开采的矿洞，是“源远”1号至5号，其中源远1号和2号专产青砂（很纯的矿砂），矿砂产量很高。抗日战争前，这五个矿洞共有工人约1,800多人，每天的产值大概是8,000到10,000余银元。抗战胜利后，公司又增加了二个老矿洞，因此，便改为天、地、玄、黄、宇、宙、洪。即天字号、地字号等七个矿洞。

过去排除矿洞内的地下水，都是采用灌溉农田用的人力水车，效率既低，又甚花气力，后来开源公司首创使用锅炉水泵抽水，最初，放在天字号厂，以后又迁到一个地势较低，几个矿洞相通的厂子。

招人承包

公司自己开采一部份矿，其他的矿地，招人承包。承包者叫“包头”，包头首先要找一个有相当资产，或者是有一定声望的人作担保，然后和公司互订合同，规定开采地点、年限，并缴纳一定比例的地价（如10%或20%，或一次交清）。

手续办妥后，就由包头进行开采，开采期间，受公司保护，盈利和亏损，则由包头自己负责。

如果碰上矿砂成色不高，或地下水多，资金消耗太大等原因，包头亏本而无力继续开采，可以提出自动放弃，也可以要求公司投资，或者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价款。合同期满时，双方再进行协议，或继续开采或结束承包关系。包头定点开采，出矿砂后，公司与包头分成。刚开采时，由于包头付出成本甚大，故所获利润，包头占70%，公司占30%，经一个时期后，矿砂产量日高，包头获利甚多时，公司所占的比例也逐渐提高，直到四六开，即公司占六成，包头占四成。抗战前出矿砂最多时，各包头每天的收入可达银元20,000多元，按照比例，公司便可在包头承包部份分得10,000多元。

职工的录用

开源公司和源和冶炼厂，经济上各自独立核算，但在隶属关系上，则冶炼厂属公司管理。

父亲“用人不疑”。开源公司及源和冶炼厂都设有经理，全权处理日常事务。父亲则常年驻守省会长沙，在碧湘街设立“新化锡矿山开源锡矿公司驻长沙办事处”，该处聘有专人主持工作。父亲每年回矿山小住，听取汇报及处理一些重大问题。

矿山兴旺时，来开源公司及源和冶炼厂求职的人多，因此，天天吃闲饭的人也多，但从不“滥竽充数”，宁肯天天招待饭食，而不轻易录用。雇用和提升工作人员，须经过业务考核，所以，职工都是熟悉和精通业务的，工作负责，效率高，并能独当一面。如当时源和冶炼厂有一“估砂员”杨某，经他估过的矿砂，其品种、成色、吨位均极准，因此，他的月薪达银元36元，在职工中是最高的。

职工的劳动和生活待遇

公司和冶炼厂的工作人员有总管帐、内帐、外帐、出纳、总务、进手、总监工等，待遇丰厚。

公司矿工分石工、小工、地面零工、学徒工等。石工：在矿洞内打石、爆破，每月工资折合当月谷价四石左右发给银洋。小工：负责背矿石、车水。由于矿山的地质结构，矿床成脉状或袋状，旧社会用土法开采，哪里有富矿就在哪里开，以致造成矿洞内高低不平。工人运梯出来，只能将矿石装在竹簸箕里，手提油灯，背出地面。如遇低矮狭窄处，或是斜坡，就得在地面匍匐而行。如果矿洞被地下水所浸，影响开采时，小工便要用旧式木水车车水。每月所得银洋，约可购得两石谷左右。地面零工：负责地面的一切零活，工资约可购谷一石半。学徒：每月工资八斗谷。

源和冶炼厂的工人有炉师、担石工、杂工。炉师：负责配料、烧炉等技术工作，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老工人，每月工资，折合银洋可购谷三石至四石。担石工：负责运石进炉，每月工资约可购谷两石左右。杂工：负责为炼炉送风及其他一些零星活，每月工资约可购谷一石半。

此外每年分红三次，即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以后改为两次，即半年一次，年底分红一般比上半年要多一些。

自从正式成立开源公司及源和冶炼厂后，父亲便决定了两项措施，即全部工作人员及矿工的伙食，免费供应；另是看病吃药的费用由公司负担。

公司和炼厂的伙食标准是每餐三荤三素，餐餐供应水便，职员和工人待遇相等。矿工在各厂自设的饭堂吃饭，每餐二菜一汤，饭管饱。当地习俗，小鱼小虾不算荤菜，因矿工大都有矽肺病，此病最忌小鱼虾，后来便改以豆腐为主，以及青

菜、辣椒等。各厂多自设豆腐坊。矿工每月“打牙祭”四次，两次小牙祭，两次大牙祭，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小牙祭吃牛肉、豆腐干之类；大牙祭则吃粉蒸肉和大鱼等。

开源公司聘有中医3人，专为矿工及工作人员看病。有病的矿工，由包头或监工写条子，凭身份证去看病，检药则指定专门的中药店记帐。后来锑业管理处办了一所矿山职工医院，为职工服务。此外，锑业管理处办了二所完全小学，全称是：锑业管理处锡矿山商工子弟完全小学，第一完小在陶矿，第二完小在飞水岩。飞水岩办校的房子，是父亲借出来的。两校设备完善，师资水平也较高，学生主要是矿、商子弟，也有少数附近的农民子女，全部费用免收。

矿工生活是苦的，矿洞阴暗潮湿，没有通风设备，矿石爆炸后的硝烟及矿石微尘聚积在矿洞中，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一个健壮的工人进洞，有的一年左右便患上了矽肺病，得了矽肺病后，一般都只能活三五年到十年左右。矿工死后，公司是不发给抚恤金的，如经家属申请，可发给薄棺一副。

四、矿山走向衰落

1936年1月前，锑砂炼成纯锑后，多由私商收购出口。当时，我们矿山的锑，都是卖给长沙华昌公司的李国钦。后来，国家成立锑业管理处，便统由该处收购管理。

1938年下半年，由四大家族所控制的资源委员会，为了压榨矿商，坐获暴利，突然降低纯锑收购价格。据民国27年7月16日及22日的《矿山日报》所载，锑由每吨571元降至412元，每吨下跌159元，当时，引起了工商界的骚动和恐慌。经锑业公会的执监委员会商议，公推父亲及谢于青、晏华伯、杨执端、钟笃余5人为代表，向锑业管理处交涉，要求维持原价，工人也派出代表向锑业管理处驻矿山办事处请愿。

父亲原打算改变锡矿山的落后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开采、冶炼设备，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曾请当时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钟伯谦（湖南耒阳人）教授及开采专家刘石峰（湖南武冈人）先生两人来矿山，父亲先后两次陪同他们实地勘察，并拟定了开采、冶炼计划，准备投资银洋15万元至20万元。由于资源委员会的压价，及抗日战争日紧，以上计划未能实现。

在抗战前的全盛时期，这里方圆十多里的地方，矿工、挑夫、商业人员及其他居民，多达40,000多人，简直是一座热闹的矿业城。资水、涟水流域，特别是兰田、湘乡等地受益很大。矿砂运销长沙、武汉等地，再从那里运回农村所需物资，特别是粮食，从而沟通了城乡交流，活跃了农村经济，使兰田、谷水等城镇，成了粮食的集散地。直到现在，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回忆起当年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锡业一落千丈，抗战八年中，矿山景况一日不如一日。到抗战后期，属开源公司自己开采的矿洞，每天产砂只10多吨，提炼后的纯锡，不过2吨左右。1945年夏，日军窜入新化，矿山被迫停工，人员疏散，公司和炼厂各只留三四十人看守厂房。抗战胜利后，里已逐渐恢复生产，但百废难兴，已不能再现过去的黄金时代了。

五、父亲的交游情况

父亲交游不算广泛，但他的朋友，从文人墨客到京剧艺术家、军政界的人士都有。父亲极少外出拜客，每天，家里从早到晚都有客人来访，抗战前，他所住的长沙南门外天鹅塘84号，天天都要开好几桌饭。

小时候，我记得我所住的旭鸣里1号，正厅里就挂着郑振铎先生送的一副对联，也曾看到过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看到过他赠给父亲的一帧半身着马褂的照片。

那时候，长沙的名票友黄铁龛先生，经常是天鹅塘48号的座上客，他的诗词书画皆佳，擅治印，又拉得一手好胡琴，堪称才子。再逢父亲的好友刘铨及李觉来了，大家凑到一起喝喝茶，下下棋，会京剧的便唱上几段，热闹异常。

每天来求职及借钱的人也多，尤其是年节边上，真是应接不暇。找父亲的人，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也有穿草鞋打赤脚的，什么人都有。父亲是一个重交情的人，不管谁借钱，明知道对方不会还，多少总要给一点，不至使人失望，尤其是抗战时期，一些有身份的人，遇到困难，坐着轿子来了，虽相交泛泛，但父亲碍于情面，不能不支援。而有些人，明知是来敲竹杠的，也不能不借。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工商业者，因这些事与人结怨，并不是明智之举。

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就，除自己的艰苦奋斗外，也得力于一些朋友的帮助，父亲很重视人才，凡有落魄之士来投，只要有一技之长，总是以礼待之，并给予各方面的资助，故遇事能鼎力相助父亲的人颇多。

长沙大火前，我们全家搬回了锡矿山，住在开源公司。战事紧张时，父亲的好友周鳌山、刘铨、熊博云、余焕东等都来矿山避难。后来，李觉的母亲等也来到了矿山，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父亲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抗战初期，李觉送给父亲两只受过训的狼犬，父亲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便以日本两大侵略者的名字，即松井、近卫给狗命名，喊熟了以后，每叫松井、近卫，两条狗便摇头摆尾而来。

父亲作为矿业界的巨子，无论在长沙，或抗战时期在新化故乡，客人来访，络绎不绝，许多无谓的应酬，他感到厌倦不已，常深叹无法求得一日清闲。

父亲与家乡的绅士因“十六团事件”也曾交恶一时。大概

是1930年，当我家有一矿洞开采到利仁国药店附近时，与本家祥棣公发生了纠纷。那里有一些地皮是属于祥棣公的，但父亲开发飞水岩向有关部门备案时，绘有矿山地图，除拥有地面权外，还取得了开采地的地腹权。而祥棣公的地皮，他本人只有地面权而无地腹权，祥棣公是父亲的叔辈，认为在他的地皮下开矿，是侵犯了他的产权，便寻找报复的办法。

祥棣公联合了新化县的一些士绅，将地皮卖给他们，组成同利锑矿公司，又联合新化各个乡团（当时县以下分成若干乡，又称团，共十六个，故称十六团），由本地的一个驻长沙的师长杨某，带了军队以“公矿局”的名义，占领了飞水岩我家所有的矿地，父亲束手无策，全家被迫离开矿山，分散寄居于亲友家，父亲本人则经人介绍远走上海，在上海昆明路60号刘镛家寄居了2年多，待矿山问题完全解决后才回到湖南。

矿山被人强夺数年，父亲的朋友们在社会上四处呼吁，奔走求援。后采幸有李觉仗义，派了一连人将对方赶走，矿山夺回后，不久，十六团的后盾，某师师长杨某病死，十六团因此瓦解，其中成员大都和父亲重修旧好，“冤家宜解不宜结”，父亲亦不计旧怨。祥棣公卖给“公矿局”的那个矿洞，后来由于被地下水所浸，开采起来十分困难，矿砂成色亦不好，遂停采了。

当时的锡矿山，土匪活动频繁，到处绑票，敲榨勒索，并经常发生“撕票事件”。经济稍宽的人，都惶惶不安。矿商卖了锑，要来回走几十里山路，到兰田（今涟源市城区）去领款，数目起码是几万，甚至是几十万。这些钱包括利润，整个矿山职工的工资及一切开销。过去每逢领款，总要想尽一切办法，一路提心吊胆。十六团事件了结后，父亲心有余悸，要求将这一连人留下采护矿。但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矿商，有何权安排这一连人呢？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在李觉部当一位挂名

参谋，才将那连人留了下来，并在羊牯岭修建了一座碉堡。从此，不但有力量护矿，而且外出领款也有了保障。

六、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从年轻时候起，父亲即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

据一些老人说，辛酉那年（1921年）家乡大旱，5月至7月，天未下过一滴雨，田地龟裂，禾稻焦枯，饿殍遍地。那一次，父亲用船在益阳、汉口运了几万担蚕豆救灾。又在大兴庄的门口，用二只大铁锅煮粥赈济灾民。以后，每逢天干水涝，乡下饥民多时，便要开仓济民，记得抗战时的几次灾情，父亲也从益阳运来了很多蚕豆无偿救济灾民。

抗日战争时，这个捐那个捐的多极了，如救济难民捐、抗日战士的寒衣捐等等，父亲从不吝嗇，捐辄以万计。如在捐献飞机活动中，父亲捐了好几万元。

新化县原有128村，父亲曾每村捐谷100石，作为济困周转之用，群众谓之“段捐积谷”。直到解放时，因管理完善，尚能保存积谷的村子颇不少。

父亲十分热心为桑梓培育人才，奖励有志青年升学深造，于1941年，特拨出银洋12万元设“楚贤奖学金”。6月份在《矿山日报》，登有这样一则启事：

新化县楚贤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启事

本会暂附设新化县城西正街，民范女子职业学校内，依管理规约第五条之规定，经议定：凡新化县人，不分男女，在国立、省立各中学校，及明德、岳云、妙高峰、广益、雅礼、周南、明宪、艺芳、福湘等各私立中学校，及修业农校、楚怡工校等各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国立各大学，暨南开、复旦、金陵等各私立大

学，或已肄业上列各大学一期以上之采矿、冶金、电机、机械、医科、农科等科，成绩最优，品行端正，体格健全，家境清寒者，得自本年秋季各大学招生公布日起，申请借领奖学金。凡愿申请者，可向本会，或所在乡镇公所，索阅管理规约，依愿规定手续申请贷款，听候审查。如有不明瞭之处，请速与本会干事袁绍亨先生接洽，此启。

1943年，湖南省著名教育家鄧干于夫妇率他们所办的“实验中学”学生100余人，从兰田辗转来到冷水江。鄧系美国留学生，新化人。当时，父亲慷慨的将游塘湾大兴庄的一些老房子，借给他们作为宿舍和教室，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援。父亲又曾捐银洋1,000元，给新化县城的私立上梅中学作为经费。

还有一件因捐款而发生意见的事，不能不在此一提。1926年，新化县保安团团总曹某，想为新化县图书馆去上海订购《四库全书》，他先去“老锡矿山”陶塘，找矿商杨某捐款，杨捐了银洋500元，曹后来又到我家公司，要公司捐银洋1,000元，公司经理用电报向父亲请示，父亲认为，既然杨某捐500元，我们公司也不宜多出，否则，将影响我们与杨某的关系。曹对此极端不满，因而产生意见。后来，在十六团事件中，曹成为其中反对父亲的主力。

七、父亲的家梅生活及其他

大概在我二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长沙去住，父亲在南门外建了二梅房子，一幢是天鹅塘48号，一幢是旭鸣里1号的萱圃。

天鹅塘48号的主要建筑，是一座纯西式的、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房，里面有小花园及一些旧楼式房，并有一个十分牢固

的地下室。整个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父亲和姨太太黄氏住在那里，是父亲会见客人的地方。

萱圃是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祖母带着妈妈和我以及另两个姨太太住在那里。住房左侧是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有池塘、假山，名花异草也很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便将池塘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的避弹室，每逢听到空袭警报时，便将大门敞开，让附近的人进来躲避。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天鹅塘、旭鸣里一带，全是有钱人住的，怪不得在我的记忆中，附近全是高大楼房。我家的对向，是鲁蕤平的房子，右邻是一个军长李云杰家眷的住所。这个地方，除了偶尔有挑担子卖杯子糕、油榨豆腐和馄饨的梆梆声外，简直静极了。我在这里住到九岁才回到故乡。

我们家的家庭关系非常复杂，宗教信仰也各自不同，有的信道教，有的信佛教。父亲有一个姨太太胡氏，非常迷信佛教，凡有名僧来长沙，必定去拜师。在我入小学前，就跟她去参谒过许多佛教界的有名人物。我看见过当时很有名气的圆瑛大法师，他写得一手好字，曾赠这个弟子一幅对联：“六根清静心无事；一念精专佛是亲”。我的母亲李晚英，为父亲的继室，是一个善良、纯朴而又个性执拗、刚强的妇女，她没有文化，但懂得人生在世应该作一个正直的、有自尊心的人。因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和父亲发生了争执，母亲坚决不让步，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两人反目。但祖母却始终看重这个明媒正娶的媳妇，母亲也一直受到亲友们的敬重。

我出生时，父亲已40岁，母亲30岁，按封建俗例，女孩多不取派名，但我是公认的嫡系，又是长女，父亲中年得女，便按吉字辈，取名吉璋。在我稍为懂事的时候，因母亲生活不

幸，对父亲不满，因而父亲对我也很冷淡。母亲因心脏病死于1948年。她卧床不起时，父亲去看她，在半昏迷状态中，母亲立下了遗嘱，她并没有向父亲提出，要留给我多少钱作嫁妆，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要给吉璋读大学。”10月底，年仅50岁的母亲，含着无限的怨恨离开了人世。当时，我们住在家乡中涟溪的一幢平房里，母亲出殡时，父亲身穿重孝，步行五六里山路，亲自送到段家湾坟山。父亲当时年已60，身体肥胖，又有严重的胃病，一次走这么远的崎岖山路，恐怕在近十余年来也是仅有的。我明白，这是父亲良心上觉得有愧于我的母亲。

父亲好旅游，在我读小学前，全家去过镇江、无锡、苏州、扬州、南京、上海等地。无锡的彩塑观音，中山陵高高的石级，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宛如昨日之事。

父亲曾因胃病吸过鸦片，到抗战胜利时，才下决心把烟戒掉。父亲很迷信风水，如祖父坟山的改葬，祖母的归葬满期，父亲都曾兴师动众，到处看风水，花了不少精力。

父亲还有藏书的爱好，抗战时，全家回到家乡新化，在冷水江涟塘湾大兴庄的旧居旁，又建了几幢楼房，如颐养楼、竹翠楼、环碧楼等。环碧楼的横额，是清清朝翰林郑家溉老先生写的。此楼专作藏书之用，如《万有文库》、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各种工具书等，还有抗战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定购的《四库珍本》，所有的书，都分装在红、黑二种颜色的樟木箱内，大概有100多箱。父亲还珍藏了许多古代的有名碑帖、名人书画真迹。藏书之多、类别之广为新化县之首。

八、其他经营及未完成的计划

除矿山外，父亲还有一些其他的经营，也有过一些未曾实现的设想，据我目前所知道的，大概有这样一些：

1945年，在中涟溪段庄，利用原有的老式平房，开设了一

一个小织布工厂，有旧式手摇木机20多部。工厂开设后，生产了大众化的罗巾、蓝布、青布以及其他色布和各种格子布。农民用闲时纺的纱，去兑换所需的布，减少了织布的劳动，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其他活，群众对此很满意，远近农民来兑换布匹的甚多。

抗战时期，父亲在中涟溪还建了一个果园，占地约数十亩，其中主要栽种美国和英国的无核蜜桔，其次是樱桃、梨、桃、板栗、木瓜等，又在果树中间种花生、黄花。收成时，蜜桔果大如碗，其甜似蜜，甘香无比。解放后，此桔园作为锡矿山的矿工疗养所。

父亲还有一些未曾实现的计划：

(一)开发锡矿山飞水岩锑矿之时，向省有关部门立案，只获准开采40年，40年后将由政府接收，故父亲又计划以后开采煤矿，所以很早就向政府备了案，后来在1945年，又重新向有关部门备案一次，想在附近的株木山、臭皮溪、段家湾、猪屎冲、岩里、郑家岭、仁德冲等地同时开采煤矿。

(二)长沙南门外大椿桥附近，父亲有一块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地皮，曾计划在那里建筑房屋群，租出为一居民点，名曰“楚贤里”。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征购该处建设仓库，被一坏分子钻了空子，他贿赂经办人员，将征购费全部冒领了。

九、湖南和平解放前后的情况

1948年，国民党政权如日薄西山，每况愈下，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挥戈南下。当时父亲正住省会长沙的南门外天鹅塘48号，湖南宪兵团团长姜和瀛及民主人士马子谷等人，以天鹅塘48号作为秘密聚会点，他们经常在此密议起义及迎接解放诸事。当时参加起义活动的原国民党绥署副主任唐星（唐天闲），即秘密住在我家，并由姜和瀛派半个班保护。

李明灏先生在《奉命去长沙促进程潜起义》（详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一文说：“双方和谈代表团在长沙南门外席草田段宅举行第一次会议。”其中所谈到的会址席草田系天鹅塘48号之误，此后许多人写的回忆录，都将地址误为席草田，现在顺便在此更正一下。

1948年8月，父亲当时在矿山，新化地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缺乏经费，父亲支援了黄金32两，银洋3,000元。另外又拿了银洋500元，由地下党派潘世盛、刘培增等同志护送转交给解放军147师。方鼎英先生在《我的一生》（详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也谈到，在迎接解放时，我的父亲曾资助过巨款。

1948年的年底，有人说父亲将大量金银运去香港，因此，引起了湖南警备司令部的注意。一天晚上，用小汽车将父亲及姨太太黄氏带到警备司令部拘留了二晚。后来，查明无此事，遂由父亲写了10吨纯锑的条子，作为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一个月的饷银，才允离开。此后，父亲万念俱灰，于是回到矿山。最初在飞水岩的双岩别墅住了半个月，便又去源和冶炼厂，几个月后，在罐子冲住了几天，便带着一些子女及姨太太黄氏，先从漩塘湾大兴庄坐船到新化县五里牌，再转汽车到邵阳、衡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去了香港，当时是1949年6月，走之前，曾托运一车厢纯锑去港，以作为在港的生活费用，但一直未收到，这一车厢锑一直不知下落。

父亲在港知道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先生、老朋友李党先生等准备起义迎接解放而缺乏经费时，便从香港汇寄了10,000银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解放后，国家发行第一湖建设公债时，父亲在香港仍写信授意留矿人员，购买公债达2亿多元（旧币）。

父亲在港，曾和人合股开过灯泡厂，创办过电影公司，

未几，胃病加剧，经检验诊断为胃癌，于1953年9月1日（癸巳年七月廿四日）下午1时半逝世。此后，有二子去台湾定居，另有子女二人留港。现有一孙女定居美国并入籍，姨太太黄氏已于1963年因肺癌在台湾病死。

父亲从1920年前后开始办矿，至解放前夕去香港时止，近30年中，除日军骚扰新化时，曾短暂停工外，在其他困难时期，开采、冶炼都未中断过。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矿山、公司及炼厂时，厂房及一切设备均保存完好，未曾破坏。

父亲的一生是曲折的，但他为发展民族矿业贡献了毕生心血。

1988年的旧历2月27日，是我父亲的冥诞100周岁，谨以此作为纪念。

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美籍华裔李国钦

章 执 中

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一位旅美华侨，以经营战略物资如钨、锑等矿产品为主而享有一定的国际声望的李国钦，和他所经营的美籍纽约华昌贸易公司，在国内还不太为人们所知道，却有着它传奇式的神秘色彩，现将我所知道这位企业家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一

李国钦（1887—1961），字情麟，湖南长沙人。1910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矿科第一班。为该学堂监督梁焕奎（号璧元）所赏识，旋即送往英国伦敦皇家矿业学院深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敦召返国，出任华昌炼锑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我父章克恭（1879—1935）时任该部经理，因而相互结识。因锑产品系军事战略物质，国际行情随战争爆发而骤涨，华昌炼锑公司原不谙生产纯锑的技术，仅以土法将矿砂炼成生锑（硫化锑）出口，并由英国杰克逊洋行承包代销，订有长期合同。当时，适由梁焕奎之弟焕彝在法国赫伦士米冶炼厂价购冶炼纯锑技术专利归来，并已按设计图纸设厂冶炼纯锑成功。李氏与我父力主华昌炼锑公司与英商废止包销合同，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对方同意以分期付款10余万银两赎回代销权，这是李氏与我父为华昌炼锑公司所做的一件得意之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去款海运中断，华昌炼锑公司为了在美

国开辟销路，原本要我父亲前往。但因他辞不受命，乃改派李国钦前往并和早在美国借眷入学的梁焕廷（梁璧元之五弟）共同在纽约筹设办事机构，以便销售锑品，这已是1915年底的事了。

二

李国钦到达美国后，出任华昌炼锑公司纽约分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梁焕廷任董事长，但李氏却掌握了经营管理实权。由于他勤奋工作，广交朋友，经常奔波于美国的纽约与旧金山之间，为时不久，便成为可以左右美国锑产品市场的人物，名声大振。因为国内的纯锑已全部集中于华昌，^①华昌又全力以寄售方式出口美国。从而形成了中国纯锑垄断了世界锑产品市场的局面。然而，属于战略物资之列的锑的价格，是随着战争的形势而波动的。李氏既已有掌握锑市之能力，在锑市价格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也就有了套购得利的机会。因此，待国内华昌发觉有可疑之处，提出质问时。李氏已是百万富翁了，其间，杨度（杨曾持有国内华昌股金5万元）向上海租界法源（院）起诉企图引渡回国相诉未果。^②后来，李氏约了梁焕均（系李氏连襟）到日本相晤私了，^③对李氏追究之议乃不了了之。国内华昌炼矿公司从此一蹶不振，^④终至停业破产。^⑤而李国钦为总经理的纽约华昌贸易公司于1916年经纽约市政厅批准正式成立。办公处设在Wond Wonth大厦之中。

三

李国钦在美国定居后，便与一位华侨的女儿结婚。国内的原配夫人罗氏被其休了。但他对自己所创办的企业仍全力以赴，他利用中国国内的原有关系，开拓业务。例如，他与我父及梁氏兄弟共同出资20万银两，^⑥组织裕厚钨矿公司，推我父为

经理，让梁鼎甫驻江西，在赣南大庾岭等山岭中收购钨砂，集中出口美国，由他销售，这是他经营的又一战略物质。虽然裕厚公司经营不到两年，即拆伙解散。但是湖南、江西的钨砂、云南的锡矿砂和纯锡一样，都由华昌贸易公司经营并输入美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美直达运输中断才逐渐中止。但他经营的桐油（也是输入美国贸易中的大宗）仍然继续经营购销。又例如，他为了利用美国金融资本开发湖南矿业，曾推介我父亲出任美国资本美华银行（ASIA BANKING CORPORATION, CHANSHA BRANCH）长沙分行经理，通过我父亲在湖南矿业与金融业的关系向这两方面融通资金，沟通中美之间经贸往来。我父亲任职三年（1921—1923）后辞职。李氏对中国的工商企业和国民党政府主办机构均有过业务联系。他大约为中国国内提供了近40家工厂的设备与器材，其中包括纺织、化工、采矿、炼钢、铸币厂等。而支持范旭东、侯德榜所创办的永利化学工厂的天津（塘沽）碱厂和南京永利宁厂（生产合成氨及硫酸氨）等，则出力最多。这两个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从协助制订设计方案，罗致美国专家和中国留学生，采购成套的、单件的设备，以及器材、原料等均赖李氏的华昌贸易公司全力支持。李氏本人也常亲自参与商务谈判，表示了他对范旭东的钦佩和友谊。范氏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访美，都成为李氏庄园中的客人，范氏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对李氏也有一定的感染力，从而使他们成为事业上的朋友。李氏除对永利事业有力支持以外，还为国民党政府的甘肃玉门油矿（开采原油）和在四川泸州化工厂（生产硫酸）提供了生产硫备。国民党政府要员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有意拉拢李氏，曾一度委任李氏出任中央信托局局长，李氏辞不就任。资源委员会也企图利用李氏在美国代理销售被该会统制（垄断）的钨、锡、锑等矿产品，李氏几经磋商之后，终于取得了完全代理的销售大权而

执行了这一任务。这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赢得事业的成功与声誉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他的近20年的商业生涯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一度陷入破产的困境，虽然他靠经营中国的锑、钨出口贸易起家，但同时又投入股票、债券等证券买卖。这既是美国商人一般的牟利手法，也是由于锑、钨等战略物资在和平时期任务清淡，走向衰落，利润逐渐下跌，不可能有超额利润可得缘故。我父亲对我说过，李国钦在炒买股票、债券业务中有一次失手，全部的资金都赔光，几乎要跳楼自杀。当时已夜深了，公司办公楼的职员都已下班，他独自在办公室，把窗户打开，正准备从数十层高楼跳下去……忽然电话铃声一响，他惊醒了，接了电话一听是妻子的声音，顿时打消了灰色念头，随后他太太从家里赶来，把他接了回去。听说还是由于他岳父（一个有资财的华侨）支援了他，才度过了难关。

四

李国钦在美国的事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由于他经营的钨、锑、锡等金属在战争期间，价格成倍增长，且因太平洋航运受到战争威胁而阻滞，影响了供应。他建议美国在国内寻找资源，除帮助美国政府开采了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及科罗拉多州贫(钨)矿外，又为美国政府在加拿大、巴西等国投资开矿。另在纽约长岛设立了炼钨厂，定名为华昌冶金精炼公司（被誉之为“世界钨都”）。并通过专家共同发明了一种先进冶炼方法，以冶炼各种不同品位的矿砂。李氏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方面，还扩大到稀土金属，如为美国海军核潜艇所需用的锆、铪金属而设厂，又如为综合开发钛、钼、铪、钽多种金属（世界最大的矿藏在美国俄勒冈州）设厂提炼。同时，李氏还为美国政府在巴西藏置了世界最大的铌、钽矿场并

投入经营。又取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冶炼锡的特许权，其钛矿石来自印尼和泰国，随后，又将此冶炼钛技术引进到印度，以华昌名义在那里设厂取得专利经营。由此可见，李氏所开拓和掌握的冶金矿产与原来经营的锑、钨矿产相比是大大地发展了。而且经营活动已遍及北美、南美和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他的经营范围与影响则更为国际化。这时，他既受聘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顾问，又被批准加入美国国籍。他还接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与王宠佑博士合著的《钨》一书，是美国化学协会第95集丛书，也是世界上关于钨的权威之作。基于他的功业和学业声望，他除了在美国于战争结束后受勋之外，还接受过巴西赠的南美“十字”勋章，泰国赠的“王冠勋章”，意大利赠予的“最高功勋”奖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以“李国钦奖章”奖励为研究钨产品有成就的人才。凡此种业绩与荣誉，在当时的华侨中是罕见的。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国钦收购了上述美国政府所设立的冶炼厂，并在纽约长岛、格林可夫成立“李钨公司”，生产炭化钨等钨制品。并通过其弟李照南前来湖南，就商于矿业界，表示愿为湘省提供一整套冶炼技术与设备，以便选炼原钨砂为初级钨制品出口美国。当时，与李照南联系的是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具体合作的矿场为现在的湘西钨矿。正拟签订草约时，由于解放军已取得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谈判终止了。全国解放后，侯德榜在我党的授意下，与李国钦保持一定的联系。侯一次出访日本，一次出访欧洲，都与李国钦通了长途电话。李曾表示如有机会就回国访友观光，但是李氏本人没有能实现其愿望，他于1961年某日午睡时，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享年75岁。他遗留下了巨额财产和素负盛名的华昌贸易

公司。他的家属除提留数百万美元作为李氏基金会的基金外，其余则由其妻室子女分享。其义子李振声分得李钨公司的生产工厂，这一工厂现已由我国与他共同投资的企美有限公司继续生产经营。李氏基金会则向亚太地区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中美建交后，该基金会通过我国教育部为我国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累计约四五十名，其中我省五六人。李氏的次女李廉凤及其夫婿何日华，于1962年在新加坡成立华昌国际集团，除在美国、日本、泰国、印尼等地设有外交机构外，她夫妇还于1981年来华访问，并到了湖南做了一些进出口业务。但他俩的经营重心仍在东南亚地区，在我国南海海上石油业上有投资与租赁业务。可以说这是继承其父李国钦的遗愿，为振兴中华作出的贡献。

我所知道的湖南公路建设

马 威 然*

笔者曾就读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大前身）土木科。自1924年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接收华洋义赈会未竟全功的潭湘段汽车路和乡永段路堤工程起，至1936年湘川公路完成止，计12年，此外主修南岳山上兵工筑路一年，在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南救济分署路工室主办的以美国军事剩余物资面粉，工赈修筑零陵至道县、零陵至东安、邵阳至新化、衡阳至常宁四线公路二年，以上共计15年的湖南公路建设情况均系亲身经历，惟长潭和潭乡两段路工系耳闻，但均通过调查了解并加以证实，兹将湖南公路建设情况按先后次序，概述如下。

一、长潭军路

1913年，湘督谭延闿拨款修筑长沙至湘潭的军用汽车路，从长沙小吴门外起，至湘潭十三总对河止，计驿程百里，合50.11公里，只因时局多故，工程时作时辍，至1921年冬才竣工。计费省币90万元整，每里合9,000元，比后来修筑公路（正规的）每里最高价3,600元，最低价3,000元多出两倍以上。次年8月，由商人呈请政府租用，成立龙骧长潭长途汽车公司，但因组织不善，设备不齐，无利可获。这条公路质量不佳，如豹子岭工

*马威然在湖南公路界工作多年，对湖南公路史有一定的了解。

程，主性松浮，且下有伏泉，时虞崩塌，五里堆路线坡度最大，而又与急弯连接，车行危险，曾肇祸一次，死司机、乘客各一人。全线路面铺得过薄，天雨时遍地泥泞，更为重要的是23座大小桥梁，均系砖石砌墩，安放木梁松板，上铺二至三尺泥土，雨水侵蚀，日久腐朽，行车十分危险。中路汽车路局成立后，曾将土方路面桥梁，先后整修三次，始臻完善。在营业方面，公司也增添了车辆，修建了车站，安装了电话，整顿了营业，从此交通安全比较可靠，人民称颂。湘人开“风气之先”，湘省筑长潭路是在辛亥革命后第二年，为中国筑路嚆矢，良可纪录。

二、潭宝汽车路

1921年，湘中长沙、宝庆两府所属县份，旱灾严重，哀鸿遍野，中外人士群谋拯救，长沙华洋义赈会的袁家普、谢嗣藻和青年会总干事饶伯士（美籍）、韩礼生（德人）等议决，由饶伯士电请北美义赈会，拨赈款60余万元（当时省币），以工代赈，修筑湘潭至宝庆的汽车路，驿程约360里，聘法国人格兰瑟为总工程师，主持路工计划，并选线测量，另由青年会总干事饶伯士，通过口试，录用欧阳镜寰、刘岳厚、童恩炯、马振球、杨文坦、石略、沈桢士、陈畅生等充工程员，从事具体的测量工作。测量完竣后，成立工程处于湘潭姜畲乡石槽门彭宅，开始兴工修筑从湘潭十三总起，至湘乡县城郊云门寺止，计驿程90里，合41.19公里。筑路人员均由长宝两府沿路线受灾县份的教会牧师召集灾民充任，每30人为一棚，棚有棚目，先行发给灾民安家费，并聘法国教师希理格、鲍泽贞两人管理钱粮牧发，全路线设若干站，站有正副站长，管理钱粮和工具。潭宝路修筑工程，于1922年4月开工。开工不久，格兰瑟去职，改由英国人威尔逊继任总工程师，加聘余籍传为

副总工程师，继续负责修筑工程，至1924年6月全部竣工。该会并续修湘乡至永丰路基，计驿程100里，合40.25公里的土方工程，湘潭段汽车路工程费用约40万元，又乡永段路基土方费16万余元。至1924年初冬以款绌停工。后来，华洋义赈会与省政府订约，此路由该会养护，成立道樨，养路工40名，监工2名，职员1名，每月负担费用500余元，以10年为期，并设保路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宜。

湘潭至湘乡段工程，在质量方面，如路基铺砂、涵洞、桥梁等，均合乎设计要求，坚实牢固，这样，湖南修筑的公路获得了全国公路第一的名誉。究其原因，有下列四项：（1）这条汽车路以赈灾为主，不计费用；（2）由于灾工待遇优厚，因此服从指挥，工作认真负责；（3）由于任用的工程人员均系首次参加修路工作，兴高意满，又在外国工程师指导下工作，因此颇具成效；（4）外国总工程师技术精良、虚心指导。

三、潭宝路续修工程

1924年初冬，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奉省政府令，续修自湘乡至宝庆的汽车路，委任参加过义赈会修路工程的欧阳镜寰为总工程师，马成然为会计兼庶务，这是叶的亲信参谋，做过湖南警务处长的李之瑶保荐的，李是我的亲戚，并由欧阳镜寰荐委杨文坦为副总工程师，马振球、石略为工程师，周干为测量员，欧阳雯为文牒，意思栋为书记，成立工程处于湘乡县城。经费来源于湘潭、湘乡、邵阳、新化、新宁、城步、武冈等县的各种杂税附加。与此同时，叶开鑫委任周寿龄为湘潭站长，黄钟岳为湘乡站长，购置车辆，租赁站屋，开办湘潭至湘乡段的客运业，斯时适有白俄滞湘的技师，经李葆和的介绍，被聘为运输技师，并招收学徒作为司机和修理工加以培训。当时招有陈力耕、欧阳竞明、欧阳竞成、童伯萼4余人，学习不用课本，

注重实际能力的训练，后来这班人又带徒弟，为尔后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工程方面，除马振球进驻工地外，其余人员均暂留在工程处，帮同办理潭乡段通车事宜。

四、向贺耀组建议修筑长常汽车路

我在潭宝路工程处任会计兼庶务工作，心实不愿，欲另谋出路，想起在水利局充当技士时，曾出差常德和南县，这两个县的交通均系航运，当时正值冬季滩干水浅，由马王滩至长沙必须乘民船至沅江后改换轮船，旅客异常困苦，由此心中萌发了要修长常汽车路的愿望。我向贺耀组建议说：现在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的第4师驻扎衡阳，在修筑衡郴汽车路，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则修筑了潭宝汽车路，何健旅长修了醴攸汽车路，你驻常德可以修长常汽车路，因为长常航道，每遇冬干水浅，上下轮船，通过马王滩时，必须改乘民船，延长一日时间方能到达，旅客和运输均感不便，至于经费问题，可以在公路经过的县份，抽收田赋、盐厘、杂税等附加，不虞缺乏。贺耀组认为我的建议切实可行，要我写一请帖，我承允写好，再行送来，异日我与侄儿（他是贺师部译电室主任，被视为亲信）一同坐他的差船回长沙，这是1925年秋末的事。迨转冬，我持请帖前往，贺见我，说：你来得很好，我替你写一封介绍信，去会唐规严先生，他住在东茅巷某号。随即，我便告辞了。

五、中路汽车路局

1925年初冬，我由常德回长沙后，持贺耀组的信，去会唐规严先生。唐规严名嶬，曾任湖南省务院长和省财政厅长，他与贺耀组是儿女亲家，和葛可亲。他对我说，马上要成立中路汽车路局筹备处，已择定小吴门曾文正公祠为址，即第一师驻长留守处，那里房子较多，你暂充会计兼庶务，其它事情，你可与刘崇猷商量。同日，我与刘崇猷见了面，商定交涉房屋和

借用木器什物，安装电灯电话，建起厨房，交涉门卫津贴等事由他去办；购置零星物品，装饰布置头门轿厅及代表会议会场由我办理。我们忙了好几日，一切筹备就绪后，唐院长始到处办公，委任了文牍、书记、出纳、办事员，并嘱我刻督办叶开鑫、会办贺贵严、刘锺三颢阳文牙章，凡领款与行文，均以督、会办领衔，不过领款需要具领人唐颢的章子，同时以督办名义训令长、宝、岳三府所属各县县长在公法团内，推代表一人，前来长沙，开中路汽车路局筑路会议。不久，各县推举的代表陆续到省，兹将我所能记忆的并经调查核实的各县会议代表姓名，开列如下，惟当时每县代表只一人，而下列代表名单，一县有二至三人者，或分先后，或为代表与常驻委员之别，事隔多年难以分别了。

长沙府属各县代表

县别	姓 名
长沙	李亚农（共产党员）
宁乡	刘宗向（代）、姜梦周（共产党员）
益阳	王希烈（代）
湘潭	余先励（代）
湘乡	包道平（代）、王李范（常）
醴陵	朱侶云（代）、李刺云（常）
攸县	文任栋（代）、余德广（代）、王维声（常）
湘阴	易垂象、刘家墾（常）
茶陵	谭 嵩（代兼常）
安化	李 海（代）
浏阳	罗军右（代兼常）

宝庆府属各县代表

邵阳	刘崇猷（代）
新化	谢祖尧（代）

新宁 李云植（代兼常）
城步 刘克俊（代）、祝澄清（常）
武冈 夏 纶（代兼常，共产党员）

岳州府属各县代表

岳阳 任伊平（代）
临湘 谢治熙（代）
华容 段 峨（代）、张 廉（代兼常）
平江 凌 炳（代，共产党员）、方克刚（常）

以上各县代表或常驻委员，以省、县议员居多，其余为共产党员（因在国共合作时期）和各县知名人士，所有代表由筹备处在指定的大旅社或大饭店住宿。开会那一天，叶开鑫督办和吴景鸿司长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最主要的议题是讨论经费来源，决定修筑路线规定地价和迁移赔偿办法，推选各县常驻委员负责征收各县附加和监督其用途之责。因全部路款来源于各县人民的田赋、盐厘、杂税附加，从而决定了中路汽车路局属于官督民办性质。会议最后一幕，是选举总、协理，与会代表一致选出唐曦为中路汽车路局总理，陈旭为中路汽车路局协理，择定骝子桥一号（原陶澍公馆）为中路汽车路局的局址，会议即告结束。

1926年1月1日，唐总理、陈协理正式就职，行使职权，委刘崇猷为总务处长、凌炳为财务处长、局凤九为工务处长，决定修筑潭宝、长宁、长平、醴攸四线公路。将已有基础的潭宝、醴攸两线公路，归并中路汽车路局，仍以欧阳镜寰、刘岳厚为总工程师，委马成然为长宁段总工程师，钟笃余为长平段总工程师，我以缺乏修路经验，且无班底，荐举正在湘南修路的工程员童恩炯充任，于是我改任长宁段工程师，斯时适接家电，称我母去世，即请假奔丧，二月内丧事结束来省，童恩炯已成立工程处于河西溁湾镇竹马塘某宅，异日我即随同测量路线。

1926年6月，唐曦奉赵恒惕令，代理第2师长刘钊职务

(因刘钢被唐生智扣押)，即卸总理职，是年7月1日唐生智再克长沙，委任何键为路局监督，袁家普为中路汽车路局局长，陈旭为副局长，袁局长视事后任意增加职员，而常驻委员荐举的人员又不接受，引起了常驻委员的反对，理由是路局机关官督民办。监督何键是官督，那么局长应该由民选，否则民办二字无可表现，并列出一个中路汽车路局官办、民办优劣比较表，表列民办督办叶开鑫不支薪，官办监督何键支伏马费400元；民办财务处只3人，官办财务处职员9人，此表一出，何键辞职，但袁家普、陈旭两局长，仍想恋栈，于是常驻委员进一步要路局减政裁员，说这是常驻委员的职责，但职员闻说，便纷纷拥到常驻委员会来质问，由于人多口杂，演变为武力斗争，事后，路局职员推选朱开镛、李凤池、喻科高、吴子常、左宗瀚、吴宗钦6位代表赴省政府请愿，不料全被扣押，至此袁家普、陈旭面于扫地，不得不辞职。这一场官民斗争，由于共产党员的参与，取得了胜利。中路汽车路局自从1926年1月成立起，至1929年10月第一汽车路局移变时止的路工成绩是已通车旅程660里，它们是：湘乡至永丰90里；永丰至宝庆180里；宝庆至桃花坪110里；长沙至宁乡100里；醴陵至攸县180里。还未修好的公路达450里，它们是宁乡至益阳140里；攸县至茶陵50里；湘潭至护湘关130里；长沙至高桥100里；平江至瓮江30里。以上共计收入各项附加支付工程事务局务及其它费用为光洋4,762,600元。

六、湘南汽车路局

1924年，第4师师长唐生智任湘南善后督办，成立督办署于衡阳，不久督办署设立交通委员会，以周巖任主任委员，周巖、曹伯闻、邓介松等为委员，委任刘陟为工程师，由他召集一些工程员修筑衡郴、衡永公路。1925年秋，在衡阳召开筑路

会议，成立了湘南汽车路局，选举钟伯毅为总理，杨紫为协理，委任彭寿人为工务处处长，谢尹为总务处处长，修筑衡郴、衡永、衡潭等公路，至省政府派周安汉接收第三汽车路局时止，衡阳至郴县330里已修成，而衡阳至泉湖70里，衡阳至护湘关100里、郴县至宜章60里还没有完成。以上共计收入各项附加支付工程事务局务及其他费用为光洋3,007,700余元。

七、湘西汽车路局

1927年，湘西籍的省议员，见湘中、湘南均成立了汽车路局，也召集湘西籍人士在长沙开筑路会议，选举刘翼经(号铭吾)为总理，向绍轩为协理，成立湘西汽车路局，委任王恢先为总工程师，修筑常桃、常益、洪武三线公路，至省政府派唐伯球接收第二汽车路局时，只完成了常德至桃源60里，而常德至益阳140里、洪江至武冈30里均未完成。以上计收入各项附加支付工程事务局务及其他费用为光洋1,218,000余元。湘西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土匪横行，湘西路局测量队和工程处工作时，必须从圈子里请一位头领保护，月付光洋若干元，方安全无事，至于由政府收编的土匪，仍然绑票勒索，政府人员不上报追究，而将被勒款项在公款内支付了事。

八、湖南省公路局

1929年9月，湖南省党、政联席会议议定，取消第一、第二、第三汽车路局，改设湖南省公路局，先在文星桥设立湖南省公路局筹备委员会，任命宋鹤庚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钟龄为专任委员，向绍轩、仇毅、王猷、雷铸寰、刘岳厚、姚建猷等为委员，委唐达一为筹委会第一股股长，陈翼郎为第二股长，周凤九为第三股股长；委王昌学为第一汽车路局接收专员，唐启虞为第二汽车路局接收专员，周安汉为第三汽车路局接收专员。同时成立第一、第二、第三汽车路局清查委

员会，由省政府委任邱鹏年、谢基爱、欧阳禧、李杜韩、姚建猷、朱季阶等为清查委员，路局指派李财范、财政厅的杨叙然、建设厅的谭介等为委员，推定邱鹏年为常务委员，他们制定了湖南全省公路局修建7条干线及13条支线计划，并制定了湖南公路局组织章程，在清查和接收第一、第二、第三汽车路局时，所有工程建设和营运业务，均照常进行。

会后，筹委会对于湖南省公路局局长人选进行了多次磋商，当时省政府原内定钟龄，而钟龄本人也大肆活动，他每晚约请筹委会人员和第一路局的工程师，款待酒食，但筹委会人员因恼恨他飞扬跋扈，并不买帐，其次他做过省杂税总局局长，曾贩卖过鸦片，若以省公路局长异之，断不称职，大家一致不同意他当局长。宋鹤庚遂提出，让筹委会委员刘岳厚担任公路局局长，刘岳厚系工程师，在国民党内有声誉，大家一致同意。遂由宋鹤庚报告主席何健，何对宋说，好倒是好，不过他是醴陵人，而一般人认为刘岳厚当公鹏局长，是何健的关系，殊属非是。1929年11月，省政府任命刘岳厚为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周凤九为总工程师，王昌学为会计主任。

刘岳厚到任后，感到田赋、盐厘、杂税附加病民，呈请省政府对筑路经费统筹支配，通令取消前各路局，所有公私股款，特设清查委员会从事清查，筹划偿还。至于组织方面，前路局已具规模，现略加变更，在局下设秘书室、总工程师室、事务科、业务科。凡机要文电，员工考核，属秘书室；工程设计，制图施工属总工程师室；事务科统辖文书、土地、购料、鹏核、庶务各股；业务科统辖运输、养路、机务、考工各股。原机务科暨养路，工程处裁做，仍设养路、机械工程筹各一人，分掌养路、机务技术改进及设计事项；会计处设出纳、计核、计算三课，裁去统计员；工程方面，报照省政府修筑7条干线及13条支线计划，尽先完成前三个路局未完工程；营业方面，改分长宜零，长宝

武，长浏平，长沅，常澧桃，沅晃永，醴茶安各业务段，原管理主任，改为业务段长，仍负管辖各养路队、修理分厂及各车站人员之责。其它如建立各种工程标准图表及制订机务、车务各项表报，督促不遗余力。1929年12月，省公路局根据建设厅转奉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颁发七省联络筑路计划，所有工程实施办法作了以下变更：（1）路基及砂石之一部，由沿线各县征工完成之，并负担其经费；（2）桥涵路面由公路局完成之；（3）经费筹措方法，照工费预算，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拨借40%，余者由省政府负担；（4）兴工各段由本省军事最高机关派督工委员常驻工程处，督促县政府征工事宜。

九、湖南历年竣工公路概略

湘鄂东线：以长沙黄花市为起点，经平江至界上，抵鄂通城，于1928年11月兴工，内分黄高、高平二段，分段完成，至1936年才全部建成通车。

湘鄂西线：以长沙市为起点，经宁乡、益阳、沅江、汉寿、常德、临澧、澧县抵鄂东岳庙，达鄂公安，计299公里，内由长沙经宁乡至常德已先后分段完成，常澧段于1932年12月测修，至1935年10月全线完成。

三条湘赣公路：（1）以长沙市为起点，经浏阳至东峰界，抵赣万载，计长112公里，1933年7月开工至1934年10月完成。

（2）以醴陵阳三石为起点，经攸县、茶陵至界化陇，抵赣莲花，计长159公里，其中醴攸段1927年冬开工，至1929年夏竣工，攸茶段1929年4月开工，至1933年10月完工，茶莲段1932年12月测修，至1934年4月完工。（3）以平江县城为起点，经长寿至龙门厂，抵赣修水，计长84公里，其中平江至长寿段于1932年12月测修，至1934年5月完成，长寿至龙门厂于1936年12月完成。

湘桂公路：以衡阳县城为起点，经祁阳、零陵至枣木铺抵桂全县之黄沙河，长204公里，其中衡洪（桥）段于1928年3月兴工，中经变故，至1932年5月完成，洪枣段1935年6月兴工，至1935年7月完成。

湘黔公路：1934年，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行营，派公路处处长曾养甫、总工程师李涵山来长沙与湖南当局商量修筑公路事宜，1935年3月，成立湘黔公路工程处于沅陵，建设厅厅长余籍传兼主任，公路局局长刘岳厚兼副主任，下设总务、工务两股，刘岳厚兼总务股长，总工程师周凤九兼工务股长，周炳麟兼工程师，工程处之下，另设一个驻沅行营公路处，以张鉴暄为主任秘书，下设工程、会计两科，分别负责检查和经费管理工作，该段路线，从沅陵县对河望城坡起，经辰溪、芷江、晃县（今新晃）到达贵州玉屏县境站鱼铺为止，计长451公里，全线划为6个总段，一、二、三总段工程，派浙江省工程师邹岳生等分段负责，四、五、六段由湖南省公路局派工程师欧阳斌、刘鸿照、周干三人分段负责。1935年2月开工抢修，1935年8月27日完工通车。湘黔公路全长451公里，路线既长，工程又大，全路土方2,698,542立方米，石方720,710立方米，涵境224座，水管2,012道，便桥70座，永久式和半永久式大小桥梁179座，全长2,023米，此外，还附带修建添置了渡船、站屋、道棚、车厂、电话等。公路线危险处，砌有栏槛护墙。以上仅只说明工程庞大，至于工程之艰巨，为湘南以前修筑公路所未有。湘西山岭绵亘，地势陡峻，路基工程最困难的地方，以太沅段最困难，从太平铺至沅陵，越大四岭处，从马底驿起，山势渐高，至青山岗更高，路线必循青山岗盘绕蜿蜒而上，将至山顶，用三道之字线绕过，长2,600米，山高为112米，这是一处；经峰坨至桥溪口，长约20余公里，公路沿山绕行，弯多且急，峰坨高达310米，用五道之字线绕过，再距筲箕河6公里地方，山势突高，

与地面高度相差48米，公路随山盘绕，在小关地方，两旁山形陡耸，高达70米，须劈山开路，用长约1公里的之字绕过，坡度最大达9.5%，施工亦巨，公路经过之处，山岚瘴气，瘟疫流行，本地居民，一经传染，有全家俱毙者，所以我们另设医务所办理员工医疗事宜。湘西苗汉杂居处，萑苻不靖，工棚被劫时有所闻，所以不得不派兵保护，湘黔公路工程既大，工人众多，粮食均须由汉口、长沙转运而来，由汉至长虽有火车，但由长沙转运沅陵必须水运，而自桃源以上，多系滩河，暗礁嶙峋，时虞船破，所以设粮食管理所，直隶行营公路处，管理采运，长沙则另设专员，专办工米、材料的采购运输，至于费用，除地方征工所付不计外，共费光洋267万余元，国民政府发给150万元，余由湖南的筑路经费支付。湘黔路线经过的桃源、沅陵、辰溪、芷江、晃县等5县，农产品以谷米、桐油、茶油、竹木、牛皮、棉花、果类、甘蔗、白蜡为大宗，矿产品有金、铝、锑、煤等项，特产以桃源的桃源石，芷江的墨兰和素心兰，晃县的朱砂等，最为有名，因此，这条公路对促进物资交流，改善人民生活，输入文化，改良风俗，以及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有莫大关系。

湘川公路：为湘省七大干线之一，与湘黔公路同样重要。1935年10月15日，成立了测量队，由沅陵出发勘测，选有甲乙丙三线，嗣经行营公路处，派廖工程师与本局总工程师周凤九会勘决定，采用甲线，即今修成之线，从沅陵县筲箕湾附近之三角坪起，经泸溪、所里、矮寨、花垣至茶洞，抵四川秀山，路线全长188公里，在沅陵另成立湘川公路工程处，由湖南省政府直辖，以建设厅厅长余籍传兼处长；周凤九兼副处长和总工程师，下设总务、工务、会计三股，办理文书、采购、运输、购地、工程、设计、会计、审核等事宜，另设立驻省办事处，办理采购、运输及发放工款事务，并成立医务所分驻各段，

经办职工医疗事宜，自1936年3月7日起，分五大段施工，本路土方约1,285,430立方米，石方约989,269立方米，新建及改造的大小桥梁125座，全长约500米，此外还在能滩修了一座80米长的吊桥，修建涵洞408座，水管800道，工程艰巨地方，如铁山、能滩、白鹿坳、鱼梁坳、大陂流、矮寨、下寨等七处，实驾湘黔公路之上，铁山高距地面约73米，用五道之字线绕过，长约1公里，最大坡度为13%（一般坡道不超过6%），各危险处，修建栏槛护墙，以策行车安全，能滩河系峒河支流，两岸陡峻，河深达20米，且水流湍急，河中不能建墩，故修建跨河径阔80米练式吊桥一座（为中国公路工程中之独创），吊桥钢铁练子等材料，由湖南公路局主管的湖南机械厂自制。

又矮寨工程，其山高达440米，而水平距高不及1公里，山势陡峻，可想而知，地质以石质居多，又杂砂土，路基极易被山洪冲溃，因而修建工程十分艰巨，以15道之字线绕过，长约6公里，转弯处建筑石砌转车台7座，内有高达30米者，并架天桥一座，坡度最大处为12%，建筑时工程师对能否行车尚无把握，经试车后始释疑虑；下寨河左右岸，均为崇山，左岸高60米，用7道之字线绕过，长约1公里，右岸山高约73米，用3道之字线绕过，长约600米，以上四处工程，为湖南修筑公路以来所仅见者，再者本路路线沿河行者约100公里，其余88公里，均系开凿石山所成，除各县民工用392,500工修筑外，其余土石方、桥涵、水管等工程，概用包工修筑，计工最多时达3万余人。

至12月底，全部工程完竣，工程费用达264万余元，国民政府补助了180万元。

湘川公路除各县民工以外，尚有工人3万余人，大半招自长沙、醴陵、湘乡、宁乡、宝庆等县，由于风餐露宿，暑疫迫人，病者达2万余人，死亡达200多人。

十、湖南公路局的一些突出事项

制定工程标准图表58帧：公路工程之好坏，与设计至为密切，欲求每个工程人员都有良好的设计能力，恐有所不能，且湖南的公路修筑，得全国风气之先，发展既快，需人亦多，在修路初期，一般工程人员中，有习矿冶机械的，也有学陆军测量的，而土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殊属有限，因此公路局成立后制订了工程标准图表58帧，使非土木专业技术人员对于工程设计，能明瞭熟悉，后来，许多没有学过土木的工程人员均成为了出色的工程师。

湖南公路局制订的营业规章制度和表报：省公路局成立后，鉴于民办时的三个路局所属各站的行车收支款目缺少原始单据，而各修理厂因没有材料的收支记载，可以任人上下其手，致使全局生产盈亏都无从稽考，而汽油消耗一项，与浙赣两省比较，相同的汽车牌号和吨数，他们的车辆每加仑平均可行16公里，而我们的车辆每加仑平均只行12.5公里。据计算每年的汽油费用要比浙赣多10余万元，因此公路局制订了使用汽车奖惩办法10条，并制定了汽油消耗标准率，不独于此，还对各类员工制定了纪律，如属于材料管理员者5条，属于站长者6条等等。为了防止行车事变，调查司机个性，检查司机身体，随时派员纠正司机驾驶方法之错误，还开办了技术工人训练班，编印了行车出险统计手册，分发各技工；还编印预防行车出险须知，各段组织了行车安全宣传队，成立各段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等，其它如制订售票员日报表，材料员的统计表和购料验收表以及会计、统计各项报表，应有尽有，上述工程标准图和营业的规章制度表报，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

省公路局与美、英、德三洋行的经济斗争：1933年夏秋间，因长沙美孚洋行串通英商亚细亚、德商德士古两行，抬

高汽油价格，强迫路局轮流买三行汽油，原来每加仑为银洋5元，涨到每加仑10元。当时路局特向法国购买二部煤气炉，以推行煤气车来抵制三行抬价外，又呈请省政府派兵封闭三汉矶美孚洋行，派兵驱逐其在湘江河面上的护油兵舰出境，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另想办法，将美孚洋行跑街营业员郑某，送长沙县拘押，以表示反抗，美孚洋行自知理亏，没有过激举动，三个月以后，适苏联运到一批汽油，再加上路局大力推行煤汽车，委向德为长衡段煤汽车机械工程师，划长衡段为煤汽车实验区，美商的卡价完全被粉碎了。而经手推销汽油的买办，相率改业，洋人亦相继归国去了。嗣后路局在美孚洋行买汽油，他们很客气，按照当时市面实价每加仑收7元款。

公路局使用木炭煤气车：1931年，各省公路事业发展甚快，汽油进口陡增，利权外溢，若不设法补救，遗患不堪设想，补救办法固宜自制汽车，而另方而尤须解决燃料问题。早在1930年，建设厅曾发下沈甲君寄来法文煤气车方面的资料多种，并译成中文，藉供研究。

1931年秋，路局由秋洲定购煤气发生炉三种，计德制一种，比制二种，以资实验。1932年1月，建设厅派员专心研究煤气车，并自行设计制造煤气发生炉，所有费用概由路局负担。8月，建设厅以自制之炉，于“双十”节在长沙公开试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公路局均派员参加，结果尚佳，颇获好感。嗣后，煤气车在长衡和潭宝武两段公路投入使用。

湖南机械第二厂自制汽车零件：1934年1月，公路局长刘岳厚兼湖南机械厂厂长，将原公路局修理总厂归并湖南机械厂，改为机械第二厂，公路局成立后，鉴于汽车行驶所需汽油、机油、车胎和五金零件等，均由美国进口，利权外溢，为数惊人，于是由王维声等学机械的技术人员，在第二厂制造汽车零件。当时很多人认为没有制造零件的技术和经验，这不可能成为事

实，但因王维声的坚持，又得刘局长的许可，并委姜既庭、黄纶二人主持其事，当时姜、黄等人也没有制造汽车零件的经验，但因吸取了技术工人的智慧，试验终于成功。三年后，绝大部分零件都能自制，并将自制零件装成一部车，取名衡岳，卖给省公路局，经试车性能良好，于是美国在长沙的零件公司从此倒闭。湖南公路局自制汽车零件成功后，消息迅即传遍各省公路局，于是来湘取经者络绎不绝。湖北省公路局函索技术人才，公路局派黄纶前往，任湖北省公路修造厂厂长，安徽来函请派机械人才，公路局派谭嵩带5名技工前往，任安徽公路机械工程师，四川公路处请派机械人才入川，公路局特派劳启寿率技工2名前往，被委为机械副工程师。嗣后全国各省公路局均能自造汽车零件，这一创造性的工作，非独解决了湖南利权外溢，同时全国所有汽车的零件不需要再向外商购买了。

十一、湖南救济分署以美面粉工赈修建邵新、零道、零东、衡常四线公路

1945年冬末，余籍传奉行政院救济总署令充任湖南救济分署署长，他由重庆回湘后成立湖南救济分署于韭菜园圣经学院，当时主持筑路的单位为路工室，以王正己、谢世基两专门委员主管，下有技正马成然，另有两位事务人员周筠（女）、郑某，以美国军事剩余面粉，工赈修筑邵阳至新化75公里，以李泽民为工程师；零陵至道县75公里，以任匡华为工程师；零陵至东安45公里，以沈桢士为工程师；衡阳至常宁57公里，由谢世基主修。于1946年春同时兴工，至1947年底先后完成，路成后移交省公路局管理，随即通车营业。

十二、南岳山的兵工筑路

1943年冬，我结束了建筑南岳忠烈祠的工作后，忽奉建设

厅令，任南岳建筑工程处主任工程师，因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要把南岳辟为文化区，所以要修筑新的公路，线路从大庙前起，上山至半山亭、磨镜台、南台寺，下山至商专校，要能行驶小汽车，沿汽车路两边还要加建房屋，自大庙前至磨镜台段，在建筑忠烈祠时已经修好，现在要修的就是从磨镜台起，经南台寺下行至商专止，建设厅委王汝良为筑路工程师，黄滋三为副工程师，颜某充文牍，周瀛家充出纳，马最良充会计，杨镇海等人充监工，于1944年3月，由九战区司令部调来兵工一营筑路，开始由我具体指挥，4月，建设厅加委南岳管理局局长石宏规兼工程处长，委王汝良为工程处课长，但均未就职。5月，时局紧张，建设厅电请石宏规将厅拨经费（因前建设厅直接汇给工程处20万元纸币），连同工程处存款15万元，共35万一并汇厅。6月，日军占领南岳，工兵营撤走，所谓南岳山上的兵工筑路，也就至此结束。

十三、周凤九的镜公磨之慨

张治中主湘时，有一位高级军人（忘姓名）向某汽车站索派专车，站长未予首肯，他便迁怒于局长周凤九，于是向张治中进谗言说公路局长周凤九贪污，应该惩一儆百，张信以为然，于是派军队包围公路局，禁止出入，将路局财务上的所有帐簿单据，全部带走，并将周凤九寄押晏家塘某部队，严禁与外接洽，口口声声要枪毙。这时周凤九的亲友奔走营救，于是由在湘有名望的人，如余籀传、宾步程、曹典球、周震麟和国民党中央公路处曾养甫等人，向张求情，均遭拒绝，最后由同乡陶峙岳设法请得李宗仁、白崇禧两人来电，张始将周凤九移送法院法办，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指出周凤九的罪案是慷公家之慨，才予释放，了结此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公路局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沈

楨士，绰号沈三阎王，他与周凤九是亲戚，沈的堂嫂是周的姐姐，沈狂嫖阔赌，挥金如土。据李浦青说，他曾劝过沈二次，第一次是沈赌钱赢了1,600元，劝其收手，沈不肯；第二次是他输了2,400元，沈回答要扳本，结果沈挪用了6,000元公款，他写了一张欠条，交会计唐菱生。后来周炳麟工程师来接收，鉴于此他不肯接，公路局知道后，派欧阳镜寰到沅陵了解，欧得知沈亏款情形向周局长汇报，于是周凤九开了摊派名单，计摊了300元的有欧阳镜寰、周炳麟、童恩炯、石略等，200元的亦有多人，据说外面的同学如唐伯球、张铭西等人也分摊了。这6,000元就这样了结了。

以上所述，虽是笔者亲身所历，然以时间相距太长，记忆力差，错漏难免，尤其是西、南两路局资料太少，希望知道内情者，加以指正和补充。

张叙丞与湘黔公路

张远翔*

1935年夏季的一天，湘黔公路工程处职工和民众代表，怀着敬慕与悲痛的心情，在湘西沅陵县城为湘黔公路工程处主任秘书张叙丞举行葬礼，将他的灵柩安葬在县城南郊的风景胜地——沅水河畔的凤凰山上，以示怀念和景仰。

张叙丞，又名张鉴瑄（1892—1935），湖南沅陵张家坪肖家冲人，幼年入私塾，勤奋好学。1908年读完五年小学后，升入中学；192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主席，曾执笔撰写《天津学生告世界各国人士书》，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

张叙丞为人谦恭，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八联合中学（即建国前的辰郡中学）任英语教员时，有学生周佛海因故辍学，他深惜其才，为首资助周留学日本；在任省参议员、省司法司司长时，有人徇私舞弊，将馈赠的点心盒内暗藏钱钞，他一经发觉，则当面拒斥。他供职外地，凡遇德才兼备、外游谋事者，必纳或荐，使其发挥作用。后来回乡主持路政，骑马兼程，每过村寨，必下马步行，以示对故里父老乡亲的尊敬。其轶闻趣事，至今传为美谈。

1926年，张叙丞离湘去南京，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编建委员会秘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学教官、南京《青白日报》总编辑兼主笔等职。1931年他当选为国大代表，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国

* 张远翔系张叙丞之子。

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老同学曾养甫知道后，即于1933年，邀请他去杭州，出任浙江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兼闽、浙、皖、赣四省行营公路工程处主任秘书，得以与在北洋大学时的学友茅以升共事，分别主持筑路的行政管理与工程技术工作，两人皆为曾养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初，该工程处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湘黔公路工程处，曾养甫任处长，张叙丞遂以开拓湘西交通事业为己任，随曾养甫和主要工程技术与行政管理人员入湘主持修筑湘黔公路。

湘黔公路是沟通我国西南各省的重要干线，修筑任务起自常德，经湘西直达贵阳。沿线地势险要，工程艰巨。辰州府志曾载：这里“谷径盘曲”、“万峰插天”，且溪河纵横，“蛮烟瘴雨”，为“南天锁钥”，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湘黔公路勘测、修筑之前的1934年，湖南省政府动工修筑的七省联络公路线——常西支线（常德至四川酉阳），已由常德修筑至桃源县，并抵沅陵边境。1935年初，国民政府鉴于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急于抢修湘黔公路，限令7月底完成。蒋介石亲调行营公路处督修，工程处主任秘书张叙丞和总工程师等则在第一线监修，另从浙江调入筑路技术人员34名。工程处设在沅陵，于1935年3月2日开始办公；另外，蒋介石还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将修筑湘黔公路的湘境路段，作为湘省建设的中心工作，指令“遵限完成”。何键迫于当时形势，即与工程处商定筑路事宜，并电复蒋介石“遵限完成”。

工程处施工队伍于3月10日由沅陵向西推进，沿线由陶广师长派兵护送。在筑路过程中，张叙丞是履行“遵限完成”的先行者，他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远见卓识，深刻分析工程利弊情况，将在湘境的筑路任务分为六段，在黔境的筑路任务分为七段，每段委派工程师一名，边测边修，各执其事。同时，向沿境各县提出具体任务，采取“计酬承包，分段负责，各尽所

能，全线齐上”的措施，达到了全面动员的效果。筑路民工无不全力以赴，晚上也燃起火把，连续作业，工程进展神速。4月20日湖南《国民日报》载：“湘黔公路进展甚速，第一、二、三段，上路民工已大部完成；黔境内四、五、六段正在开工，每日工作人数在万人以上……如经费不发生问题，则三个月以内，即可修筑完成……。”5月7日，该报又报道：“湘黔公路每日工作有三万余人，狮子岩至沅陵一段，工程猛进，六月底可以通车；沅陵至黔边一段，全面开工，约八月底可以完成。”

1935年7月15日（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湖南《国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新闻，题为《何键电告：湘黔公路，遵限完成》，并载何键电文：“成都蒋委员长钧鉴：湘黔公路，职秉我钧座旨意，督修进行，颇为顺利，乃蒙钧座奖掖，惶恐莫名。关于湘境该路经费，因地方政府困难，中央财力，亦感拮据，切实核减为二百一十万元。除全路大桥，须改便桥，以沅陵至黔边暂不铺砂外，其余各项工程，均可限期完成。……职何键叩寒。十四日，印。”

在筑路高潮中，根据张叙丞等人建议，统筹调度，先后由浙、皖两省调去两批人员，加强黔境公路抢修力量；在湘省又调建设厅长余籍传赴工程处督修（余后来代任行营工程处长职务）。纵观筑路历程，开始组织的勘测、施工，与后来工程处施行“先求其通，后求其好”的方案是相吻合的。因而取得了筑路工程的主动权，仅仅3个多月，湘黔全线路况初具。1935年8月27日，湘黔公路全线通车，堪称中国现代筑路史上的奇迹。湘黔公路通车后，曾养甫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但当湘黔公路工程迅速进展之际，张叙丞却因操劳过度，不幸身患重疾，于1935年6月25月殁于任上，时年43岁。张叙丞逝世后，国家拨款为他在沅陵举行公葬，并在凤凰山的墓葬处

建修墓庐。内设石凳、石桌、石华表，拜台纵横十余丈，皆用石栏杆合围；墓侧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军政部长何应钦、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湖南省主席何键以及工程师周凤九、刘岳厚等人的赞词碑刻（可惜毁于十年动乱）；墓葬正前面，至今还竖立着一块高3米、宽1.4米的石碑，上刻碑文：“故友张叙丞墓；曾养甫拜题”。墓旁两块碑柱上，镌刻着一幅对联：“葬名山长眠绝顶，创伟绩乃踞高峰”。公路通车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将沅陵汽车站命名为“叙丞站”，并在站前右侧百米处置场地一块，竖碑建塔，以志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叙丞站”又改为“沅陵汽车站”，但碑、塔一直保留到解放初期。（向启先 邓人璋整理）

（沅陵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战时湖南省银行的片断回忆

黄震德*

一、湖南省银行总行迁驻耒阳见闻

湖南省银行创建于20年代后期，地址在长沙市藩正街口。抗战前夕，仅在衡阳、常德、湘潭、益阳、邵阳、津市等几个较大城市设有基层机构。1937年后，开始在全省有较大的发展。原任行长彭溯，是湖南浏阳人，曾留学美国研究经济。副行长丑伦杰，长沙市人，大学毕业。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以后，随着国民党省政府的改组，由丘国维继任省银行行长。丘国维是广东乐昌人，原是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的亲信，丘当时是长官司令部经理处处长。1940年3月，省银行随省政府及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同时迁耒阳县城，驻在城关神农殿内，并以玉皇殿作为职工宿舍。当时职员约120余人，内分设文书、业务、会计、公库、发行等五课。这时期，除增加了副行长陈佐璇外，又新派有襄理郑玉肇、秘书杨道腴、文书课长方炳芬、业务课长宋衡（主任业务员）。这些负责人中除宋衡是浙江省人以外，其余都是广东人。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统一货币发行，限期收回各省、地方自行发行的钞票，以利开展信托和储蓄业务，随即省银行内部又将发行课改为储蓄部。同时，按照省银行当时的组织章程，省银行原设有理、监事会。理事长法定为省财政厅长兼任，并在银行内常设有理事会办公室，规定省总行应在理、监事会的领导下工作。实际上，银行成为省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财经机构，理事会成了省政

*黄震德于1938年入湖南省银行工作，曾任耒阳支行室主任、省总行会计室长等职。

府控制金融机构的工具。

1941年，湖南抗战的局势相对稳定，省银行总行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基层机构体制作了变更，取消了分理处的设置，改为分行、支行、办事处三级，仍直属总行管理和领导。同时，大力发展和普设基层行处。除在全省各县市和较大市镇相继完成金融网的设置外，还在省外有关城市如重庆、贵阳、柳州、桂林、韶关、吉安、太和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在湘南附近各县如永兴、安仁、酃县、资兴、汝城、桂东、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新田等地也开设了办事处。此外，在长沙市新成立了战时分行，并增设了印刷厂。另外，在耒阳、衡阳、长沙三处，设有银行系统的附属组织“忠爱社”。

为了解决银行职工的来源，省总行先后从管区内招收了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的青年200余名，集中在长沙办了一期、在耒阳办了二期短期训练班。每期60余人，时间为6个月，经考试后分配工作。1942年，为了满足急需，又在耒阳连续招收了两批练习员，边工作边学习。接着省总行内部机构再次作了调整和加强。除增配襄理和业务专员外，并将原来设置的文书课内三个组扩大为文书、人事、事务三个课，还新增设了稽核课、经济研究室。同时，设立了总稽核，由原任训练班的总干事朱慎微担任。

由于银行系统机构不断扩大，省总行职员人数也一时增加到300余人。按照当时的工作关系，其人事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一是以行长丘国维、副行长陈佐璇为首，包括襄理郑玉肇、秘书杨道腴、文书课长方炳芬、人事课长黄柱鸿、事务课长陈培棧等，全是以广东省籍人为主的行政机要部门人士；二是以总稽核朱慎微、稽核课长沈芝泉、稽核王文彬等原江苏地方银行人员为主，包括一些原有会计和部分训练班毕业的稽核、监督、检查部门的职员，江苏省来的银行人员，是沦陷后

来湘进入省总行工作的，其中有的分散去了基层，不少的成了业务骨干；三是以副行长丑伦杰和公库课长潘达夫(后任襄理)、颜穆度、会计课长许仕介、业务课长谭振新、经济研究室主任周维梁等湖南籍人为主的业务部门人员。但籍蕃部的经理又由襄理郑玉肇兼任，他们的工作主要不在耒阳，常在各处流动，似乎又自成系统。抗战胜利后，广东与江苏两个省籍的人员都相继离开湖南回原籍了。

抗战时期，银行业务都出现了畸形发展趋势，收入不断增加，全行每年的纯收入也不断上升。其中提成率也很高。据我所知：省总行于1943年和1944年，均从上年度纯利中提取了一笔较大款额，作为“奖金”。其中一部份发给职员、工友（即理、监事以下员工）。由于这笔“奖金”全是由丘国维亲自掌握和少数几个心腹机要人员经办，一般的职员、工友所得的奖金，平均约为本人半个月的薪资数。总行副课长以上和支、分行和处的负责人，则由丘国维根据籍情况亲自发给。究竟发给了多少？当时不知内情，但据说每张支票发给的金额都在二、三个月工薪以上。

湖南省银行对抗战时期调剂地方金融，繁荣社会经济，抑制商品价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银行的大亨与地方党政军机关中的某些权贵也利用国难当头局势，趁着银行业务的畸形发展，处处插一手、捞一把。仅每年用在吃喝、交际、娱乐等项的费用就十分惊人。用于每年一度的全省性银行行务会议的开支更是惊人。老百姓讥之曰“财神会”。某些银行头目，利用手中的职权和银行信贷业务便利，与官商勾结，营私舞弊，从中牟取暴利。如衡阳市分行经理王伯激，不到二年，在银行内外都积有巨额资产，大家管叫他是“王百万”，他本人还沾沾自喜。奇怪的是，当时省总行的上司和军政要员，都明知他是银行系统内的暴发户，却无一人敢动他的毫毛。后来，这个“王

百万”，不但在银行内晋升为总行理事，主管信托业务，还当上了省参议员。

1944年6月，日军攻陷耒阳，省总行由耒阳撤退至桂阳，后又流亡至桂东县沙田圩，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复员迁回长沙。

二、耒阳银行的畸形发展和衰落

湖南省银行耒阳分理处于1938年4月1日在圣庙巷2号租赁民房，宣告成立。开始主要代理省、县金库，办理小量零星存汇款和一些兑换折零工作，业务比较简单。全处仅有职工6人。主任彭先河系安化人，曾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

当时，耒阳除大量流通省行钞票外，县财政部门亦在市面印发有一、二角辅币券近3万元。私商振兴煤矿公司，也以开发矿工工资和运输脚力便利为名，发行有较大数量小钞。根据中央和省有关统一币制发行规定，均须由他们以发行对等数额的保证金交银行，由银行负责限期收回。因而此项收兑私钞工作也成了该处一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于是年10月由有关单位代表会同监督焚毁私钞。

不久，由省行派来农贷员熊国霖，按照与有关部门的商定，在本县遥田、肥田、花桥、江头等乡进行农业合作试验性贷款，开银行在耒阳贷款之先声。但这些贷款实际上并没有贷放到真正的贫困农民手里和用于发展农业生产。此后，耒阳分理处在市面开始进行小本工商业贷款，规定每家商业企业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对当时市面小本工商业起有一定的调剂作用。银行业务有所发展。

长沙大火后，湖南政治中心转移，省府行政机关迁来耒阳，人口迅速增加，市场一时相应繁荣。同时由于省总行不对外办理业务，所有省属机关的业务往来，均集中到了耒阳分理处，

以致该处每日业务量为之急剧上升，人员、机构也随之不断增加和扩大。1941年4月，该处被改升为办事处，并开始配备会计、营业、公库、出纳、文书等5员。同年8月，随着省行机构的改革，又改称为耒阳支行，仍代理省、县和国库业务，并开始在东被街原杨森元药店处修建行址，不久又加以扩建。这在当时银行中是少有的。

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退回湘北后，省属机关和城关人口又有所增加，这时耒阳支行曾通过以信用透支、质押、票梭贴现、买汇以及开展汇款对交和保付支票等方式，对市面工商企业进行较大数量的贷款，为了贮存质押货物的安全方便，并于樟隍岭、新市及小水等处设有临时仓库或特约仓库。这在当时通货不断膨胀和贬值的情况下，只是促进了市场一时的虚保繁荣，而给人民却增加了更大的痛苦。

此时，省行各地基层机构早已相继建立，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又由省总行确定以耒阳支行为湘南各行处的头寸调拨行，并配有专职押运员、警，担任湘南和部分湘东行处的头寸调拨运送任务。

随着形势的发展，耒阳支行的业务量也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当时省内其它分行。全行职工也由原来的6人陆续增加到60余人。1942年，耒阳合作金库在梁晋公祠成立，它是中国农民银行的一个下设机构。除了经办农业合作贷款，也办理一些机关的存汇业务。1943年上半年，中央银行又在罗氏宗祠成立了耒阳分行，主要办理国库业务。这时耒阳的银行机构，已发展有中央和省、地方三家。保耒阳支行每天上下午开门时的拥挤排队现象仍然没有改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金融业的畸形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耒阳支行发生过以下几个问题。

一、1942年，耒阳盐务处长傅景芳利用负责掌管耒阳盐价的职权，了解到当时盐价即将调价，便同耒阳支行经理

彭先河和私商王建宇，私自提取挪用应交税款6万元，在韶关购买大量食盐运回耒阳，然后以私商名义抵押向银行进行贷款。在挂牌提高盐价以后，再倒卖给灶市盐商。部分私商再以此转押银行贷款，进行囤积，层层获取暴利。

二、当中央银行耒阳分行成立时，耒阳省银行原来经办的国库工作，须移交耒阳中央银行接办。此时耒阳支行的经理已调总行业务专员赵桓生继任。但因原任王励襄业务不够熟悉，以致财务发生错乱，一时影响交接。为此，中央银行经理陶天舜向省总行行长丘国维反映。丘一怒之下，将王撤职并开除出银行。

三、1943年春，由于省驿运处内部关防不严和当时银行接柜员谭濂、记帐员陈培梁工作疏忽，被该处职工邓渊盗盖和伪造印鉴，冒领支票，连续六次向银行骗取存款3万余元，直至次年2月双方对帐，方始发现。后双方争讼到省军法处，将邓渊收押审理。不久因日军进犯，此案也不了了之。

1944年日军入侵湖南至耒阳，合作金库撤回衡阳。耒阳中央银行成立不过一年，此时撤至蓝山，直至抗战胜利，才复员长沙。耒阳省银行当时因代理省库，曾随同省府机关辗转撤退至桂阳、嘉禾、蓝山、宁远、宜章、汝城等县，最后撤至桂东沙田。全部职工已不到20人。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复改为耒阳办事处，10月正式浚业。由于劫后人民元气损伤，市场形势变化，业务一落千丈。特别是随着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法币不断贬值，银行业务直接受到冲击。耒阳银行虽已在复员后成立，但一直未能开展经营活动。此时市面部分商人开始在新记和安记两家绸布店内成立了地下钱庄，利用间歇资金，进行短期拆贷，互相调剂。这样银行与市场的联系更为减少，业务日益衰落。

1948年金圆券出笼后银行业务暂时活跃起来，但金融界也

出现极大的混乱。不仅广大人民遭受巨大损失，不久银行也受到严重冲击。耒阳银行几乎无法维持，甚至银行职工每人每月只拿到6块银元的生活费。而且银元的来源也成问题。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耒阳省银行办事处不得不于1949年5月按照省总行指示撤至长沙清理帐目，办理结束事宜。

（耒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复兴银行简史

江文觉*

复兴银行的前身为醴陵农民银行,该行成立于1936年,1940年1月改名为复兴银行。复兴银行成立之初,只有长沙、醴陵两处,人员仅20人,股本3万元,其中有醴陵某公股及一部分商股,股金并未收足,主要是依靠当时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力量而开办的。行址原设长沙东长街(现蔡锷中路)。抗战胜利后,总行设朝阳巷。1938年长沙大火,该行迁零陵,后又迁衡阳,由于业务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以后由于国民党第10集团军总司令、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势力的渗入,他派该集团军兵站站长江国璋(湖南高工毕业生)专任该行总经理,并改名为复兴实业银行,含有振兴中华实业之意。迄至1948年,依照当时政府公布的银行法规,又改称为复兴商业银行,简称为复兴银行。

该行成立至解放后停业清理,经营13年之久,先后成立的分支机构及附设机构,遍及省内外及香港,最多时达50处,员工800至900人。当时规模之大,经营之广,在省内商业银行中首屈一指,在国内银行界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它的经营史来看,在扶助当时的工商企业、发展湖南的金融事业,以及培养银行从业人员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该行机构分布广:长沙、衡阳、醴陵、洪江、安江、常德、津市、株洲、湘潭、邵阳、蓝田、白地市、渌口、所里(今吉首)、茶洞、黄茶岭、靖县、晃县(今新晃)淑浦、沅

* 江文觉曾在复兴银行工作多年。

陵、广州、汉口、上海、贵阳、重庆、柳州、南昌、萍乡、金华、南平、遵义、安顺、龙潭、北碚、綦江、镇江、宜昌以及香港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总行所属的信托部附设机构（有的系临时性质或作为中转点）有：复兴汽车公司、福兴贸易公司、福新机械厂、华南公司及上海、常德分公司、复兴印刷厂、复兴农场及长沙第一和第二仓库、宏兴商轮局、福利庄等。

该行经过13年经营，资本由3万元发展到500万元；机构由最初的2处发展到50处；从业人员由20人发展到300至900人，这是与它在经营管理上的独到之处分不开的。复兴银行有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人事制度中不但有严格的奖惩办法，而且在招聘员工中，均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制定了从理论到实际的统一的会计规程，在严格的会计制度中有联行制度和稽核制度等等。它重视人才，延揽人才，如会计课长周树仁，毕业于湖南大学（后任湖南大商学院教师），是湖南有名的会计师。主要骨干都是当时社会上或金融界比较知名者，如蔡辛耕、向多炆、陈雅青等人。在业务上它不仅经营银行本身的存、放、汇，还经营工业、商业和进出口业务。同时对外开放，代营美国福特公司的汽车、汽油和汽车零件等。在经营管理上，集思广益，听取群众对开展业务的意见和重视信息，定期召开业务会议，由几名学有专长的大学生组成经济研究室，搜集分析经济情报，以指导业务。在宣传上除举办《复兴通讯》刊物外，还组织了复兴足球队，名为开展体育活动，实际上是以足球队来扩大银行影响。总经理江国璋对员工要求非常严格，很重视员工的业务技术水平的提高。

复兴银行在13年中，遭受两次重大损失。一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香港沦陷，大批进口物资滞港未运，全部损失；一是日军南侵，该行向西南撤退的物资，包括机械厂全部设备和器

材均被丢弃。抗战胜利后也有一次重大损失。那就是法币不断贬值，尤以1947年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验资，该行金银硬币悉数送存中央银行，其损失之大，更为严重。以致该行在解放前夕，已经是资金匮乏，摇摇欲坠了。

该行的资本总额为500万元，股东337户，自刘建绪渗入后，他的股本就占了全部资本的63%，江国璋占11%。最高权力机关是董、监事会，而真正的权力则集于总经理江国璋一身，但从当时的经营情况以及延揽人才而言，江尚不失为一个明白人。

银行在长沙织机街耕耘圃建有一座专供董、监事居住的房子，这些人大都是刘建绪的亲信。他们在这里举行的例会，名为决定银行大事，实际是每月聚会数天，专事吃、喝、玩、乐。他们且都拿高薪。

解放前夕，复兴银行派长沙支行经理罗乃风参加长沙市商会迎解工作。湖南和平解放后，复兴银行由政府接管，并对帐务进行了清理。从清理后的债权、债务来看，债权远远超过了债务，但大都为不动产，流动资金已经散失殆尽。据闻刘建绪曾从香港分行提走了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复兴银行是我省规模较大的一家商业银行，它所经营的各项业务，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从业人员，解放后大部分都在人民银行工作，成为业务上的骨干力量。

薛岳筹办湖南省贸易局的内幕

肖伯麟*

从贸易局到民生日用品购销处

1939年，薛岳被委派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利用手中大权，成立了湖南省贸易局。

这个局于1939年2月间在衡阳小西门青山街成立，局长方人矩，系薛岳的岳叔，他凭薛岳为靠山，掌握该局的全部大权。这个局的组织相当庞大，局下分设专员、视察、调查等室，还设有业务、会计、秘书、运输等课。人员配备，除业务课长侯冕、股长张锦璞系长沙人外，其他备股、课、室以上的高级职员，均属粤籍。大小职员100多人，广东人占90%以上。时人称为“广东会馆”。它是以薛岳为首的粤帮官僚资本势力在湖南从事经济搜刮的敛财集团。

湖南省贸易局，在行政系统上隶属于省财政厅。原定以法币100万元为资金，想利用官方的力量，来垄断湖南的贸易市场。但在财政厅长杨锦仲牵制之下，只在省银行拨给30万元，不能“大展宏图”。方人矩认为这样会捉襟见肘，要薛岳再为拨足，以遂初愿。在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的策划下，建议将省贸易局改为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与省银行一样，同隶属于省政府，与备厅平行。这样，资金便可以随便提用，不受财政厅的牵制。薛岳鉴于事关自己的财源，又碍于岳叔情面，就在省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将贸易局改为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得到秘书长李扬敬、省府委员王光海、省销行经理丘国维等的附和，其他委员均趋炎附势不表异议。杨锦仲厅长在此时，只好

*肖伯麟当时任湖南省贸易局业务课主办课员，本文写于1962年。

默不作声，于是，更名为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

“湘购处”主要“业务”

湖南省民生日用品购销处（简称“湘购处”），名为关心湖南人民日常生活而设，实系用来垄断食盐、粮食等大宗日用必需品，搜刮农副产品，对人民群众进行盘剥，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压榨的官僚资本机构。该机构相当庞大，省外的广州、韶关、桂林、柳州、梧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或转运站、仓库，作为从事投机活动的分支机构。总处的运输课，备有 8 部卡车，专作短途运货。同时与李扬敬、王光海、丘国维等串通一气，由该处运输课出面，联合郴县商会会长黄观吾，合伙在衡阳金银巷开设运输公司，专为官僚资本集团服务。

“湘购处”打着“民生”的招牌挪用省库大量资金，在省内大肆收购大米、桐油、湘莲、牛皮、猪鬃、五倍子等稀贵物资，汇集于“湘购处”韶关仓库，远运香港，换取外汇。所获暴利，大都入该集团中主要权势者的私囊，一般下级职员，无从识其底蕴，只领取微薄的工资。

湘米粤盐互换内幕

我省仅湘西有小量土盐生产，其产量尚不能自给。省内食盐，大部分依赖外省供应。自长沙大火后，湘北一带，已被日军侵占，淮盐日减，川盐又因运输关系，缓不济急，湘南各县，全靠粤盐供应。湖南虽不出盐，却盛产大米，素称鱼米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湖南缺盐、广东缺粮这一自然情况，为“湘购处”从事搜刮提供了机会，为薛岳官僚资本集团开了财路，而湘粤两省广大人民群众则备受缺盐少粮之苦。

由于广东连年发生旱灾，粮食歉收，部分生产粮食地区早已沦陷，后方人口激增，米价一月数易，甚至闭巢，粮荒极为

严重。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计无所出，联想到湖南亦属抗战前线，已发生食盐不足，可从中设法调剂两省粮盐之缺，乃主动与湖南省政府联系，经过两省多次函电洽商，始达成“湘米济粤”、“粤盐济湘”之议。1942年春，广东省政府派遣广东省银行、省粮食局的李明、叶少华等要人来衡洽订盐粮互换合同，方人矩设宴款待，因事关重大，不敢作主，即同往长沙向薛岳请示。

广东派来的代表，与薛岳的亲信方人矩、李扬敬、王光海等在商谈中，不是从两省人民利益出发，而是各自为己打算，尔虞我诈，讨价还价，坚持自私自立场，使商谈几成僵局，双方相持在以湘米1.5至2石换粤盐1石之间，不能达成协议。薛岳也从个人私利出发，亲自出面对广东代表说：“我是广东人，不卖米给广东，广东人对我有意见；但我又是湖南省的主席，把米随便卖给广东，湖南人又会有意见。如果以盐换米，以广东1石盐，换湖南1石米，实物互粮，这是可以的，你们可以从详商定。”你明知这一比例是办不到的，因他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在政治上有矛盾，想就此摆摆架子，把李汉魂急一急，迫使李就范，方显得自己的厉害。方人矩窥测了薛岳的意图，在谈判中使得广东省的代表也无可奈何，最后会商结果，作出以湘米1.5石换粤盐1石的决定。议定湖南的米，由第九战区兵站拨给“湘购处”运粤；广东的盐由广东省贸易局拨交“湘购处”，以韶关为交粮地，并正式签订了食盐5万石换湘米7.5万石的互换合同。根据当时衡阳的市场价格计算，米每石6元，盐每石10元有零，湖南方面本有厚利可得，但这笔收入不为湖南人民所享有，而大部分由方人矩、李扬敬、王光海等从中贪污分肥或进入了薛岳的私囊。

“湘购处”内外矛盾种种

“湘购处”乘我省缺盐之机，在方人矩、李扬敬、王光海

等的指挥下，一开始就大搞粮盐操纵，他们向广东购运食盐来湘，打着“民生”招牌，凭借官府权势，用办理官盐名义，霸占产区，夺得优先发运之惠，后因粤盐部分产地沦陷，购运日艰，又责成设在广西梧州、柳州、桂林等地办事处办理广西场盐运湘继销事务。同时，又与湖南省银行合谋，利用经济特权，倾全力以办食盐。所购之盐，半为官拨，半为自购，尤以“自由盐”为多，运入食盐在100万担以上，获取了巨额利润。

“湘购处”为了垄断食盐，乃利用政治权势，控制运输工具，利用银行押汇和办理有关手续简便等有利条件，在购运上对民族工商户进行欺压摧残，原有盐商只好望尘莫及。“湘购处”在食盐销售上，则把持盐务稽核处，对食盐严加控制。凡私盐入境，统归盐务稽核处管理，盐商不得自由出售，滞销则拖延竟月，畅销则尽罄其数。盐商徒唤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盐商退避三舍，有的则被迫停业。

在盐务稽核处的操纵下，食盐买卖不均，市场盐荒日益严重。衡阳十字街等油盐号，经常盐柜空空，无货供应。内有少量配销盐，民众拥挤抢购，曾不断出现丢冠失履和踏伤妇孺事故。其他边远城镇，盐荒更为严重。如：桃源县因食盐空仓，地方民怨沸腾；湘西各县盐价飞涨，民众被迫淡食；新化民众捣毁政府卖盐专业机构，迫使国民党政府按保、甲配购食盐。而这些配购盐，均系杂砂的下等盐。而“湘购处”的“自由盐”，则储存仓库待价而沽。

“湘购处”在与广东省签订粮盐互换合同之后，多“财”善贾的方人矩等，又大肆从事桐油、粮食等土特产的经营。桐油是我省湘西特产，“湘购处”驻常德办事处，于1942年秋与省银行丘国维合伙，在常德收购桐油1000桶，“湘购处”派黄仁浩专员和肖伯麟课员等4人前往收运，各运输商行都来兜揽

生意。当时，本与一家当地运输商行成约，每桶运到衡阳，就船装载，议定每桶运价1.35元，不负风险责任。但报告递上去后，没有得到同意。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广东人在常德设有“容记”运输商行要承运。“容记”的运价是：连保险费在内每桶运价2.2元。如果把保险费除出来，每桶比原订价还要高出0.4元。方人矩为了这事，暗中另派一位姓黎的专员前往，与“容记”运输商行签约成交。那时，黄仁浩气得愤而返衡。

“湘购处”还大搞粮食抢购、运输出省的活动。他们与第九战区兵监总部蔡馥生总监等合伙从事，并联合郴州商会会长黄规吾，以黄在地方的财势和利用郴、粤地理靠近之便，进行偷运。1942年12月，为了一批粮食分肥不匀，被黄规吾卡得太紧，方人矩派肖伯麟前往交涉，结果因油水不大而放弃。官僚、地霸之间，由于私人利害冲突，亦时有矛盾。

“湘购处”内部有大集团，也有小集团。方人矩对小集团的一些“小利”，也明知被昧，不予查问。他经常去香港为薛岳效力，又要为几个要人和自己做外汇生意。处务由其主任秘书蔡某代行。蔡也有他的小集团，常利用职务方便捞油水。他们不顾人民生活需要，在衡阳正大公司李向荣处，一次洽购煤油500听（一听即一桶），做走私生意运往广东高价出售。因为煤油是燃料，国民党中央在衡阳设有燃料管理处，没有“湘购处”的正式公函，不许外运。事件发生后，由肖伯麟几经交涉，在彼此得利妥协之后，才得许可填发外运证，外运出省。这一次获利不少，蔡主任秘书还送给肖伯麟一些酬金。其他课室亦然。业务课有一次勾结运商，套购轮胎外销，方人矩事后知道，也未追究责任。总之，在“湘购处”内，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我在工商新闻两界的经历

蓝 肇 祺

我从乡村走向城市，涉足人世，走南闯北几十年，历经沧桑。如今年过八旬，报国之日苦短，爱国之心犹存，余年不足以报答党恩于万一，故有生之年，回顾往事，以之自勉。

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长沙和各地都先后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运动，要求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提倡国货、收回被日本强占的长沙火金码头。就在这时期姑父托酃县人孟湘鉴（当时系共产党员）带我来到长沙，后经族叔祖蓝青介绍，考入他任教的湖南贫民工艺厂半工半读部。厂长刘天职为四川人。就在这年冬天，平江发生了一起轰动湖南的力拒英国煤油起岸的爱国群众运动，当时省长赵恒惕对群众运动采取了高压手段，“宣传过激者斩”的告示，布满了省城街头。中共湖南区委，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团结所有反对军阀的力量，开展了一场驱逐赵恒惕的运动。不久，我考入湘江中学攻读普通高中。当时学校座落在长沙市中心邵阳坪，信息更为灵通。这时正处于北伐战争的前夜，党在工人、农民、学生之中积极开展工作。但在是年末和次年初，我省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害，株洲的农民领袖汪先宗被杀，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义愤，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即由湘江中学转船山自修大学，相继又转入当时设在藩正街由徐特立、谢觉哉任所

长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刻，何键指使独立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突然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省党部、省党校等有共产党人的机关，开始包围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我破窗逃出后潜回家乡，几天后，全省范围内也开始了血腥大屠杀，酃县比起省城来，地小人稀，更容易暴露，在此危急时刻，我和一同逃回酃县的廖珩、王陆精一道离开酃县潜返省城，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我从此改名蓝肇祺，居叔祖蓝青处，当时全省一片白色恐怖，学校早已解散，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我与党领导的团组织也失去了联系。不久湖南乐群会计专业学校招生，在叔祖蓝青的资助下，我考进该校，这是我涉足工商界之始。1928年毕业后，我来到湖南模范劝业工场，任会计员。

从湖南劝业工场到国货陈列馆

湖南模范劝业工场系中山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今中山路百货大楼）前身，大约建于1923年前后，设在长沙市白马巷。1923年3月，日本租借我旅大期滿，依仗武力却拒不归还，当时我省工商团体、学生联合会及教育会都联合起来举行了抗议游行示威，并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决议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扶助濒临衰亡的民族工商业。湖南实业司司长唐承绪（唐生智的父亲）即委派建筑工程师许推负责设计建造劝业工场。1928年秋，我接任该场会计，到任之日，但见两层红砖楼房，前坪东西两边都修有半月彩亭，饰有彩灯，一群鼓乐手在吹奏西乐。场内通道迂回曲折，辟有商店百余个，场地都以柜台为界，长宽5米，租与商户，其招牌可以自立，亦可立分店招牌，所售商品一律系土特国产及日常生活

用品，并标以实价。一名职员吆喝着“当众开奖，凡在场内购物一元以上者，可凭手中号牌到半月亭前领奖”，其奖品有刷牙粉、洋磁盆之类，劝业工场地处偏僻，为竞销货物，招来顾客，推行有奖购买，当时在长沙颇有影响。

湖南模范劝业工场从1929年1月起改由刘廷芳先生主持。1930年1月正式成立了湖南国货陈列馆筹备处，选择前清贡院旧址（为清乡试考场）为建馆地点，筹备处即迁此办公，我随刘从劝业工场转入筹备处，参与刘主持的筹建工作，并任该馆庶务。当时建设厅长余籍传言其无钱，为建筑难以完工，颇感苦恼。刘廷芳留学归来，青春年少，精力充沛，满腔热情，为尽快筹措资金，他约我一同前往何键公馆与其面议，何找来财政厅长张开琰研究，张热情很高，随即拨款20万元光洋，另外指派我们往浏阳县城调拨税款4万元。几经筹措，预算款项基本齐全，随即开始招标承包，由原建筑湘雅医院校舍的建筑师张连生承包建筑，建筑设计委托欧阳淑工程师（留法学生）负责。从1931年春动工到1934年落成，历时三年。商场后为办公用房、图书室、弹子房、锅炉房，附设银宫电影院、三和酒家、健身浴室、华中理发店等。整个建筑新颖别致，且装饰豪华，在全国各省国货陈列馆中名列前茅，被报纸誉为湖南三大建设之首（陈列馆、中山马路、木炭汽车）。刘廷芳任第一任馆长，刘在美国攻读过国际贸易，知识渊博，颇懂生意经，且为人正派，工作严肃认真，深得内外敬重。商场开业之初，为杜绝少数奸商与日商往来，严密查禁日货，刘曾下令通告馆内各商户，限售国货，不得有外货混入。在送通告给刘审定时，某属员书其“限售国货，严禁混售日货”，刘一看有些不妥，料日商会来寻衅，遂将“日货”改为“洋货”，事过二天，果有日人前来寻衅，刘在办公室言明本馆为宣传提倡国货而设，故不得混售洋货，政府允许洋货定点经营，我们不加阻涉！我国

货陈列馆限售国货，又岂容外商横加干涉？三言二语，字重千钧，日人气势汹汹而来，细看通告，并无懈可击，只得悻悻离去。

1935年12月，我在国货陈列馆连续工作7年之后，随刘去铤业管理处工作。

实业救国的心愿和我的曲折历程

抗战爆发后，刘廷芳短期出国考察国际贸易市场，拟将铤业管理处所得外汇收入全部上交中央资源委员会，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财政厅长尹任先执意要交湖南，刘与张、尹产生隔阂，刘断然出走，铤业管理处由副处长、总工程师程义法（留德学生）负责。1939年程义法调江西大庾任铤业管理处处长，挽留英学生李尧克接任处长，迁零陵桃家村办公，将铤业管理处扩大，曾省斋任副处长兼总务主任，我仍任事务课长。过了一个时期，李尧克欲调我为业务课长，再调某亲戚接替我的事务课长。当时总会计师徐志禹认为会计应独立，自己是留美学生，不想听李摆布，不予协调，故此事未成，我仍任事务课长。延至1942年，我在铤业管理处已任职7年，此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国民政府撤至而南。其时刘廷芳回国，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管理处长。刘廷芳一到职即来信零陵，随即寄来旅费，叫我在铤业管理处挑选昔日部下10余人，去重庆燃料管理处谋职。经过挑选，铤业管理处有10余人去重庆。而我却被铤处挽留，并委我任总务主任。后刘见我不得脱身，只好通过翁文灏来函调处。1942年9月，刘委我任重庆物资局食油管理处总务科长。食油管理处于1943年3月撤销后，即调我为重庆经济部燃料管理处秘书，后又升任总务主任兼任该处所设四川綦江办事处主任。

抗战胜利后，为恢复湘、鄂、赣省区煤矿生产，经济部燃

料处在汉口设立湘鄂赣区分处，长沙设立办事处，刘天职任分处处长，我被任命为湘鄂赣区分处副处长兼驻长沙办事处（设在铁佛东街刘公馆内）主任。1946年，刘廷芳回到长沙，推荐我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钨锑锡矿业管理处广州分处处长。我委婉拒绝了，言明自己已转营湖南私营华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了总经理，并投资开办了长沙银宫电影院。我当时为什么不愿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而要去经商呢？原因是我在重庆经济部燃料管理处供职时，受到民主人士郭春涛先生和中共地下党员刘乐扬同志（化名张兆麟）对我的思想影响和启发。郭春涛也是湖南酃县水口人，他叫我姑父郭垂云做叔叔，是留法学生，与周恩来同过学，在冯玉祥部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左派，没有任国民党政府的官职，当时是重庆东方文化协会主任，民革地下工作组织者之一。我在重庆工作时，常和同事戴德嵩（燃料管理处总务室副主任）去郭春涛家中玩，郭平易近人，对我们很关心。他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对我们讲话毫不忌讳，例如当时他骂蒋介石独裁，不民主，不关心民间疾苦；说胡宗南百万军队，留着不去打日本人，这就证明打日本是假，反共是真。又说延安毛泽东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爱民、关心人民生活，是真正的民主领导人。郭春涛还介绍我们看《新华日报》，收听新华社消息。当时我们感到郭春涛讲话与众不同，非常愿意听他的见解。刘乐扬同志也是湖南酃县人，曾在昆明《扫荡报》、重庆《西南日报》等报当总主笔、总编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1945年，刘由昆明到重庆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途中翻车受伤，住进重庆市立医院治疗，我和戴德嵩同去看他几次。他伤愈出院后，与我们来往颇密，交谈亲切，他向我们了解在渝的酃县同乡的情况，谈到郭春涛时，他说这位先生可以多接近。谈到唐纵时，他说这位先生既不能得罪他，又不可过于亲近他，有事只能利用他，但不能当

他所利用。在郭春涛、刘乐扬的影响下，我决计不再为国民党政政府效力了。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我和戴德嵩就在重庆开始着手筹备私营华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回到长沙正式开业。同时又打算恢复1936年停刊的商界人士主办的《晚晚报》。我们将这一打算与刘乐扬商量，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

《晚晚报》是1931年4月1日由工商界人士为主创办的，社长由长沙市总商会会长左益斋兼任。我与康德、严怪愚、熊伯鹏等都是创办人。1936年该报因揭露湖南省银行大贪污案和其他政治黑幕而被国民党当局勒令永久停刊。

从《晚晚报》到长沙首家晚报

回到长沙后，我和刘天职、戴德嵩等人首先办起了华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银宫电影院，刘天职担任华湘公司董事长，我和戴德嵩分别担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同时我担任银宫电影院董事长，经理是肖扬武。继而又和戴德嵩、康德等积极筹备《晚晚报》复刊，我们曾打报告给国民党省党部，却一直未得到批准。后来国民党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客住我家，此事才有了希望。唐纵与我同乡，我在重庆供职时，在欢迎远征军总司令霍揆彰（也是酃县人）凯旋归来的宴席上与他相识并有了往来。1946年，唐因母逝回乡吊丧，途经长沙，便来我处，我反复说明《晚晚报》系商界报纸，请他支持复刊，并疏通国民党内政部办理登记的渠道。那时长沙军统方面的负责人黄康永、李肖白等人都来拜访唐纵，我一一请他们吃饭，他们也表示愿意协助。后来，我终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唐纵的关系，使《晚晚报》得到内政部直旋批准，并发给了登记证，待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得知后，已经成了事实。《晚晚报》于1947年4月得以复刊，正式发行。我任社长，康德任副社长兼主笔，戴德嵩任总经理，并去函香港，邀约当时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的民族

港九支部委员刘乐扬任总编辑。后因其他原因，刘乐扬未曾出任，由戴哲明代理总编辑。

1948年初，我借经营华湘公司业务机会赴香港，经刘乐扬介绍，与民盟总部主任秘书周新民（中共地下党员）、组织部长李相符见面，并被批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们郑重建议：要在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策指引下办好《晚晚报》，以适当方式响应党的号召，做好宣传工作，在人民中扩大影响。以后《晚晚报》的情况经常由康德、戴德嵩函告刘乐扬，向他征询意见。在总部的授权下，我回到长沙还吸收发展康德、戴德嵩和工商界知名人士蒋寿世、袁友胜、肖扬武等入盟，并协助肖敏颂建立了民盟地下组织。《晚晚报》也真正成为党所掌握的进步报纸。

《晚晚报》向来采取独立自主方针，自接受民盟建议后，旗帜更为鲜明，当时参加该报工作的，除民盟派来的成员申国椿（金河）外，还有地下党新闻小组的傅白芦、李龙牧、蔡克诚等多人。报社的编辑记者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大多数是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和进步人士；社长、副社长、总经理均是民盟地下组织成员，领导力量坚强，报纸各个版面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新闻来源基本上不采用官方的中央社新闻通讯稿，主要由该报记者独自采写。稿件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刘乐扬以特派记者名义，用刘易笔名，每周由香港发来2至3篇综合敌方内幕消息的专题报道；二是通过地下党组织专收解放区延安、邯郸等地广播的新闻，加以改写，作为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特派记者的专电刊发。

在经济方面，该报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从不向人伸手，更不接受官方津贴，对当时政府利用美援“救济物资”收买大小报纸的作法，表示鄙视。我作为社长，跻身工商、新闻两界，曾以华湘企业公司名义，从经济上给予《晚晚报》很大的援

助。

《晚晚报》从1947年4月再度复刊到长沙和平解放停办，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报社同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了斗争。1949年上半年，白崇禧窜来长沙后，对新闻界控制更严。那时长沙绥靖公署规定，报纸每天出版前，必须先送大样检查，发还时总有许多红框框，指定框内文字要改刊中央社消息。《晚晚报》对此拒不执行，并以“开天窗”的办法对付。后来当局竟派枪兵监视印刷，该报在印刷工人的密切配合下（印刷负责人系中共党员叶炳和），俟枪兵撤走后，即将已印的报纸全部废弃，按原版重新印刷发行。军警当局恼羞成怒，将总编辑戴哲明、总经理戴德嵩拘留，湖南的特务头子毛建钧（毛人凤的侄子）亲自进行审讯，搬出大堆《晚晚报》，划了好多红杠杠，说我们的报纸90%都是说共产党的好话，要《晚晚报》交出内部的共产党员来，不然就小心脑袋。后来经我多方设法，找了民主人士仇鳌才将他们保了出来。后来军警终将报纸查封，湖南省党部委员杨粹出面说他们有办法启封，经费也可以负责解决，企图收买报纸，我们断然拒绝了。这时报社收入来源断绝，全社员工生活困难，但大家毫未动摇，我则四处张罗经费，终于度过了难关。

在左学谦（左益斋）、黄曾甫的支持下，我们将为《晚晚报》筹得的经费，分一部份转赠给了姜亚勋游击队购备西药。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晚晚报》终于在解放前夕获得复刊，重新与长沙人民见面。

复刊后《晚晚报》日出四开一张，一版为要闻和《晚晚报谈》（评论），二版是《地方新闻》，三版为《新闻隧道》和《长沙风》（趣味性副刊），四版是副刊《渔火》，该报在国民党对舆论界的严密控制下，嬉笑怒骂，旁敲侧击，言人之所不敢言，曾有读者认为“《晚晚报》是一半儿废，一半儿软”，困

为硬既不能，软了便不会有读者叫好。《晚晚报》的地方消息也很灵通，如邵阳永和金号案，1947年5月4日发生，该报5日即作了报道，只是不便指出凶手之姓名。对于党团磨擦，《晚晚报》揭露甚多，抨击最力。如1947年10月，国民党中央派中央委员刘文岛来湘指导所谓“国大”竞选，为收买选票，刘乘坐小车带一女人招摇撞骗，《晚晚报》当即载文披露，这激怒了刘文岛，他强令长沙新闻机关处罚报馆。并于当晚由省会警察局用传票的形式将我传唤到局长李肖白家中，威逼我交出采写该稿的记者，并登报道歉，否则将我扣押。他们软硬兼施，一直恐吓到凌晨四、五点。我理直气壮地阐明法律允许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记者有闻必录，只要与事实无出入，是不负法律责任的。最后没有办法，李肖白言明此事由他处理才得已告结。该报一版的《晚晚谈》，二版的《暮鼓》和四版的《晚唱》，均短小精悍，讽刺深刻。

《晚晚报》的两个副刊各有特色，《渔火》思想性较强，《长沙风》趣味性较浓，但即使是后者，也有些寓意较深的作品，一是糊涂博士熊伯鹏的通俗弹词，二是庵真（康德）的旧体诗，由于反映了现实也很受读者欢迎。

从1949年起，《晚晚报》言论更具锋芒，主张实现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真备战。如1月16日揭露中央银行湖南分行偷运现金出境一事，标题为“运去三万两黄金，失掉三千万人心”。1月20日，关于省参议会消息的报道标题是：“中央政府不要湖南人，湖南人也不要中央了”。

《晚晚报》立言的态度一贯鲜明。早在1931年9月发表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一文，曾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结果受到警告，其理由是“易致外国人轻蔑之嫌”，接着又被勒令停刊一个月。“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还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发表了《抗日运动休矣》一文，指

出：“吴铁城劝上海抗日爱国团体自动停止活动，以免日人动火，整个将上海占领。这样一来，中国之抗日运动，真正可以休矣。日人要以武力占领上海，要人先生就劝上海抗日团体自动停止活动，万一日人要占南京，要人先生不会要劝南京政府停止活动吗？”“一·二八”抗战以后，该报又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题，披露十九路军孤军作战，蒋介石隔岸观火。对于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晚晚报》也提出警告，曾撰刊《爱国运动激起的波浪》一文，指出：“如果政府始终是现在这样的态度，这种波浪就有变成革命导火线的可能。”对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派系斗争也曾进行揭露。那时湖南国民党内部，分为甲乙两派，甲派听命于C C，乙派拥护何键，为地方实力派。《晚晚报》曾巧妙地按甲乙两字字形，把二者分别称为钻子派和皮刀派。在《谭常恺任免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指出：“甲派曾委派一批通讯员以监视乙派，不意有人将密信在《晚晚报》公开，这个黑幕揭穿后，震动了湖南上层社会。甲派头子、省党部委员朱浩怀不得不把中央党部的密令摆出来。于是《晚晚报》又登一条消息，说省党部指责《晚晚报》泄露党的机密，现在朱浩怀却全部秘密都摆出来了，朱委员与本报厥罪唯均。”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四次全体大会上公开自责，表示忏悔，不料言犹在耳，就杀了民主战士邓演达。《晚晚报》刊登了《邓演达枪决的前前后后》一文（1931年12月24日），指出邓之杀，就是因为蒋介石认为邓是他“生平唯一之政敌”，这篇通讯还引用了宋庆龄痛斥蒋介石的通电。事后，《晚晚报》又被迫停刊7天。

《晚晚报》于1936年10月被罚永久停刊时曾刊登启事：“本报于民国二十年四月一日创刊迄今已届835号，经历五年六个月又十五日，曾受过若干次停刊处分，然同人犹存不屈不

挠之精神，社会一般观感，亦认为本报之愈受挫折，愈见光荣。”

《晚晚报》于1947年4月复刊时，曾标明：“在多党政治下争取言论自由，在宪法范围内争取民主政治。”与30年代相比，更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但仍富于趣味性，故能成为长沙最畅销的晚报之一。

与此同时，为迎接长沙解放，1949年4月，湖南民盟地下组织，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创办了《民主报》，我和杨伯峻（共产党员）、叶克强等负责筹办。我负责筹措资金，提供房屋家俱和设备，于同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之日正式发行，对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和中心任务起了一定作用。

长沙和平解放后，《晚晚报》与地下党主办的《实践晚报》合并，改为《大众晚报》，成为新长沙首家晚报，由长沙市委领导，继续出版，仍由我任社长。

《大众晚报》通俗、生动，富有知识性。副刊《大众夜校》，曾获《新湖南报》好评，它有《三字经》、《快报》、《弹词》、《时事问题》等栏目。《大众晚报》当时与读者联系也十分密切，经常举办通讯员训练班，召开读者座谈会，不少工厂厂长都来学习，学校也请报社同志作时事讲解。

解放初期的长沙工商界和新闻界

全国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湖南省委统战部领导下，我接受当时已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乐扬的指示，坚持做工商界工作。1950年2月，我和《晚晚报》负责人、总编辑康德，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叶克强，赴香港动员解放前夕离长去港的长沙工商界大户以及科技人员回长。1949年夏，即长沙解放前夕，有个署名钱江潮者，在当时的《湖南日报》、《小春秋》等报上，发表《武汉归来》的长篇连载，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大肆污蔑共产党的政策。当时的长沙工商界人心惶惶，不明真相，产生了疑虑，他们害怕打仗，担心未来，中小户疏散农村，大户中则有的转移西南，有的便去了香港。在此情况下，我们去香港，一是动员他们回长沙参加祖国建设；二是捐款办报。到港后，住在六国饭店，首先找了原亚细亚银行的经理朱从捐款。并得到华湘企业公司的股东、协理、原慎昌洋行的谢光宇和当时在香港办农场的刘廷芳的支持，还由谢光宇牵头，在旅居香港的银行界、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共捐得港币9,000余元（回长后将5,000元交《民主报》，4,000元交《晚晚报》）。又向湖南旅港的有关工商界知名人士，如原太平洋商店老板唐农阶，原林林绸庄老板陈棣村以及刘重庵、谭敏学和科技人员肖荫云等人反复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和家乡的大好形势，经过动员，上述人员于1950年3月至1952年12月间先后离港回长，参加祖国建设。其中唐农阶变卖了在港的全部资产，率全家回长，其婿余润涛是农业专家，唐叫他放弃了在香港某洋行的高薪职务，随其回湘，为国家的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唐农阶回长后即加入了民盟组织，并与谭、刘、陈等人积极投资创办工商企业，为恢复我省国民经济贡献了力量。在香港热水瓶厂任工程师的肖荫云，也辞去了在香港每月港币13,000元的高薪职务，并带技师20余人回长参加了国家建设。当时湖南还无热水瓶厂，更无设计制作热水瓶的科技人员，肖爱国之心迫切，决心以自己一技之长报效祖国，回长后即任湖南企业公司搪瓷热水瓶厂工程师，为发展湖南工业生产，作出了显著成绩。

回长不久，我又奉命赴港策动工商界人员回湘。1950年5月，我再次赴港，首先与日本留学生唐天德（湖南平江人，父亲是国民党驻日本大使），其次与邓宏耿联系，当时邓系香港医师工会会长，我反复向他们说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说明祖

国统一势在必行，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但不久因朝鲜战争爆发，形势骤变，我奉命离港返长，将有关工作向领导作了汇报。

1950年7月，省委为配合土地改革，决定办一张通俗的农民报纸，于是把《大众晚报》改名为《大众报》，交与《新湖南报》管理。我与康德一起安排在省府参事室任参事，名记者严怪愚则到湖南师范学院任讲师，以后李龙牧也调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1958年6月间，我仍任私营寰宇进出口公司、晋通公司总经理，公私合营的湖南企业公司、建湘企业公司副总经理，长沙市百货公司第二经理，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资发展工商业。1950年下半年，我将吉庆街、文星桥两处住宅廉价出售给政府，并变卖首饰及银行存款等全部财产，共计旧人民币3亿元，全投入了工商企业。1951年我积极参加筹组了公私合营的湖南企业公司，推动了绸布、百货、棉纱、中西药等行业和土特产中的批发门市大户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此外，在银宫电影院的移交工作中，根据当时中央指示，民股发还，工商业主的股份没收，在登报预期发还民股后，我将剩下的1,800元股票，全部转到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市工商联作福利基金。由于我在建国初期，为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工商界的信任，几十年来先后担任湖南省政协委员、长沙市政协副主席、长沙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晓旦 整理）

沧 桑 五 十 年

曾 诚 意

在“高工”奠定我从事工商业的基础

我于1909年生于湖南湘潭（今株洲县）。祖父曾醒吾，曾在株洲渌口担任过厘金局长。父亲曾传坤，号杏仙，晚清秀才，娴熟四书五经，善琴棋书画，擅长小楷，但他一生瘦弱多病，从未外出谋事，靠祖传的田产营生，早在1925年病逝。母亲齐佩兰，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在清朝中过举。

我6岁开始从家训读书，由母亲一手启蒙，她手执戒尺，从四书五经教起。我们的家教很严，吃饭、睡觉、走路、坐、站、立都有规矩，并用诗、赋立字加以戒励，如成由勤俭败由奢；戒志满、戒骄傲、戒极乐、戒贪欲；要礼让，要诚实、要谦虚，要谨慎等等。到13岁，我才正式在朱亭和淦田许洞接受私塾教育，一直到1926年才插班到湘潭淦田高小，拿到了一张洋学堂高小毕业文凭。1927年考上湘潭中学，1928年又考入省城衡湘中学。1930年春，我在衡湘中学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报考“高工”，结果未取，很是沮丧。第二年我又打点行装，再次来到省会长沙，终于考入省立高级工业学校。

当年的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简称“高工”）系湖南唯一的一所公立工业学校，与当时的私立楚怡工业学校齐名，成为当时湖南工业，乃至全国工业人才的摇篮，它创办于1912年，校址设在长沙城北的甘家台子（现长沙市一中校址），全校共开设四个专科：纺织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应用化学工程科、电机工

程科，并在城北上大垅设有较大规模的实习工场（现长沙汽车电器厂厂址），教师全系留日归来的，师资力量雄厚。从1912年至1951年，共培养学生5,000余人，都分布于全国各大工业基地，大都担任工程师或总工程师。

在高工学习期间，我曾和接近较多的同学谈一些向往实业救国的想法，也深受染织工程科同班同学谢炳文、湛鸿章忧国忧民、提倡武术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从此，实业救国、发展工业，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1933年，入学不到两年，我便对工业如痴如醉，与谢炳文、吉孝潜、周翔云、湛鸿章等用节余的生活费组织了一个“月新印染研究社”，接洽棉织品印字印花业务，生意很兴隆。

在“高工”实习工场的五年

1934年，我从“高工”学校毕业后，好友谢炳文回湘潭，湛鸿章回溆浦，我留在学校实习工场当工务员，兼教染色实习，同时还兼教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染织专科课程。

1936年在“高工”任教期间，我们致力于工商业务，谢、湛来长时，常到我处促膝谈心，促使我实业救国的思想越来越坚定。但资金问题无法解决，后获得机械科工务员沈永菊同学的援助，订制了一口染锅，我和谢炳文都下了最大决心，我家出卖土地，谢向亲友筹措现款，每人投资600元，同时其他同学赞助300元，加上我的染锅共凑成1,500元，在株洲正街找了一个地址，筹办经纬染织厂，我推谢炳文任经理，准备经营土织土染洗染业务。湛鸿章无力从经济上投资，但常来株洲厂工作一个时期，湛鸿章思想比在“高工”期间更进步，我们受其影响很大。抗战初期，厂内订了《新华日报》、《解放》杂志等进步报刊10余种，对时事讨论学习很热烈，湛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并特别讲了红军长征过境溆浦鸡犬不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

故事。我经常往返于株洲长沙之间，星期六去，星期天回，谢炳文则长期留守株洲。当时抗战已爆发，谢在株洲办了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读书会，听他宣讲形势的人很多。但由于厂子未开工，长期关门筹备，引起了当时株洲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遂将经纶厂封门。我通知谢炳文将经纶厂迁来“高工”学校所在的湘乡永丰（今属双峰），谢炳文在回答我的信中说：“湛鸿章想我留守株洲，办好抗日救亡读书会。”并表示：“国耻未雪，何以身安，为救国而死，那是最美的。”

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的教育很大，因此，我也下定了决心，放弃迁厂计划，支持谢坚守株洲的抗日救亡阵地，一方面设法筹款，协商将小股退出，一方面找人合作，使厂子早日开工。经多方活动，终于与长沙绸布批发商秦汉云合伙开业了，改牌为经纶绸布庄。我们以厂址家俱投资合伙，提出一个条件，即要谢炳文挂名当副经理，不做实际工作，仍开展他的抗日救亡读书活动。开业后，正值长沙疏散，株洲业务很是兴旺。但谢炳文却于1938年8月31日，在敌机轰炸株洲时遇难。

在此期间，我已先一年随“高工”迁往永丰，事后我才清楚，谢炳文当时已系共青团员，并接受地下党员陈永清（原中央信访局局长）的领导。

闻谢炳文殉难后，我悲痛已极，即去株洲，冒着日夜不停空袭警报，请人画了一张谢炳文象去谢家祭奠，随后结束了经纶绸布庄的业务。

八年离乱和我的企业生涯

1938年底，我将经纶绸布庄的全部资金转到集成贸易公司。1939年春，“高工”在战乱中迁往湘乡永丰开学。在校期间，我与学校同事商议筹办染织厂，“高工”的同事有李挺芳（解放后任洛阳拖拉机厂总工程师）、谭涤予、王伯坤等参加，我吸

取以前办厂的经验教训，首先从经商入手，这样获利较易，可以解决以后办厂资金问题，几位同事采纳了我的意见，我们随即集资做运销生意，组成集威贸易公司。获利后，开始筹办华中染织厂，购布机4台，厂址设在当时“高工”附近的永丰柴冲湾，由我任经理，随后迁衡阳柘里渡。

1940年，华中染织厂扩大组织，我推成希文、周翔云等6人负责募股，筹措资金争取安江纱厂配纱。

当时安江纱厂所产棉纱一直是控制批发给有关方面的，国民党当局当时也曾打出扶助民营织布工业的口号，按厂价批准预售，但当时国民党当局，滥印纸币，导致市场通货膨胀，以致购纱从预售到结算，差价甚大，通常只有原价的50%—70%。但若真要购得棉纱，还得与当时的省建设厅，以及厂方负责人有密切关系，不然，任何人也休想获得按厂价批准预售的棉纱。我们利用“高工”师生和同学关系，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经省建设厅批准获得每月按厂价批准预售棉纱二件。

1941年春，为逃避战乱，华中厂迁到衡山大堡，我也正式辞去“高工”职务，专营华中染织厂。

1943年4月，通过关系，我又筹办了鼎新棉织厂，股份人员大都系当时湖南政界要人，无本起利再建厂，这就是旧中国民营工业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该厂花了50万元，在衡阳望城场建起了厂房。

鼎新棉织厂、华中染织厂均为我在衡阳经营的企业。此间还陆续投资了衡阳立达机器厂（建湘机械厂前身）、中洲棉织厂、新源电化厂、邵阳爱藏购油厂、辰溪利生纱厂、安江惠和纱布号、重庆明星化工厂等26个企业。

1944年，日军大举南侵，鼎新棉织厂与华中染织厂两厂全体职工及全部资产，由水路向零陵疏散，不久零陵告急，由我先行运一部粉物资至桂林、柳州，择址复工，其余物资拟由

火车运走。后因逃难人流如潮，火车拥挤，停止运货，只得改由水路向道县转移，船至中途，被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抢劫一空，大部份职工沦陷在零陵与道县之间，厂长刘组明亦死于斯时。我和家属则逃到桂林利华橡胶厂，不久桂林亦告急。货物只能用汽车运向贵阳，车至独山，因桥梁被破坏，所有车辆恐留着资敌，则全放火焚烧。从柳州运出的部份物资由罗学宪运至贵阳，结果抵作了运费。随着战乱，全部资财损失殆尽。鼎新棉织厂只好于1946年6月在安江召开股东大会，清理帐目，宣告结束。

我本人当时即携家眷，最后由桂林随肖伯修乘利华厂的车取道义宁，经龙胜、通道，辗转至靖县，1945年1月抵达安江。

不久，沦陷于零陵、独山的部份员工逃来安江，得纱厂厂长唐伯球等资助，华中染织厂又开始经营纱车业。并兼办谦和纱布号、国泰贸易行，三个企业都由我任经理，此间获利不少。

光复后企业在动荡中求生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集中精力经营纱厂业务，我遂将原华中染织厂清理结算，一次性照票面金额退还股本。

1946年秋，安江纱厂更换正副厂长，厂长为傅锡禹，副厂长是何振纲。我们在安江的业务此时由于纱厂的改组，过去内外结合、预售期纱期款和定户承销的办法行不通了，意见多了，当局也经不起舆论夹攻，不得不变更办法，从此只能用现款买纱，以前无本，资金少，可通过转手无本获利，现在不行了，只有把资金积聚和集中起来，与其他企业组成安江托拉斯才有出路。因此，我将谦和纱布号、国泰贸易行退股改组，与在贵阳的大纱商杨明心主办的惠通纱布号合并，取名惠和纱布号，

由杨明心和我分任正副总经理，于1946年成立。当时资本总额为2亿元，我投资了8千万元，当时还有长沙股东刘润湘、欧阳琯南，自置卡车4辆，由安江运纱至贵阳销售，兼营颜料和批发业务，设广州客庄，欧阳琯南任经理；长沙客庄，刘润湘任经理；衡阳客庄的经理则由王师雄担任。各庄业务进销地区的差价货物，均向银行借款调拨，以加快资金周转，不久“惠和”业务达到鼎盛时期，在商业界引人注目。但后来因力量分散，股东挪移营私（欧阳琯南在香港购进染料走私被没收），致使“惠和”损失甚巨，难以复苏，延至1948年3月，宣告结束。

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社会混乱，各工商企业的经营经常大起大落，且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致使大批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在当时形势下，民族工业已所剩无几，前景渺茫，当时我筹备的长沙利华橡胶厂也危在旦夕。沉痛之余，遂将历年来投资的26个工商企业股本，能收回的收回，集中全部财力，投入利华橡胶厂。与此同时，我由安江回长沙，仍以谦和牌号，经营花纱颜料。我个人还利用钱庄贷款，借贷银元1,800元，以每百斤七石米价购进一车棉花，由于我胞弟是外行，进货价高质次，而且运途起火，虽即时扑灭，但棉花已呈黄色，安江纱厂拒不接收，货不能卖出，而且还要支付租用仓库的费用。可当时货币贬值，一日几变，可谓早晨能买一石谷，中午只买三升米，钱庄天天逼债，随着市价数日一折，不到四个月时间，所借银元1,800元，就折欠银庄银元28,000余元。

由于金圆券贬值，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1948年10月初，大中华橡胶店抢购胶鞋，凭身份证限购，排队抢购者达数千人，击伤店员，挤毁门窗、柜台，只好关门停业。大西门正街纱号也被抢购一空。抢米风潮更为严重，大西门、西湖桥一带整日人山人海，路途为之阻塞；老弱妇孺

多被挤伤；南门一带五强、德茂隆，以及上河街太和等米厂被抢购者捣毁。

此时，我投资利华橡胶厂除资金以外，还以早年购置的长沙南门外大雨厂坪四亩土地作价投资，在新增资中我属大户。继尔，利华橡胶厂在长沙的筹建工作委托我主持，肖伯修任公司总经理，我任利华公司副总经理兼长沙厂经理，张鉴之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长沙厂厂长，罗学宪任利华公司常务董事兼重庆利华厂厂长。从1948年5月到1949年5月，在南门外大雨厂坪50号，建起简易车间、仓库、办公楼等房屋6栋，建筑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安装设备17台。当时，由于通货恶性膨胀，市面萧条，橡胶原料又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垄断，民族工业无法生存。1949年初，“利华”无法再开工，仅留7人守厂，其余员工只好遣散。

我和工商业者在长沙和平解放的前夜

1949年5月，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我对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认识，临近解放，白崇禧部盘踞长沙，城内一片白色恐怖，人们噤若寒蝉。在此情况下，我得到内人王新元支持，经原华中染织厂同事、安江办事处主任寻先治和彭葆芝同志介绍，结识了地下党员刘润世、杨肇明，投入了解放前夕地下党领导的民主运动。

我内人王新元，系家乡地主王登武之女，解放前在长沙衡粹艺校缝纫科毕业，1927年与我成婚，当时她在王氏良知学校读书，大革命时期受过进步教师黄守政的影响。1927年5月上旬黄守政要她联系其叔伯妹妹王月英去说服母亲取出田契，主动将家中数百亩田契交淦田区农会，途中曾被地主武装贺石生部队软禁于双太门，后经黄守政老师与农会主席周应堂接应方才脱险。她对我参加进步活动很支持。

1948年底，寻先治委托我通过关系在市政府弄到了一张身份证交给了刘润世，寻先治后又介绍我结识了刘润世同志。刘润世是经中共江汉区第三分区城工部郭伯城部长派到湖南做策反工作的。1949年春刘通过凌敏猷和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副书记欧阳方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报请省工委同意成立了湘东革命工作委员会。

刘润世系湖南岳阳人，其妻晏征环，与当时大众医院方德成妻周履端、沈名扬妻王平，以及寻先治妻周锦，均系湘雅护士学校第一期同学。因此刘润世来长，先后居住于方、沈、寻三家。后又通过其妻晏征环的湘雅同学冯思慰（天主堂医院护士长）关系，利用医院的候诊室作刘润世同志的秘密会客室。

我与刘润世同志结识后，刘即叫我联系工商界人士做好城市的护厂保产工作，并且叫我联系省商会理事长、国民党立法委员陈芸田、原安江纱厂厂长唐伯球（当时任省参议会议长）和我熟悉可靠的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情况，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等等。我闻命即行，与寻先治一同前往经纬新村唐伯球处，唐伯球儿子唐鸿烈（国民党监察委员）亦在家。当晚我又陪同刘润世访问了唐伯球父子，唐也向我介绍了中共华中局3130长沙第七总部负责人王灿然，我接受了中共华中局3130长沙第七总部工作证，还由此认识了刘建中，以后又掩护王灿然在利华橡胶厂居住了两个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地下工作的开支增大，活动经费困难，我即和唐伯球、汤永刚联系五金行业筹集银元1,000元，交寻先治转刘润世同志作秘密翻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城市政策八条》《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同志讲话和党的文件的经费。

临近解放，安江纱厂人心惶惶，内受黄色工会蛊惑，外受国民党残兵败将的威胁，老厂长李维国辞职回长，新厂长苏民又在安徽未到任，省政府即调省建设厅第二科科长罗学宪

去安江就任副厂长，罗系利华橡胶厂董事，又与我为至交同学，即将此情况函告于我，表示不愿去应付那个恶劣环境，维持那个“烂摊子”，并已对上公开表示不去。此事我和寻先治商量后，即向刘润世同志作了汇报。刘通知我把罗请来，我将罗学宪引到寻先治家，刘润世分析了整个解放战争形势，说明担负安江纱厂的护厂保产工作，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同时，通过黄定戒、戴朝震介绍罗学宪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又派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国兴持省公路局刘岳厚的介绍信去安江纱厂协助罗学宪工作。张、罗二人互相配合，在地下党的布置安排下，公开与国民党军队的明抢暗夺进行了斗争。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下旬即正式成立安江纱厂护厂保产委员会，正副厂长为正副主任，中层以上干部都任委员，张国兴同志任秘书。

在刘润世同志领导的地下斗争中，我还结识了平江金矿工程师、瓷业颜料和金水专家沈名扬。为组织民营工厂联谊会，筹建长沙市民建、工商联，我与沈名扬按照刘润世的指示，把工商界组织起来，护厂保产，迎接解放，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我和彭保芝、袁世先、刘涵、向德等，在地下党市工委杨肇明领导下，为帮助地下党了解湖南民族工商业和官僚资本情况，筹建了长沙民营工厂联谊会，向德任总干事，我和袁世先任副总干事，吸收长沙市的工厂主参加，成了党所领导的、团结企业界人士、贯彻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的群众组织。白崇禧部退出长沙时，实行所谓“坚壁清野”，强迫工商业往西南疏散，致使长沙部份工商界人士隐藏或外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民营工厂联谊会协助地下党组织召开座谈会，请地下党同志以经济学者身份讲解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保护私营工商业事实，给大家指明出路，号召公私厂商组织护厂队或纠察队。1949年8月5日，我与向德、袁世先代表民营工厂联谊会参加

迎解，向德被推为迎解大会主席团成员。

我当时寄以谋生的利华橡胶厂得以保全，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扶助，遣散的工人被召回恢复生产，1950年4月，接通电源正式开工。自1950年4月至1954年9月，在私营阶段期间，共向国家交纳税金69.96万元，创利税12.3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1952年开始，我厂接受国家包销，较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与此同时，我拿出利华橡胶厂股份一部份、上海振华橡胶厂股份全部，并领取利华厂红息，得以偿还了债务。

为了支援解放大军进军西南，解放后第三天王首道同志就召集刘涵、向德、袁世先和我等7人，协商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大政方针，我们遂以民营工厂联谊会名义开展工作，为那些复工有困难的厂家担保借款，组织运输，介绍业务，开展协作等，加速了长沙工业经济的恢复。另与解放军后勤部门联系，介绍工商界情况，出面帮助各厂和部队签订加工合同，保证部队的军需，还组织了支前借款、借粮活动。解放初期，银元与人民币争夺市场，长沙黑市银元交易猖獗，我们约法六章：①绝对遵守人民政府法令；②拥护人民币流通，拒用银元；③承认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一切货物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④决不阳奉阴违，私自买卖金银；⑤厂店主与工人互相监督，拒用银元；⑥如有违背，愿受人民政府严厉处分。为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民营工厂联谊会结束后，我被军管会聘为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和工商界代表一道发起筹备建立工商联组织，由左学谦任筹委会主委，向德、彭六安等任副主委，我任组织委员会主委。1950年10月，民主建国会长沙市筹委会成立，向德任主委，我任组织处处长。

解放初期的工商联，担负着工商界的组织工作和领导任

务。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在解放初期进行的经济斗争中，我们平息了解放初期长沙市的两次物价暴涨，打击了不法工商业者，抨击了国民党看共产党的“好戏还在后头”的谰言，组织工商业者开展了省内、省外不分行业的产品交易会，帮助部份工商业者克服了当时出现的产销失调的经济困难，搞活了商品经营，活跃了城乡经济。不久，长沙市最先出现了一批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如第一批工商银行收归国有，轮船、汽车公司最先过渡为国有企业等。此外，工商联还组织了长沙市100多个同业公会的改组工作。

1951年国庆节，我与王恢端同志被评为工商业模范工作者，参加了由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余金堂主持召开的中南六省提名补选全国政协委员候选人的协商会议。

在三大运动中

1950年6月，我当选为省土改委员会委员，与工商联筹委会其他成员一道，组织全市工商业者学习土改文件，支援土改工作。农村土改运动开始后，农民进城不履行手续捕人，引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惶恐不安，某大米厂经理李光模，被祁阳100多农民进城捕捉，通过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乐扬同志与农民协商和我做工作，问题才解决。以后成立了以陈芸田同志为首的城乡联络处，根据政策，保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安定了工商业者的情绪，划清了他们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界线。1951年2月，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市也开展了这一斗争。当时工商界存在着瞻前顾后、和平麻痹思想，筹委会即时组织工商界人士认真学习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控诉、揭发反革命份子罪行，及时调查了解掌握情况。全市25,000多工商业者还举行了支持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大会，使工商界

受到了分清敌我的教育。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开始后，长沙市工商界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首先发表了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集体订立了六项爱国公约，接着各行业又分别召开了遵守工商界爱国公约的动员大会，还根据各行业具体情况订立了补充公约。从11月11日到13日三天中还组织了20次时事讲座，听众达15,000余人。12月15日又组织全市工商业者32,000多人举行了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同时宣称：“坚决以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大会以后，由彭六安同志主持的税评会便开始征收1950年11月、12月份营业税的工作，工商界人士表示要积极缴纳国家税款，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很快便缴纳了90多亿元税额。随后在清结1950年工商税和预征1951年的营业税中，200多亿元的税额相继缴清，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嘉勉。后来在省工商界税务座谈会上，长沙市工商界又向全省各县市工商界挑战，并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税收工作中全市无一漏户。这说明长沙市工商业者的觉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得到了很大提高。1953年，我光荣地被邀为全国人民慰问志愿军代表团湖南分团代表，与长沙市总工会主席袁学之同志一道，赴湘潭军分区慰劳回国的志愿军官兵。

1954年，利华橡胶厂开始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也完全投入了民建工商联的工作。1954年，我当选为长沙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从1956年开始，我先后被任命为长沙市轻工业公司第二经理，长沙市轻工业局副局长、长沙市冶金机械局副局长。还先后担任了第一届至第四届长沙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省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以及民建省委副主委等职务。这都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给我的荣誉。

（晓川 整理）

经营航运六十年

胡德初*

我现在已是97岁的老人了。在这97个春秋的推移中，童年和求学仅占去十七个年头。余下的岁月，无论是清代王朝、民国肇造，还是全国解放，我都未曾脱离过航运工作。直到1965年，才由湖南省航运局批准退休，当时正是75岁。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一生中，也确曾遇到过一些崎岖和坎坷，但很少使我遇挫即折，而是奋勇向前。建国后，我随私营企业进入公私合营，继之进入国营，企业和个人都得到了改造和安排。虽然眼前抱病在家，但每月有退休工资，又有公费医疗的照顾，晚年的生活，可算是幸福安定的。

我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19日出生在安徽合肥东乡的小胡村，它紧贴着巢湖之畔。全村仅有七八户人家，大都生活贫困，我家也不例外。村里的青年，外出谋生的多，父亲胡昆明在我出生前，就与我两个舅父去武汉轮船上工作。当他任职清政府官船局“保元”轮大车(即轮机长)兼管带时，生活有所改善，才将我和母亲接到武昌定居，那时我才六岁。

1905年，我毕业于武昌西路高等学堂。在谋求工作中，由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曾在家赋闲半年之久，父亲为此焦急万分。在两个舅父的关怀下，最后商妥，令我随“登义”轮任大车的三舅父学轮机。在“登义”轮工作不到四年，就升为二车(即副轮机长)。不久，又政学驾驶，三年后，我就担任舵工了。在驾驶工作中，我绘制了长江中、下游航道的各个滩

*胡德初曾任长沙民众轮船公司董事长，本文系遗稿。

礁险道，对湖南四水的水位情况和航道变迁，记录详尽。解放前，内河航道没有设置航标，全凭驾驶人的实际经验和熟练操作驾驶。特别是夜间航行，更非经验丰富、操作技术精练者，不能胜任。在“登义”轮工作五年后，我已升任副驾驶员，经常在驾驶员离船期间，代理驾驶员工作。1915年，我经“登义”轮驾驶员的推荐，任江西萍乡矿务局拖轮驾驶员职。该轮专拖煤驳航行于株洲至汉口之间，为我开拓了进入湖南航业的道路。

在萍矿局担任驾驶员期间，与湖南海员逐渐交往。当时我感到，专航株汉之间，过于局限。乃于1917年经日商戴生昌汽船局的几位驾驶员介绍，进入该局，任客货轮大副。历经四年，不论白天黑夜，未曾发生过搁浅和碰撞事故。加上我有一定的文化和能写绘画，于1921年被调至局里任总大副。总大副的职责范围较广，除行政、业务、驶事不管外，凡属船舶修建的设计，轮驳航线的调整，以及对各轮驾驶员的指挥等等，皆属我的工作范围。当时戴生昌轮船局的航线很多，如长沙至湘潭、长沙至益阳、长沙至津市、长沙至常德、长沙至汉口、常德至汉口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长沙至汉口、长沙至常德、常德至汉口三线。这三线名系分开，实则统一。长汉和常汉客货均在途中定点对拨或换拖。这样，不仅节约了燃油的消耗，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运输工具的利用率，加快了轮驳的周转。实施这一规划的要点，是严格要求班轮准确到发时间，以及沿途船岸工作人员配合紧凑。因此，各个航次的重责均落到我和各轮驾驶员的肩上。洪水季节的班次衔接较易，冬令水枯，就煞费苦心了。所以，每当枯水季节，我就乘汽船穿梭于沅、资两水交接之间，和芦林潭一带指挥，甚至春节都在各点度过。1923年至1928年间，我数次被派往上海，接收购买的新旧轮汽船，并领航从长江或江苏内河出江阴驶返长沙。

大革命时期，戴生昌轮船局负责人戴振武及其主要亲信，

置数百名工人生活于不顾，携带全部现金逃往上海，各线业务停顿，职工生活无着。幸在省工会领袖郭亮的领导和关怀下，会同当时海员工会主席胡德成，发动全体职工，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调集船只，开航营业，且对职工工资比过去略有增加，工人生活获得了保证。不幸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突发，业务又告停顿。胡德成在工人协助下，化装乘专船离开长沙。此后不久，戴振武和其子庆章由上海卷土重来，对我在这段时间与职工组织营业极为不满，特别对多发工资一举，更是恨之入骨。加之戴的浙江系亲信，从中调唆挑拨，故对我日常工作寻隙作梗，蓄意刁难，使我难以忍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常在东北制造事端，引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这时，我既迫于私愤，也看满了形势，乃于1931年春毅然辞职。事后，戴振武曾委托与我交往甚密的江浙籍友好从事挽留，但我严辞谢绝。

我从戴生昌辞职后，得到航商友人资助，自建“德孚”客轮一艘，挤入长潭线营业。此事并非轻而易举，不仅要租到长潭两埠的良好码头和停靠趸船，而最重要的一环是争取旅客往返较多的班次。我当对选择了从湘潭早班六对开长，午班十时驶返湘潭。可这个班次恰在当时“新鸿运”轮开行时间前半小时，因此与该轮产生矛盾，势必引起拼争。“新鸿运”轮素以速度快著称，船长十丈左右，船身三层均可载客，为长潭线上的佼佼者。过去曾有其他轮船与该轮竞争，大都失败。当时，个别同行友好力劝我慎重其事，可我那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坚定不开则已，要开就非选定此线不可。我的把握有二：第一、“德孚”轮速度不亚于“新鸿运”，船型也不小于它，且舱位装饰新颖舒适；第二、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客餐质量。拼争之初，双方都保持票价不降，不久都增加票棚佣金，以鼓励票棚多拉旅客（解放前，长沙专有一帮无业者，集体开设票

棚，强行为各轮或公司代售客票，从中支取回佣。解放后，才撤销这一组织，人员都作了转业安置》。继之，发展到相互挂牌降低票价。经过两个多月的拼夺，双方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损失。此时，同业友好出面调解，议定：在“德孚”轮停开长潭线的期间，由“新鸿运”方每月津贴120元，以补偿“德孚”退出此线的损失。这一折衷办法，既不显示谁胜谁负，也无损于今后的利益，两方都同意了。调解期中，我正与长沙市商会理事长左学谦、新闻界罗心冰等拟筹划组织民众轮船公司，以抵制戴生昌汽船局，大部份精力贯注在这方面。1933年，“德孚”轮租与沙市航商傅锦斋营业，不幸在一次航行途中，装载棉花发生大火，除锅炉和两部机器幸存外，船身全部焚毁。所幸船员无一伤亡。“新鸿运”船主得知“德孚”被毁，即借故停付补贴。这次损失，对我挫伤极大。不过我并未灰心，1935年，又利用“德孚”轮两部机器，先后建造中型客轮两艘，再次与“新鸿运”轮竞拼，终于夺回了原“德孚”轮所行驶的航班，消除三年前船毁拒付补贴之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全国人民愤起谴责，全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此起彼伏，更加速了我们组织民众轮船公司的步伐。在长(沙)、常(德)两地的商会和新闻界大力支持下，筹措了开业资金，租妥长(沙)、常(德)码头和办公房屋，运输工具也得商了一部分航商的支持，是年底宣告筹备就绪。

1933年，民众轮船公司正式开航。当时，除我自有的“德孚”轮作基础外，又加租航船和客货驳各两艘，力争隔日有航班开出。开业之初，客货尚多，特别在长沙、常德两地商会动员下，各商号货物，大都交民众公司运输，一度使戴生昌的货运显著减少。该局不甘示弱，一面采取降价，一面出资利用个别航商，设立机构，增开长常航线，以图双管齐下，拼垮民众。更为恶毒的是，暗地雇佣流氓打手，妄图捣毁民众运输工具和营

业场地，甚至扬言要对我施加迫害，由于防范及时，未能酿成事端。在戴生昌大幅度降低运价和利用另一机构拼争下，民众公司业务逐步下降，每月收入除勉强支付职工工资和燃油料费外，对租进的轮驳租金则无力偿付，此种艰难困境达数月之久，为了保持班期照开，对外债款陆续偿还，我终日忙于借贷周转，心力交瘁。幸赖全体船员职工同心协力，共度难关，航班从来间断。倘当时被迫停航一至二次，其后果就难以设想了。因为停航意味着懦弱和屈服，更为重要的是对货主和旅客丧失了公司的信誉。

就在新生的民众公司处于危机四伏的劣境中，“一·二八”事件突告发生，日军明目张胆地攻打上海，再度激起全国抗日浪潮。长沙、常德两地学生会，积极响应全国学生抗日运动的号召，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交与日本商人有关的戴生昌的商货，又逐渐改交民众公司承运，乘坐戴生昌轮船的旅客，因在长沙、常德两地登岸时，被学生在背部盖上“亡国奴”的紫色大印，也敛足不乘戴生昌班轮了。对被戴生昌出资利用的机构人员，我们通过明说服暗策动的办法，将其业务骨干，聘调民众公司任职，旨在瓦解这一机构。当时，内有公司全体职工的积极努力，外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民众公司的业务日趋发展，由开始的入难敷出，走上盈余，面貌大大改观。五年中，陆续新建和购置客货轮六艘，客货驳五艘，货驳四艘，班次由隔日一班改为每日一班，又增开定期快速直达货班，声誉大振。这时的戴生昌则每况愈下了，一年来它与民众公司拼搏，已元气大伤，加之处于对它不利的政治气氛中，更是一筹莫展。与此同时，戴振武父子先后病故，企业一度交其子庆章之妻主持，班期混乱，业务不振，船舶失修，人心涣散，逐渐陷入病入膏肓之境。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的序幕正式揭

开。戴生昌的船舶虽经当时政府没收，但仍有少部份汽船，早有预谋地未曾在日本领事府注册。因此，利用上述少数船只，改头换面，组织源通汽船公司进行营业，但很快为群众揭发，没收了船只。自此，戴生昌汽船局彻底覆灭，人心大快。

1938年秋，日军侵占武汉，但长沙至宜昌一线客货甚多，当时无正规班轮行驶，两地和沿途城镇，客货积压颇多。为此，我与长沙巨商傅南轩集资组织复和轮船公司，专行驶长宜一线，营业数月，颇有收获。终因日军在新墙河一带蠢动，航道不安，而“文夕大火”，将长沙全城付之一炬。复和公司仓库，办公楼和全部设备，亦遭损失无存。当时，复和公司为我省私营公司条件最优、设备最全的企业，既有独用的良好码头，又有宽敞的内外仓库。办公楼高三层，为当时备内河公司之冠。

1939年至1944年上半年，盘踞新墙河的日军，每年发动一至二次南侵，加上空袭频繁，长沙人心惶惶，时告疏散。可是长江下游公私船舶纷纷集中长沙。为维持船员生活，都自行开展各线营业，长常一线，既有本省建设厅船航管理处的船只，又增加了招商局的船只，继之，苏、浙、皖帮亦参入此线，民众公司的业务受到很大的威胁，经济上又出现支绌。因此，在保证全体职工正常生活，轮船得到维修的前提下，将全部运输工具先后租与招商局和第二运输处营业，全体职工也随企业被该局、处录用。所得租金，专供各轮驳维修和添置设备之用。在实施此项措施的五年中，企业结构无损，职工无一失业，轮驳保持定期维修。执行之初，确引起个别人的误解和非议，但事后检验，始得到公司内（指多数职工）外（指长常两地商会委员）的支持和谅解。在当时的战争时期和复杂环境中，采取此举是较明智而成功的。

1944年6月，长沙沦陷，我带着停泊在长沙的轮驳，沿湘江上游疏散，途中有的被飞机炸毁，有的为避免日军利用，自

动沉，能顺利到达冷水滩的船只，所剩无几。后因敌人继续向西南进犯，避免资敌，只得一概凿沉。本省船员，返回故里，少数外省船员，随之经贵阳到重庆。

长沙沦陷后，民众公司幸存在湘西地区的尚有轮、驳各一艘，其他私营公司也大致如此。为了维持该地员工生活，就不免相互在常德、津市一带的有限水域内竞争业务，各方不无损失。统一组织起来集体经营，固然很好，但无人出面号召。直到1945年春，收到我儿胡则民详告湘西音讯后，我不畏交通阻塞，绕道赴常德、津市两地，邀请鸿安公司方丹一、富利公司王应材、津澧公司邵直卿等七家公司负责人会商组织机构，合作营业，拟出组织方案和利润分配等协议，成立了“湘西航运局”。实行船舶统一调配，既加强了原有航线，又增辟了未被日军侵犯的湖区城镇航班，当时，共有轮汽船10余艘，营业收入大增，为光复后打捞和修复轮驳的资金来源创造了优越条件。湘西局成立后，我仍返回重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我降七天后，湘西航运局即派胡则民由常德步行来长，整修码头，安置办公场地，并与当局联系，清除湘江下游航道的残余水雷。仅半月之久，湘西局就首开常德至长沙、津市至长沙两线航班。沦陷的一年多中，湘江河面，除日军汽艇穿梭横行外，未曾见过我国机动船行驶，故湘西局首航到达长沙时，河边观众如山，群众的欢呼声和鞭炮声，震动了湘江两岸。

为了抓紧打捞沉没船只，在当时交通部常德航政办事处批准和支持下，成立了“湘江沉船打捞委员会”，胡则民任主任，及时派员分途沿湘江上下游实地调查，进行打捞，并将大部份捞获之船就地修复。是年10月，我和王毓麟先后回到长沙，湘西局组织进一步扩大，增辟10条主要航线，当时我担任董事长，王毓麟、罗心冰先后任总经理，胡则民副之。

1948年春，正当湘西航运局进入鼎盛时期，各公司成员
的轮驳全部打捞修复，甚至有的公司和个人还增建了新船。羽毛
既丰，企图各自营业的念头应时而生，因而遇事意见分歧，各
行其是，具有规模而有发展前途的湘西局终告解散。从此各公
司另立门户，基本上各行驶原属航线。民众公司以经营长常线
为主，长汉线为辅。罗心冰任总经理，胡则民任经理。

1949年夏，武汉解放，继之解放军节节向湘境推进。长沙
市场萧条，各公司业务清淡，法币大幅度贬值，朝不保夕，加
上军差频繁，差费又少付，甚至一文不付，造成各公司的工资
和燃料等费支绌。这时，民众公司被迫卖出民强轮船一艘，以
支付工资和偿还燃、油料欠款，但待价款到手，已贬值近半，
尚不足清付全部债款。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各公司轮船忙于支前运输，
运费收入突增，不但逐步解除经济困窘，且有余力维修失修船
驳。嗣后，我将自有的轮驳，分别入股复华、长潭两公司。由
于我年届花甲，故未担任各公司职务。

1952年“五反”运动中，派驻民众公司的工作组，令我到公
司参加运动，接受教育。经过一个多月的隔离反省，于4月中旬
始恢复自由返回家中。是年秋，省交运厅派来公股代表进驻民众
公司，清理该公司公私股权及有关事宜，我重返公司协助工作。

1954年4月，民众公司批准为长沙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
的湘江轮船公司，我被委任副经理职。1956年，湘江公司并入省
航运局，我随企业进入该局任机务科副科长。1965年，我因年
过古稀，经领导批准正式退休。

（胡则民 整理）

七十年来的回顾

王恢端*

我今80岁，1907年出生于原衡阳县凤飞乡（今属衡南县）大牧岭对门王家一个贫农家庭，祖辈世代务农。有兄弟姐妹共10人，我居其三，父亲于42岁时去世，赖寡母抚育成人。因家贫，入私塾三年而辍学，为人牧牛，弥补家食。稍长，除从事农业劳动外，常赴连州担南盐谋升合。幸二兄在外，微有工资收入，得以勉强度日。

一、从商立业

我本以农为业，1928年因赘族人王玉衡的提携，招我入九河源纱布店当学徒，从此弃农经商。在学徒期，年逾弱冠，开始羞作洒扫杂务，后则习惯成自然。当时学徒的日常工作是提货物、作杂役，夜间学习书算。我因年事稍长，见识和理解力也较强，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尚能熟悉行情，渐得店东赏识和信任。三年未滿，即派往长沙驻庄，独挡一面。后来，九河源因与桂阳人李陶承、刘束甫合伙组织集生锡庄于临武县香花岭，收购点锡，运销汉、沪等地。由于矿商狡猾，不易应付，店东于三年中，连派三人去管理，均遭失败，陷垫三万银元，无法收回。1931年夏，乃改派我司其责。我到任后，力谋挽回颓势，主张以账养账，同时还开采几处窿口，建设几座炼锡厂，终于打开了局面，收回了垫款。1937年抗战爆发后，九河源认

*王恢端曾任衡阳泰康纱布店经理。

为沪、汉失守，点锡无出路，拟撤销集生锡庄，集中力量搞纱布，我则认为锡庄尚有可为，要继续经营。以彼此意见相抵，乃毅然离开。

我在九河源帮贸十年，离店时仍然囊空如洗，只得向友人借款400元，携往香花岭，独资经营大生昌锡庄，甘冒战火，贩运点锡至广州出售；广州失守后，转赴汕头、金华等地出卖，两年中获利上万元。1940年1月，我回到衡阳，得知九河源独资的经营方式，压抑了职工投资的积极性，内部矛盾已深。店主为缓和起见，要我出面组织协记布庄，使职工均可入股。因此，我放弃了香花岭业务，出任该店经理，经营一年，成绩尚好。不幸1942年春，日军在广东深圳登陆，我店在淡水、汕尾、香港三地，损失布匹2,000多匹，胞弟王颂祥，也在此时为抢救货物而丧生。但我并未气馁，仍在江西吉安进货，力挽危局，年终结算，尚有盈余。当时为抵制国民党政府税收，我曾多次改牌换记，由协记、而德记、而森记、而振华匹头号，巧妙地逃避了繁重的税负。1944年衡阳沦陷，因已早作疏散准备，损失较少。唯全部流动资金，则已耗光。抗战胜利后，为谋求生计，又与胞弟颂祺，族弟颂涛，各自卖衣饰，每人集资法币100万元，另集外股500万元，开设泰康纱布店。我任经理，祺、涛二弟出外驻庄。头年因经营不善，仅能保本，我仍坚持惨淡经营，并在上海设立泰记采办庄，终于扭亏为盈，获利巨万。1948年秋，乃自购铺屋一栋，为泰康扩大营业奠定了基础。

回顾一生从商立业，历经艰辛。其所以能在商业场中，略有建树，主要原因有：一、自己作风正派，无不良嗜好，能团结同仁，开诚相见，使大家乐于同心合力，共同为事业奋斗。二、事业心强，迎难而上，再接再厉，务求立业。三、广搜信息，洞察行情，知己知彼，出奇制胜。四、自己不搭外股，也

不多分红利，遇事秉公处理，对同事一视同仁。为使职工安心效力，还购宿舍一栋，博得全店员工称许。

二、新的历程

解放前夕，我常与一些进步人士交往，初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产生反感与厌恶。当解放军大军大举南下时，本市不少商人，纷纷挟资外逃，我则认为国民党必败，解放军必胜，象我这样的中产阶级，不但不要跑，而且还应当作迎解准备，因此，我决心不外走。但为避免反动驻军的骚扰，我只好暂将泰康关门，货物半储店中，半运乡下；并电告上海庄，暂不撤回，静待消息。安排妥当后，我即离开衡阳，回到老家去了。回家后，思想斗争很尖锐，因为明知共产党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又是打倒地主的，而我一身兼而有之；要闯过这一关，唯一的办法，是寻找革命路线。恰在这时，有个近地人叫黄春辉的，他从湖大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中学教书，过去经常来我家玩耍，曾给我灌输了一些进步思想，这时他要向我借培元小学办补习班，我意识到他一定是来搞革命活动的，便大力给予方便和支持。后又有一个青年教师张铭三，也经常来此活动。他们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保护工商业者的文件给我看，使我大破疑虑，大开眼界，并深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1949年6月，黄、张两人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的最大转折，真使我喜出望外。从那以后，我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凡是党的活动，支部生活，我都全力掩护。如支部在我家开会时，常使爱人廖仁佑在外站哨，会后文件，由她转放娘家。其时有些地下工作人员，均在我家住宿，有时多达二、三桌。1949年10月，衡阳解放，我被分配在市内工商支部，与李百源、陈翰邱为一组。1951年市委书记毛远耀，认为我适合搞工商界工作，劝我退党，以便起着党员

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我当时虽不愿离开党组织，但为了党的利益，也从我的实际出发，只能听从安排。首先将泰康开门复业，通知上海庄大胆进货，借以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同时还给零售店赊销，帮助其开展业务。对完成支前、捐献飞机大炮、购买公债，以及缴纳税款等方面，均起了一定作用。同年中共市委号召发展工业生产，改变衡阳面貌，我立即联合新华、恒成、协祥四家纱布批发商，由商业转入工业生产，我被推为筹备主任。在筹组过程中，我首先将泰康全部财产入股，后又吸收两家染坊和一个织布社搞私私合营，创办衡峰染织厂，共有职工94人，资金12万元。1951年6月，市人民政府投资2万元，工商联筹款4万元，成立衡阳企业公司。1952年6月，我任该公司经理，并经得衡峰染织厂股友同意，将该厂转入企业公司，改为企业公司染织厂。之后，公司成立党组织，派出了公方经理，我同历任公方团结合作，业务迅速发展，先后一批厂店转业，创立针织厂、玻璃厂、冶炼厂、印刷厂、纸伞厂、土特产批发部、文化用品部、进出口贸易部等。全公司发展有近800人，私股股金约50万元。1956年1月，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政府鉴于亦工亦商的企业公司，其组织形式，已不适合社会主义体制，决定撤销，由市工业局接收管理。几年来，企业公司曾为国家积累资金100多万元，并为推动公私合营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榜样。

我离开企业公司后，调到中国民主建国会衡阳市支会任专职主委，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我为党工作不多，贡献很少，但获得的荣誉却很多。最令人难忘的是1951年国庆节观礼，我第一次以“工面工作模范者”的光荣称号，受到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亲切接待，心想自己不过是一个中小城市的商人，居然能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各首长握手，这使我感到无限光荣和激动。北京观礼后，由同行代表曹诚意同志介绍我为中国民

主建国会长沙支会会员，接着中共衡阳市委同意筹建和发展衡阳民建组织，首批吸收戚祥麟、欧文著、姜伯雄等十余人入会，成立衡阳市民建小组，我为召集人。1953年正式成立市支会，我被选为主任委员。自担任主委后，党给了我极其优渥的政治待遇。1954年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常委，并由中央政务院任命我为衡阳市政府委员。先后以代表身份于1952年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翌年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代表大会。1954年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代表大会。每次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三、坎坷述感

1956年全党整风开始，我为帮助党整风，曾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在群众中听到的反映，如实地在各种会议上提出，原想作党的净友，别无其他意图。谁知事与愿违，全国反右开始后，我和戚祥麟在省工商联开会，会中被召回批斗。接着运动逐步深入，竟有人诬陷我与屈子健、杨晓麓等三人在岳屏公园，密谋争夺市长领导权，后来成了我的主要罪行。1958年秋处理右派时，我被降薪三级，仍保留部份原职，送省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改造。我的工作种蔬菜，在1960年大种大养号召中，我培育了35小块菜秧，每日从塘里挑水几百担，把秧苗浇得葱绿似锦，曾备受赞许。在学院三年，边劳动、边学习，倒也心情平静。1960年我被摘掉右派帽子，精神为之一爽，因我始终相信党是正确的。1961年我离开了社会主义学院，安排在大码头棉布店任主任。1964年百货、纺织两公司合并，我改调庆新百货店站柜台。同年四清运动开始，我虽未受冲击，但我的爱人廖仁佑，却被新定为地主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爱人和小孩，均被下放农村。那时动乱不断加剧，所谓牛鬼蛇神，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由四类、而五类、而七类，直至21种人。我家被查抄三次，连家具都被搬走了。在这大乱之年，我被游了两次街，挨了三次批斗，最后被停薪下放农村，劳动十年。我虽年逾花甲，体力不支，但对农作技术，尚不生疏，生产队安排我种棉花，四年中作出了显著成绩。我的自留土，虽属不毛之地，但种出的蔬菜，比老农还胜三分。1972年8月，党给我作了第一次落实政策，准予退休，但仍不准返城；这时我已恢复工资和口粮供应，不再出工了，一家三口，尚能勉强度日。我平时最爱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农闲时则对乡亲们进行时事政策宣传，乡亲们对我也很尊重，彼此亲密无间。在农村十年，我始终相信党、热爱党，也从不埋怨党，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获得彻底平反，于1979年1月携家返城，先后担任民建衡阳市委副主委、主委，衡阳市政协常委、副主席，衡阳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建省委常委等职务。这真是枯木逢春，恩同再造。

记长沙市工商界1950年北上参观团

黄曦龄

解放初期，长沙工商界许多人疑虑重重，心中有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特别是解放前夕，长沙工商业者受过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国民党特务炮制了署名钱江潮的《武汉归来》一文，通篇造谣诬蔑，扰乱人们的视听。虽经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工商界做过许多工作，仍有相当多的人疑信参半，乃至疑多于信。因此，工商界恰如当时流行的对联：“举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解放后，长沙市的私营工商业，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鼓舞和人民政府的扶植下，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在长沙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的过程中，面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加上企业本身的先天弱点和市场调整带来的暂时困难，不免感到彷徨。譬如：老解放区有不有私营工商业？土改关好不好过？私营工商业有不有出路？党和政府说的话靠不靠得住？等等，都急切地希望得到解答。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工商界思想较为先进的人士，提议组织一些人到老解放区去实地参观，这个建议符合工商界多数人的心愿，引起市工商联筹委会的重视，也得到省、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于是，便在1950年2月底，由15位工商界人士组成了“长沙市工商联筹委会北上参观团”，到华北、东北等地进行了50天的参观访问。笔者当时作为市工商联的工作人

员，对北上参观的全过程有所了解，特撰此文，供同仁参考。

北上参观的任务

“我们北上参观，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寻师访友，求教取经。”参观团团长黄曾甫的话，生动地表明了北上参观肩负的特定使命。

北上参观首先是为了通过实地观察和调查，了解老区私营工商业的实况。前面说过，工商界对党的政策、劳资关系，存在许多疑团，在企业和个人出路问题上有着无穷的忧虑，很想带着问题去求得答案。正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情愿自备旅费去看看。

其次，想从老区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中学点经验。由于长沙工业与商业的比重为2：8，工业户中，手工业户占80%。在旧社会，它们习惯于面向少数有钱人，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就感到难以适应，经营商业者想转向工业，又无门路、无把握，只有到老区去调查了解，看看同行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的，才能得到启发，坚定经营信心。一位经营绸布业的团员就是带着“四苦于”北上的。即：生意清淡，苦于无法扩展业务；开支过大，苦于难以紧缩；劳资对立，苦于无法协调；打算转业，苦于难找门径。这颇具代表性。

第三，促进南北物资交流，是个附带的目的。根据历史经验，收购本省的土特产，运销省外或国外，有利可图。湖南的矿产资源相当丰富，他们想通过参观访问，同老区公、私营企业沟通业务关系，为自己企业和行业开辟业务门路。

第四，为发展火柴、造纸、织染、陶瓷工业学技术、找经验。中南区有意要湖南把重点放在发展这四种轻工业上，长沙是全省工业经济的中心，执行这项任务，义不容辞。但长沙私营工业中，从事这四种工业生产的人并不多，资金技术条件也

很欠缺，因此，想看看老区是怎么做的，故参观团成员中，包括了火柴、造纸、织染等行业的代表。

另外，北上参观团还担负着两项政治任务：一是代表长沙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旗。市工商联筹委会特制了一面黄缎红边大锦旗，用湘绣精绣“人民导师”四字，交参观团带往北京献给敬爱的毛主席，表达家乡人民对革命领袖的衷心爱戴；二是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于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局局长会议。这次会议除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劳动部、局长出席外，还邀请了15个城市的工会代表和工商界代表参加。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邀请市工商联筹委会秘书长黄曾甫作为工商界代表与市劳动局局长张平、市总工会秘书长林南一道出席会议，参观团抵达北京后，除黄曾甫团长出席大会外，还有两个副团长、两个团员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大会。

参 观 团 的 组 成

长沙市工商联筹委会是1950年1月成立的。2月21日，向市人民政府呈递了组织北上参观团的报告，第二天就得到批准，并同意发给团员身份证明和致各地人民政府的介绍信件。省委统战部张立武科长也随团出发。同时，程潜省长给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求给予照顾。党和政府的关怀，给了工商界极大的鼓舞。

2月23日，自愿报名参加的团员达到14人，临行之前，益阳县商会闻讯派谭炳星赶来长沙报名，团员人数增到15人，共推黄曾甫为团长，黄松年、邓济美为副团长，参观团的阵容，拥有13位工商业者，一位技术人员，一位摄影师。按行业来分，计工业代表10人，商业代表4人，交通运输业代表1人；以年龄论，团员最大的52岁，最小的20岁，一般在40岁左右。大家商定在2月底出发。

2月27日，长沙市工商联举行了欢送会，左学谦、向德主持了欢送会，市工商局、税务局、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及新闻界人士出席，大家对参观团北上寄予厚望。

愉快的旅程

2月28日，北上参观团从长沙出发，经武汉、北京、天津，出山海关，远征沈阳、哈尔滨，行程8,000里，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党政首长的亲切接见和工商界团体的热情欢迎。团长黄曾甫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唐僧取经，经历千难万劫，今天我们来参观学习，却是一路滔滔，温暖如家。一群内地中小城市的买卖人，抛山海关来到东北，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沈阳市朱市长、工商联卢主任也说：“有朋自远方来，难得难得。”

在北京，共停留了18天。5位团员出席了全国劳动局局长会议，听取了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劳动政策及劳动部的任务》的报告，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施政报告，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等人的专题报告。3月11日，听取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薄一波副主任《关于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报告》。3月14日，黄曾甫团长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在会议闭幕式上，全体代表还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参观团成员还按北京市人民政府安排参观了14个工厂和重工业部机械展览会。

此外，团员们在北京还参加了几次有重大意义的活动。3月18日，全体团员应邀参加了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龚饮冰，王新元主持召开的座谈会，着重就发展湖南轻工业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3月20日，全体团员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特为该团举行的招待会，由林伯渠秘书长代表毛主席主持，会

1. “北上参观团”代表长沙工商界向毛主席敬献锦旗，也由林秘书长代表毛主席接受。会后，林老与全体团员合影留念，共进晚餐。3月21日，全体团员应邀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军管会、工商联联合举行的座谈会。3月22日，全体团员出席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的茶话会。此外，他们还参加了中央企业局举行的公私关系及联营问题座谈会和轻工业部副部长龚饮冰主持的研究转业问题的座谈会等，还分别拜访了谢觉哉、杨立三、田汉、廖沫沙等老同志。

行程的第二站是天津市，停留了9天，参观了三家国营工厂和12家私营工厂；还去塘沽参观了永利碱厂和久大盐业公司。天津市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处理得很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久大公司何季荃厂长向大家介绍了著名实业家、湖南湘阴人范旭东先生艰苦创业建设久大、永利两个大企业的经过，团员们无不为之艰苦奋斗、为国争光的精神所感动。

在天津，团员们先后出席了黄敬市长、久大盐业公司李烛尘总经理、永利化学公司协理余啸秋主持的宴会，相互交流了思想、联络了感情。

4月1日，参观团乘车出山海关，抵达沈阳市，参观了2家国营工厂，3家私营工厂，一个养鸡场，并到故宫参观了工业展览会和博物馆，出席了东北人民政府和沈阳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访问了沈阳市工商联。工业展览会展出的鞍钢和小丰满水电站模型，使得团员们大开眼界，深为祖国工业建设的光辉前景所激动。

最后一站是哈尔滨，看了东北农副产品展览会和3家国营工厂，调查了解了当地私营企业的情况。还出席了哈尔滨市政府和工商联举行的座谈会，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哈尔滨是一个解放近4年的老区，在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色彩较浓的消费城

市，有“东方小巴黎”之称。参观团获得的印象却是生产性城市的气派，人们忙于生产，街上行人不多，物价平稳，低于关内。私营工商业正常发展，厂店户数比解放前大有增加。总的印象是解放越早，情况越好。除此之外，往返途中经过武汉时，受到武汉市工商联热情的迎送和宴请，加深了情谊，扩大了影响。

丰富的收获

北上参观团访问老解放区，是乘兴而去，满载而归。

首先，通过实地参观，消除了疑虑，增强了信心。北上之前，工商界好多人看企业现状有如“枯藤、老树、昏鸦”，看个人前途，恰似“古道西风瘦马”；心情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到老解放区一看，全然不是原来所想象的，老解放区劳资关系正常，劳动纪律良好，最使团员们惊异的是哈尔滨没有一起劳资纠纷，天津市私营工厂9,000多家，沈阳私营工商业户30,000多家，几乎都是从解放前瘫痪半瘫痪状态中复苏过来的。哈尔滨有一家日产面粉1,000袋的私营双合盛面粉厂，为国营粮食公司加工，保证可得10%的纯利。长沙湘中面粉厂经理罗正午亲眼看到双合盛的情况后，心中的疑云一扫而空。经营商业的团员，看到哈尔滨私人独资经营的同汇百货商场，生意很好，职工多达200余人，也就消除了“私营商业无出路”的疑虑。原先他们认为土改关难过，土改后更没有生意可做，可是通过调查了解，属于工商业者兼地主的人，均能受到政策的照顾，土改关一般都过得顺利。土改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经济也活跃起来，农民购买力提高了，城市工商业更有生意做了。土改后东北农村土布的消费量，1947年是150万匹，1948年翻了一番，1949年又增加到700万匹，1950年预计是1,000万匹。团员易炳章感叹地说：“要繁荣城市工商

业，土改必须赶快实行。”由怕土改到望土改，这是认识上的大转变。在出路问题上，《新湖南报》记者在采访北上归来的工商业者以后，以《大有出路——北上参观团带回的结论》为题，写了一篇通讯，如实地反映出团员们普遍地消除了疑虑，增加了信心的情况，指出出路问题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思想问题，解决得较好。

其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党和政府更信赖了。北上参观期间，恰逢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召开，许多团员列席了会议，中央首长的报告，使团员们如沐春风，在多次座谈会和宴会上，能与首长们握手交谈，更是感到异常亲切。须发皓然的林伯渠秘书长接见团员时，用地道的澧县话说：“你们一向是穿料子衣服的，怎么现在都穿蓝布衣服呢？你们有什么好衣服尽可以穿嘛！把衣服藏着，那就可惜了。”一下打消了团员们的拘束感，此外，林老还详细谈了私营工商业的前途问题，并且希望工商界把湖南湘绣恢复发展起来。李立三、李维汉、龚饮冰、施复亮、黄炎培等给团员们谈了很多政策问题，使大家豁然开朗。团员彭瑜龙感叹地说：“各位首长恳切的教导和热情的照顾，把我们心头上的阴影完全抹掉了，对政府的工商业政策的认识更清楚了，由衷地感到今日之政府才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还有的团员说：“工商业者要求得进步，就应该除掉自己的怀疑病、自私病，相信党和政府，想到广大群众。”

第三，吸取了经验，明确了前进方向。参观团访问了四大城市，了解到各地私营工商业的历史与现状后认为：凡是有利国计民生和正当经营的私营工商业，均得以存在和发展，而无益于国计民生或者非法经营的，或萎缩或淘汰。如：钱庄业和经营金银、珠宝、古玩、奢侈品的行业在萎缩，个别违反政策法令的企业被关闭，从而认识到私营工商业要发展，就得端正经营方向和经营作风。他们对老解放区的商品实行明码实

价，面向大众，薄利多销，以及同业联营组织及时转业的做法，很感兴趣，认为应当学过来，在劳资关系上，意识到过去大权独揽、老板专制、欺压工人那一套吃不开了，应当从不民主、不平等的旧劳资关系，转到民主的、平等的、互利的、契约的新劳资关系上来。天津、汉口创造的“劳资协商会议”的经验，北京、沈阳、哈尔滨各行业普遍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学习和吸取，他们带回了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守则和多种劳资集体合同的样本，深为取得了“经”而高兴。在公私关系上，看到老解放区私营工商业接受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以及经销代销国营企业商品，取得合法利润很受启发，从而为后来调整公私关系以及创设省市企业公司和投资公司扫除了思想障碍。

第四，与几大城市工商界互通了情况，建立了业务联系。在轻工业部座谈会上，他们与湖北、江西、四川的工商界代表一起座谈，各自介绍了本地情况，还探讨了上海工厂内迁，实行上海的设备技术同湖南的资本劳力相结合的问题。在几大城市的参观访问中，都同当地工商联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和业务联系，共商了南北物资交流问题。通过这些活动，沟通了一些业务关系，开拓了一些交流渠道。因此，1951年春，在全省土特产展览交流会上，外省工商界前来参加者颇多，成交额也很可观。

总之，50天的北上参观，对15位团员来说，教育很深，收获很大，是终身难忘的，对他们企业和他们个人的改造大有裨益，北上参观团归来后，对长沙乃至全省私营工商企业的改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日本对湖南的经济侵略

彭国兴

鸦片战争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过中国，他们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湖南是内地省份，距海较远，外国列强的势力侵入较迟。1899年，在英、日两国的要挟下，岳州始开为商埠，湖南这个被列强久所窥伺的“铁门之城”被打破了。此后，外国轮船闯进了湖南的内河，外国商品象决堤洪水汹涌而来，湖南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在侵湘列强中，又以日本经济渗透的程度尤深，为害尤烈。

（一）从岳州到长沙等地的开埠

列强势力侵入湖南，是以辟岳州为商埠发端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英国人要求打开湖南贸易之门。其初本是向清廷请求开放湘潭为商埠。总理衙门接到英国人的请求后，即以文书征求湖南巡抚的意见，湘抚陈宝箴又转而征求本籍士绅的意见。当时颇有影响的大绅王先谦、王闾运等人，均坚持不可通商。陈宝箴又将地方绅士的反应上呈，总理衙门在复电中催促湘人接受开埠要求：“国家安危大计，此时全赖英人排解，湘人素忠义，务当仰体。许以通商，可不划租界，不夺民利益，但当安静，实为两利^①”。湖南官绅仍以

^①《收湘广总督电》，《总理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七日”。

风气未开，恐滋教案为由加以拒绝。陈宝箴在回电中说：“此时即通商，窃虑乱出意外，防不胜防，且伏莽尚多，唯恐无所藉口，设有不虑，金无以对外。”反过来，陈氏以为“万稳之策”是要求英人放弃湘潭开埠。在再一次遭总理衙门的批驳之后，陈宝箴知一味拒绝开埠不能解决问题，乃暗中致总理衙门一密电，请求以岳州交换湘潭。但他不愿承担责任，又另电要小总署假英人“作为发端”。在电文中，陈宝箴解释说：“湖南人情，本均难通商，因虞时局关系重大，必不可已，则岳州近鄂，较湘潭稍便措手，故前上一电密陈以岳易潭之议。唯此议若云出自湘省官绅，岳州士民必以袒湘（潭）薄岳（州）为疑，转觉费手。既事在必行，应恳钧署径自以英人请往岳州通商为言”^①。

湘人的意愿如此，总理衙门亦莫可奈何。旋经“英国与日本并力与总署交涉，始得于洞庭湖口之岳州作为自开之通商埠”^②。1898年3月24日，总理衙门奏请于湖南岳州府添设通商口岸，获清政府允准。此后，岳州开埠进入准备阶段。“举凡购买民地，修筑剥岸，马路，楼房，货栈，及营造关署，添募巡捕”等一切事宜，均由湖南地方当局“自行办理”^③。1899年6月4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又为岳州开埠事专折入奏，恳请朝廷“飭部先行筹拨的款二十五万两，迅速解湘，以济急需而免贻误”^④。同年11月1日（九月二十八日），署岳常澧道张鸿勋、署粮储道蔡乃煌、岳州知府翟秉枢等与商办岳州通商事宜江汉关税务司马士公同议定了岳州开埠章程25条。11月13日（十月十一日）岳州正

①《收湘抚电》，《总理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五日”。

②〔日〕林繁著，汪国鼎译《扬子江流域形势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5月再版本）第9页。

③、④《奏岳州开埠各事宜折》，《俞廉三通集》卷100。

式开埠，海关设在城陵矶，由美国人哈利斯充任海关税务司；湖南分守岳常澧道则移驻岳州，兼管岳州关监督事务。

岳州开埠后，日本捷足先登，先后有“日本之领事馆及大阪商船会社，东肥洋行皆已于该处选定良地，立券租赁”，并建立起最初的经济侵略基地。据海关册报，“开关之翌年（1900年），岳州贸易总额不过十四万余两，其进口货值七万八千两中，鸦片占六万余两，其余一万两，几全为日本棉纱”^①。更有甚者，“日本商家欲在（岳州）南段月塘州租赁地亩，开设炼锡厂，嗣因矿务局弗能允定月有若干锡砂，以致中辍”^②。可见，岳州一开埠，日本对湖南经济侵略的势头，就咄咄逼人。

岳州开埠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进一步侵入湖南内地。早在1898年，英国就向清政府提出过开放长沙为商埠的要求，由于湘省官绅的抵制，便以岳州开埠代替。及至1902年1月，英国趁与清政府开始谈判改订《中英通商行船条约》之际，再度提出开放长沙的要求。对于英国此举，日本甚为关切。同年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撰文鼓吹改订中日通商条约，他露骨地宣称：日本不能“附英骥尾”，应早派“日本商约专员”“直向北京政府开议”，“使其贯彻我国固有之要求条件，庶将来可于四百兆人之大市场，以扩张我商权”^③。随即日本政府委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为全权代表，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为日本商税使，开始斡旋改订商约之事。1902年四五月间，小田切赴鄂会晤湖

①〔日〕林繁著、汪国屏译：《扬子江流域现势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5月再版本）第9页。

②刘世超编：《湖南之海关贸易》（1934年8月初版）第一章，第13页。

③克乐思：《光绪二十六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湖南历史资料》1979第1期，第177页。

④〔日〕大隈重信：《论改定中国通商条约》，全文原载日本《太阳报》，后译载于《湖南官报》第21、22、24号（1902年5月9、10、12日）。

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日本政府希望“长沙、常德开口岸”，张之洞则“告以长沙已允自开，俟长沙开后，如彼此相安、彼此有益，常德亦可开”，小田切还提出日本轮船公司“须在湘潭设小轮码头、栈房”，张之洞答以请与中方商约大臣议。事后，张之洞将此次会晤情况致意清政府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并提出“至湘潭设栈，各国效尤、则是不开之开，更多一事，不如准其开湘潭而删去长沙，免于省防有碍”^①的建议。

张之洞这个以湘潭代长沙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后中英、中日间在上海改订商约过程中，英国和日本仍不免于长沙开埠之要求。1902年9月5日，清政府商约大臣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7月8日在北京互换生效）。条约第八款规定：“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即湖南之长沙……”^②。1903年10月8日，清政府商约大臣又与日本代表在上海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续约》（1904年1月11日在北京互换生效），其中第十款规定：“中国允愿俟本日所订画押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续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以内，将湖南省之长沙府开作通商口岸，与已开各通商口岸无异”^③。

1903年底，湖南巡抚赴尔巽为筹备长沙开埠事电咨外务部，请外务部飭总税务司转飭岳州税务司夏立士来长沙履勘界址，拟定章程，先行布置。旋经夏税务司与湖南洋务局官员实地查勘，“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杳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

①此处未加注引文，均见《张之洞致上海吕大臣、盛大臣、江宁刘制台电》（1902、5、4），收入《张文襄公集》卷一百七十九“电牒五十八”，第17页。

②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1959年版），第107页。

③同上，第194页。

东傍铁路，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为作通商租界较为适合，就“金以（北门）为宜”^①。稍后，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奉本国政府训条，前来勘量地势”^②，“亦谓舍此（北门）别无他处”^③。这样，长沙商埠区域的界址就议定在北门外一带。

但是，英国对日本插足抢先的举动甚为不满，就以长沙北门外一带系“洼下”之地，易遭水淹为藉口，“极诋租界地段不便”，提出通商租界应包括城池在内，应许洋商进城开行设栈等更苛刻的要求^④，率先向湖南巡抚部院和长沙府署进行要挟，并联合美国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于是围绕“长沙通商租界”区域问题，爆发了一场英日之间的明争暗斗。

1904年5月，清政府外务部徇英、美等国总领事之请，电达湖南巡抚部院，飭由海关就近会商在长沙的英、美两国领事，迅速划定长沙口岸商埠区域地界，似有撇开日本，曲从英美要挟之意。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指示其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再次赴湘“商办界务”。为求早日达成协议，以防范英国的干涉和竞争，永泷领事到湘后即“言明租界内工程，巡捕，一切管理事宜，悉由我自行办理，日领事并允即在税司所定界址之内，分段租认，不再另索专界”^⑤得到日本方面的正式承诺，湖南关

①②《署湖南巡抚陆元鼎致外务部电》（1904、10、21），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第27页。

③《湘抚赵尔巽奏陈长沙开埠请拨经费折》（1904、5、10），载《湖南官报》第701号（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④《署湖南巡抚陆元鼎致外务部电》（1904、10、21），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第27页。

⑤湘抚赵尔巽奏陈长沙开埠请拨经费折》（1904年5月10日），载《湖南官报》第699号（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

监督朱延熙旋于同年6月间与日本领事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之铁路之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阳)河、西以湘江为界”^①。考虑到英美等国的要挟，该章程第十条又载明：“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角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②从通商界内的北门外沿河地段延长到非通商界区域的西门外沿河地段，概准洋商租用，湖南当局已经作了让步，但为了酬谢日本，湖南当局又在通商界内租地价格上，给了日本一笔不小的好处。税务司原议章程关于通商界内租地价格：一等地每亩每年租银二百元，二等地每亩每年租银一百五十元，三等地每亩每年租银一百二十元。交日本方面复议时，日方要求将此租地价格减至“一等地每亩一百五十元，二等一百元，三等八十元”。湖南当局“准照核减”^③。至租界章程正式签订之时，日方又迫使湖南当局将租价再减至“一等地每亩每年租银二十五元正，二等地每亩每年租银十五元正，三等地每亩每年租银十元正，并每年每亩应完钱粮二元，不分等第”^④，较之原议地价，更不知相差几何！这个租地价格，较之岳州开埠时之“上等每亩每年

①②《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1904, 6), 载《湖南官报》第701号,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③《长沙关监督朱则会驻汉置日本领事古田文》，载《湖南官报》第812号(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④《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第二条，载《湖南官报》第701号(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租银一百元，中等每亩每年租银八十元，下等每亩每年租银五十元，并每亩每年应完钱粮三元”的地价^①；亦相差甚远矣！

《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签订后，湖南巡抚部院即咨行英、美各国驻汉口领事，并通知驻长沙各国领事知照。谁知，对于这个租界范围之大“以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②的租界章程，英、美、德、法各国领事却串通一气，声明不予承认，弄得湖南地方当局骑虎难下。旋“迭经日领事函催”^③，加之六个月开埠的限期已到，湖南地方当局思挟日本以自重，乃于1904年7月1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如约开放了长沙商埠。

对此，英国领事即向湖南巡抚部院提出所谓“严重抗议”，英国公使亦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重申更易长沙通商租界地段的要求。外务部又慌忙致电湖南巡抚查询。

湖南地方当局认为这是由于“英商欲占城内”，节外生枝而引起的纠葛，且害怕如准洋商进城开行设栈，会出现“治城之内，华洋杂居，彼此齟齬，实无法可以保护，后患何可胜言”的困难局面，电复外务部，不同意更易长沙通商租界地段。复电中并有北门外一带“如果真不合用，何以日本允行？”“此次长沙开埠，系按照日本商约于六个月内开办……日本已定租界，该领事奉其政府允准，英国岂能独异”等语^④，抬出日本作挡箭牌。

①《岳州城陵租地章程》第2条，载《约章成案汇览》乙编，卷十上。“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②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88。

③《护理湖南巡抚张绍华致外务部电》（1904.6.28）中称：“长沙开关，按照商约应以批准后六个月开设，现已到期，迭经日领事函催，是以定下十八开关，已具奏”，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第16页。

④以上未加注引文，均见《署湖南巡抚陆元鼎致外务部电》，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第27页。

此时，日本领事从侵略者的共同利益出发，却突然改变态度，附和英、美领事主张，联衔照会湖南巡抚部院，胁迫承认长沙商埠应不分城内城外，听其自由侵占租地。随后，在没有获得湖南地方当局允准的情况下，各国洋商纷纷在租地界限以外，租地兴建洋行、堆栈和商业机构，展开了横蛮无理의侵占行动。^①

长沙开埠后，日本对湖南的渗透，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厉害。“翌年（1905年），日本遂于长沙设领事馆和日本邮局，并创办湖南汽船会社，有湘江、沅江两商轮行驶湘汉间；税关公吏、学堂教员，以聘用日本人为最多，甚至日本的小贩手贩亦纷至沓来，与我湖人争利”^②。据调查，至1908年，日本在长沙居住人口已达1,395人。另据记载，1911年外国设在长沙的洋行有22个，商人153人。其中，日本洋行11个，日本商人52人，也是以日本居多。

长沙开埠不久，日本又加紧在常德和湘潭两地开埠。常德和湘潭为湖南两个商品交流中心和交通要冲。据称：“滇黔百货输委中原，由沅水经流以达长江流域，无不以常德为停储改运之区；湘潭则西、南路煤、铁、纸烟行栈所集，河水宽深，擅商场之形势，远胜省垣”^③。长沙开埠后不久，白岩龙平根据《内港航行章程》，就已拟定了长沙至湘潭的航线。1905年春，日本船只已在湘潭停泊交易了。1905年2月16日，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澄，向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递交了《长沙（开埠）近况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常德即刻开港的必要性，请求政府早作准备。收到此报告后，日本政府即于4月初

① 本节参阅《湖南諮议局第一届报告书》卷二，《巡抚部院答复外交各案文》。

② 辜天佑：《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第1册，第35页。

③ 《端忠敏公奏稿》卷五，《湖抚端方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

向湖南地方当局提出常德、湘潭两地开埠的交涉，同时指示专事长江航运及湘江航运的大阪商船会社和湖南汽船会社具体行动。

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湖南巡抚端方不惟不筹抵制之策，反而以“英、日商人二年前已援照内港章程在该处租设码头、堆栈，与长沙以前情事相同，……终难闭拒”为由，于1905年5月5日奏请将常德、湘潭两地“自辟商场”^①，旋于同年8月8日获清政府允准“如所议行”^②。

常德开港前，鉴于“日本轮船业的现状及其营利业务的理由，自身派出从事此等测量，颇为困难”，非原又于同年10月提出“军民一体”侵入湖南的建议，主张藉“海军当局的本领”完成常德水路的调查^③。湖南汽船会社董事长加藤正义也向临时外务大臣桂太郎提出：“必须以帝国海军测量常德航路”，并指出此举“之意义，在于扩张海外事业，进一步伸张于清国之权利”^④。于是日本政府于1905年11月末派出军航隅田号，赴常德一带强行调查水路。由于该两地群众和爱国士绅的强烈反对，常德、湘潭当年没有立即开埠，但列强各国依据《内港航行章程》，仍可视该两地为“寄港地”运货搭客，实际与开埠无异。

（二）强行开辟湖南内河航线

湖南河网密布，大小水流共有4700多条，因此，水运对于

①《端忠敏公奏稿》卷五：《湘抚端方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

②《东华续录》光绪一百九十五卷。

③井原真澄：《常德水路调查报告》，《外务省文书》（明治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④加藤正义：《帝国海军于常德航路测量，义照》，《外务省文书》（明治三十八年十月三日）。

湖南人民无论是生活或生产都是非常重要的。岳州开埠以前，以水运谋生的人们主要往返于汉口、长沙、湘潭之间运输杂货。其先后虽有一些从事长江航运的外国轮船（主要为英国船）从湖南水域经过，但湖南素称发达的帆船运输业暂时还可与外国轮船相持。

1898年5月，清政府自行颁布《内港航行章程》，准许在口岸注册之华、洋轮船，按章程往来，专作内港贸易，外人又进而谋夺内河航行权。此后，列强各国为求在中国的内地省份获得更广阔的资本和商品市场，纷纷将其在长江干流上的航路扩展到长江的支流，而“长江支流中与汽船航路有关，且为日轮侵略的目标者，则为沅江及湘江两航路”^①。

日本的对外航运业，素有政府作后盾。最早侵入湖南内河的日本轮船公司是“大阪商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于1898年新辟上海至汉口和汉口至宜昌两条定期航线，始加入长江航运。其汉口至宜昌航线，有大汽船二只，“可使停船于新堤、岳州”等地载货搭客^②，势力遂侵及湖南。

就在大阪商船会社开始从事长江航运的这一年，两湖绅商也集银4万两，开设了两湖轮船公司，湘鄂间始通行汽船。“而日本踵至抢生意”。^③湖南初生的民营汽船行业，一开始就受到日本轮船公司的压迫，处境艰难。

1899年岳州开埠后不久，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即于该处租地设立营业机构，还“租借仓库建设敷地三〇〇，〇〇坪”^④。

①章勃：《日本对华之交通侵略》，第206页。

②近藤廉平《海运业》，载〔日〕福岛八十六编：《开国五十年史》（1909年版），第458页。

③《皮锡瑞日记》戊戌七月二十九日（1908，9，14）条。

④〔日〕国府犀东著，赵必振译：《最近扬子江之大势》第49页。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3.305平方公尺。

在该公司看来，“岳州敷地尤宜注意，该地虽为最近之开港，而占湖南之中枢”^①，此地“当洞庭长江之合流点，为将来湖南各地之交通运输重要之地点，可毋庸置疑”^②，大有以岳州为据点，向湖南内河全面扩展之势。

最积极主张开辟湘江航路的是日本“大东汽船合资会社”的发起人白岩龙平。1899年冬，白岩龙平到湖南考察，回去写了一篇《湖南视察的鄙见》。书中，介绍了湖南的自然、产品、贸易、城市等情况，认为湖南省是日本经济侵略的最适宜目标。“开发湖南并将其介绍给外国人一事，实属我国的义务”。^③1900年9月，白岩龙平正式报告日本外务大臣，建议日本政府乘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之机，向清政府提出“开长沙、湘潭及常德三埠为港口。其要旨为：根据已订条约，不开港，对该航路虽无任何妨碍，但将其开辟为港口时，将获得更大利益”^④。

1901年10月8日—11月7日，白岩龙平随日本邮船会社社长加藤正义一行，再次赴湘考察。事后他在报告中说：对湖南“实地考察之后，确为水路向导之良好，土地之富饶，德国人为开辟航路所做的准备等事所感动”。为了取得政府对建立湖南轮船公司的支持，白岩龙平还向日本递信大臣提交了申请书及预算书，并恳切希望“递信省将作为追加预算所提的草案，在本届议会上当可立案。在内阁会议通过上，除芳川大臣可表赞同外，势必得到外务、陆海两省的大力支持”^⑤。

①〔日〕国府犀东著，赵必振译：《最近扬子江之大势》第49页。

②同上，第18页。

③《近卫日记》（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第3卷，“明治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条。

④《近卫日记》第2卷，“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条。

⑤《近卫日记》第4卷，“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条。

与此同时，在华的日本各轮船公司也加紧了将其航路延长至湖南内河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先后有“日本人所经营之大东汽船会社已有于此处（按：指洞庭湖水路）开行汽船的计划，而邮船会社及商船会社亦竭力查勘湖南之水路，以为着手之端”^①。在此基础上，1902年2月1日，由澁泽荣一、安田善次郎、加藤正义、白岩龙平等日本实业家16人，发起成立湖南汽船会社。其宗旨“以开发商务、扩张势力，着此时争竞之先鞭，立将来瓜分之基础为目的”；“组织实业有力者创办支那中央之河川湖江各内港船舶回漕生业”^②。其会社章程之重要条款有“会社以汽船三艘以上，开通湖南航路，凡政府指定之各埠，其陆上租界，应得相当利益”；“会社得政府认可，定使用船舶之资金及构造发着与寄港之场所”；“会社得政府认可，定乘客及积荷之运货”；“资本金有不足者，由政府补偿，每年利益有不达六分者，亦由政府补给”^③。旋于同月7日，湖南汽船会社发起人又联名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湖南航路助成请愿书》，宣称湖南“以洞庭湖为中心，汇通省内的湘江、沅江之航路，为清国江湖航线中最有希望者。对于上述河流着手之迟早，关系到一般内河航权之得失。本公司先以汉口为基点，开辟通向长沙、湘潭之航线，再辟常德航线，逐渐扩及其他各线，以资占据内河航行权”^④。并要求政府发给航行补助金。1902年3月初，日本第十六届国会通过了湖南汽船会社的补助案，批准日本政府将湖南汽船会社新开汉口——湘潭航路，定为“补给航路”的命令，并“议定先将五年津贴发给该

①〔日〕林繁著、汪国屏译：《扬子江流域现势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5月再版本）第9页。

②③〔日〕远山长江、大谷是空：《推广支那内河航路议》，译文载《游学译编》第10册，“实业”栏，第35页。

④《近卫笃磨关系文书》第233页—238页。

公司，以补初办入息之不足，并拟每年补给公司津贴，限以三十五年为止，总计共须津贴费二百二十七千元”^①。

由湖南汽船会社启其端，日本朝野上下发出了一片向中国内河扩张航运业的叫嚣声。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议员土居通夫就在第十六届国会上提出了《扩张清国河湖航运业》的议案，叫嚣：“扶植我国之势力于清国内地，其最容易且有利益者即占有清国之河湖航运业是也。……以洞庭湖为中心，而湖、湘、沅以及江南江北运河通广东广西之东江、西江、北江，其最著者也。此等水路合计约五千余哩，即完全开设航业所需资本额不过一千万元可济，况开办之初就其中最有望而多利者预计，仅费二百万，夫何惮而不为耶！……故政府宜速设法扩张斯业，以据他国之上游”^②。

同年4月5日，日本《太阳报》又就湖南汽船会社成立一事发表评论：“湖南航路之开通，非我商工业在中国内地确立基础之第一步欤？”^③

1902年9月13日，湖南汽船会社东京总社正式成立，拥有资本金一百五十万元^④，日本天皇也以宫廷仓库总管名义成为该公司股东。湖南汽船会社计划第一步于1903年秋间，先开通“起点汉口，溯扬子江上流经岳州入洞庭湖，更溯湘水，经湖阴、长沙至湖南省南部都会（湘潭）、航路约三百二十五英里”^⑤。

①《日管湖南航路》，载《选报》第13期。（壬寅三月十一日）“外交纪事三”，第14页。

②见华厚纲《日本议会纪事本末》（下卷），第968—969页。

③《论设立湖南汽船公司》，载《外交报》第9期（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译报第一类”，第11—12页。

④亦有记勘，《日本对华之交通侵略》一书中则云：“湖南汽船会社……设立之初，资本金为二百五十万日元”（见该书，第218页），误。

⑤《论设立湖南汽船公司》，载《外交报》第9期（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译报第一类”中，第11页。

此外，“尚有湖南省西部都会，如汉口至常德，湖北省都会，如汉口至襄阳，将来亦拟开辟航路。凡聚散两湖地方之货物行旅，均可揽载，惟资本未足，稍缓举办”^①。“创办之始，拟租轮三艘，先行来往，其余陆续自行制造新船，除日本东京设立公司总局外，其分局设立在汉口^②。

湖南汽船会社正式成立后，即向大阪铁工所订造浅水轮两艘（即湘江丸、沅江丸），又派出得力干员赴湘鄂等地筹备开航事宜，并得到了两湖地方当局的支持。1902年11月初，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谓“日本议设两湘轮船公司，志在必成……如日商到湘招股，湘中绅富愿附股者，祈飭知洋务局无庸禁阻”^③。由于两湖地方当局的通融，到是年冬，湖南汽船会社在湘潭已开始营造码头（于翌年4月完工），在长沙交涉租用仓库及码头用地等事宜，也进展很顺利。

1903年春末夏初，又发生了“白岩龙平与湖南劣绅张祖同私约以六万金贱卖两湖公司”之事^④，这是日本轮船公司谋夺湖南已成之航运产业，加快实现其打通湖南航路计划的重要步骤。对于这笔私下交易，日本人抱有极大企望，认为“目下既于张祖同等饵以小利，私售与我，只须准备完善，即可于本年（1903年）秋间开航”^⑤。但两湖有识之士对此举则大为痛恨，群起抵制。如湖南留日学生办的《游学译编》杂志，曾载文指出：“张祖同将两湖公司轮船、码头卖与日商……（是）

①同上页⑥

②《日营湖南航路》，载《通报》第13期（壬寅三月十一日）“外交纪事三”，第14页。

③《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八十五，“电牋六十四”第5页。

④《各国在中国最近之经营》，载《国民日报》第71号（1903、10、16），

⑤〔日〕远山长江，大谷是空：《推广支那内河航路议》，载《游学译编》第10册“实业”栏，第36页。

图个人之私利而贻全体之大害，贪目前之苟得而忘百年之至计”，因为“湘汉航路者，吾湖南实业界之循环脉管也。人之一身有一循环脉管，为他物所窒碍者，必病且死。今割弃其循环脉管之一部售之外人，吾湖南实业界安得不病且死哉！”^①。在两湖士绅的再三吁请下，对这笔私下交易，“两湖督抚梗其议”^②，并饬由各自官府将两湖公司收回，充作官办，中止了张祖同与日商私相授受的非法活动。

收卖两湖轮船公司不成，日本人并不甘心。1903年夏秋间，为湖南汽船会社事，白岩龙平偕细井公学士三度入湘。这次，日本人看中了大劣绅叶德辉。有关此事的详情，曾留学湖南拜叶为师的日人松崎鹤雄这样说道：“白岩龙平物色了长沙的绅士，找到叶师劝服说，运输是富源开港的手段。叶师被劝服后，在官民之间四处奔走做平定工作，帮助解决了该公司建筑支店的场地，设置了码头船，使之公司日后不断繁荣昌盛。叶氏是该公司的恩人，白岩氏和叶师成了终身好友”^③。

当湖南汽船会社开辟汉口——湘潭航路之际，日本邮船会社也“委人在湖南一带测量航路”，并抢先于1903年9月间“行轮往来湘汉两埠”^④，开日本在湖南内港行轮之先声。

1904年春初，湖南汽船会社在长沙、湘潭等地设置的码头，趸船、库房等水陆设施均已完备，新添置的湘江丸、沅江丸两艘浅水轮也先后抵达湘河，即正式开始了汉口——湘潭航路的经营。

①《呜呼！湖南实业界》，载《游学译编》第7册，“实业”栏第77、78页。

②《各国在中国最近之经营》，载《国民日报》第71号（1903、10、16）。

③转引自〔日〕中村义：《日本和湖南省——自长沙开港起到抢米风潮》，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第2460页。

④《日本在湖南行轮先声》，载《国民日报》第51号（1903、9、26）。

至此，在湘河航境内，日本已先后有大阪商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和湖南汽船会社三公司的轮船行驶，大大加强了日本在长江航路上与英国竞争的能力。据1904年长沙海关报告：当年进出港船只，共为237艘次，轮船吨位104,031吨，其中英国船只为70艘次，52,400吨，占50.37%；日本船只为76艘次，共44,080吨，占42.37%；本国船只为91艘次，仅7,551吨，占7.26%。本年在湖南内港作定期航行的主要船只有9艘，其中英国船有4只，共4,321吨，日本船有3只，共2,200吨，本国船仅2只，共1,201吨^①。这些数字清楚表明，湘江航运业已为外人所垄断，中国自己的民族航运业，不过只能附外人之骥尾。

1907年3月25日，日本在我国从事长江航运的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湖南汽船会社和大东汽船会社四公司，又合并组成日清汽船会社，实行长江联运，以增强其与英国轮船公司竞争的能力和对长江流域的掠夺性轮船贸易。新组成的日清汽船会社实力雄厚，总资本达八百一十万元，每年并获日本政府航行补助金八十万元（限五年以内），拥有航路八条之多，即上海汉口线、汉口宜昌线、汉口湘潭线、汉口常德线、鄱阳湖线、大阪汉口线、上海广东线、宜昌重庆线。“日清会社之总所设日本之东京，上海、汉口设立分社，芜湖、九江、长沙、宜昌、重庆设立支社，镇江、南京、沙市、湘潭、常德、岳州、吴城设立代办所”^②。其在湘航业除上述营业机构外，并有轮船3只，趸船2只，舢板22只，总吨数为10,239吨。有码头2处，并在长沙占有土地2,898坪，在湘潭占地817坪。日清汽船会社“航行内港之轮船，以来往于常德、津市、衡

①〔日〕安井正太郎编，白岩龙平校阅：《湖南》，（博物馆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版），第58页，又参阅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一章，第40页。

②章勃：《日本对华之交通侵略》，第218页。

州、益阳、湘潭、湘阴、沅江等处为最多”^①。至1911年，该公司在湖南已拥有船只12艘，总吨数为25,678吨。不仅超过了英国太古、怡和两公司的船只总吨数(20,511吨)，而且使中国的民营航运业更加瞠乎其后，从而取得了湖南内河航运的霸权。

(三) 日本的在湘贸易

自岳州、长沙相继开放为商埠后，“外人争先恐后，络绎而来，凡湘中自有之利权，每为攘夺而莫可挽救”^②。此中，日本以其在湖南颇有势力的轮船公司和为数不少的洋行为基地，贪婪地向湖南各府厅州县伸出了巧取豪夺的吸盘，再一次扮演了列强之尖兵的角色。

洋货输入湘省，纱为大宗。兹将辛亥前十余年间，湖南历年进口之洋纱列表如下：^③

年份	长沙关		岳州关		合 计	
	担	值关平两	担	值关平两	担	关平两
1900			573	14,838	573	14,838
1901			1,119	33,804	1,119	33,804
1902			3,168	95,332	3,168	95,332
1903			9,017	262,029	9,017	262,029
1904	3,445	84,786	7,555	187,155	11,000	271,941
1905	4,434	115,913	3,034	78,745	7,468	194,658
1906	4,289	110,372	3,967	100,494	8,256	210,866
1907	7,793	194,975	12,707	318,097	20,500	513,072
1908	5,252	136,582	5,490	138,742	10,742	275,324
1909	12,794	323,152	8,650	203,178	21,444	526,330
1910	21,783	549,119	14,257	356,503	36,040	905,622
1911	32,696	825,862	20,141	505,584	52,837	1,331,446

①刘世超：《湖南海关之贸易》第一章，第46页。

②《陈绅文纬、李绅达等为开办电灯稟农工商部文》，载1909年3月8日《长沙日报》。

③此表据刘世超《湖南海关之贸易》第二章，第17页。

从上表观之，输入湘省之洋纱迭年激增，由1900年的573担，猛增到1911年的52,837担，十年之内净增91.2倍，平均每年输入洋纱5283.7担。

当时，日本在长沙经营花、纱、布匹之洋行主要有中岛、山本、东信、和井等洋行，资本雄厚，势力颇大，致使“输入湘省之棉纱，大都来自日本”^①。连民国初年工商部的调查也指出：“其洋纱之销路，各国不同，如日本纱于长江一带、大河以北销路最广，其在湘鄂等处，自甲午以后，尤具莫大之势力”^②。为了说明日本纱在湖南进口洋纱中比重之大，我们再以岳州关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1900年—1904年岳州关进口洋纱国别表^③；

年份	进口总数(担)	其 英属印度 纱(担)	中 日本纱 (担)	备 注
1900	573	115	458	本年印纱及日纱数字，据573担总数“内约八成系日本国棉纱”折算
1901	1,119	741	378	
1902	3,168	2,277	891	
1903	9,017	2,694	6,368	
1904	7,555	1,638	5,917	本年另外从长沙关进口洋纱 3445担

由上表可知，在长沙开埠以前，日本输入湖南之棉纱，巴夺英、印固有之地位，而居上乘。下面我们再以湘潭、常德和

①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二章，第18页。

②《工商部调查纺织业报告书》，载《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一年第一号（1913、10、1发行）“报告”栏，第5页。

③此表据岳州关税务司1900—1904历年的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提供的数字制成。

衡州为例，看日本棉纱的销售情况。

在湘潭，据1905年3月30日，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井源真澄报告：“湘潭的棉纱，从前以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以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①。

常德与湘潭的情况相去不远，也陷入了“全归属日本棉纱势力范围”的状况^②。据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派员调查，以前“输入当地（常德）之棉纱，有上海产、印度产、日本产、英国产的斯太产之四种，每年大约一万数千捆，此外更有由此以销于贵州、四川者，亦有五千捆。目前上海、印度两处棉纱几乎毫无输入，而日本棉纱销流极畅。……即谓近三年以来，当地所消耗系日本棉纱，亦无不可”^③。

衡州的情况与湘潭、常德差不多，也成了日本棉纱的畅销场。据日本驻长沙领事1906年赴衡州调查：“棉纱每年输入衡州者，若以日本货为最多，十年以来，殆为日货所独占”^④。

若就棉纱的种类而言，湖南所需皆为粗纱，以十六支纱为最多。日本输入湘省之棉纱亦多为粗纱，“四十支以上细纱

①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下），第254页，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97页。

②〔日〕长沙领事高洲太助：《常德视察报告书》，《外务省文书》（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③杨志洵：《常德概况》，载《商务官报》戊申第28期（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发行）“参考资料”栏，第28—29页。

④汪有龄译：《萍乡、衡州商工业视察记》，载《商务官报》丙午第13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发行）“译录”栏，第15页。

者，不过占其金额十分之一，其余多系三十二支以迄十六支”粗纱^①。下面这份日本输入常德棉纱之种类表^②，就很说明了这个问题。

支数	公 司 名	牌 名	支数	公 司 名	牌 名
16	振津公司	立马	16	堺公司	双麻
16	大阪公司	金象	20	九州公司	三环
16	仓敷公司	三马	20	岸和田公司	赤戎
16	福岛公司	美人	32	堺公司	双鱼
16	备前公司	伏龙	32	钟渊公司	蓝鱼

据清政府农工商部的调查，在上表所列日本牌号的棉纱中，“日本纱之立马、美人、三环、赤戎、双麻等牌号，尤为本地（常德）所喜^③。据说，当日输入常德一地的日本粗纱“总额年约一万二千捆，约值一二〇万两”^④。

控制了湘潭、常德和衡州几大市场圈之事，表明湖南全省都属于日本棉纱销售的势力范围。

洋布，亦为湖南历年进口之大宗。兹将1900年—1911年，湖南海关进口洋布列表如下：

①《湖南民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缘起》，载《实业丛报》第1期“杂纂”栏，第5页。

②《常德棉花纱布情形表计》，载《实业丛报》第5期“杂纂”栏，第3—4页。

③杨志钧《常德概况》载《商务官报》戊申第28期，“参考资料”栏，第29页。

④《常德棉花纱布情形表记》，载《实业丛报》第6期“杂纂”栏，第4页。

年份	进 口 价 值 长 沙	岳 州	(关平两) 合 计
1900		407	407
1901		70,104	70,104
1902		119,785	119,785
1903		840,112	840,112
1904	794,938	437,200	1,232,138
1905	1,236,682	43,664	1,280,346
1906	926,194	32,750	958,944
1907	2,076,924	84,594	2,161,518
1908	2,082,103	142,683	2,224,786
1909	2,471,454	194,322	2,665,776
1910	2,151,961	212,480	2,364,441
1911	2,879,162	409,090	3,288,252

(此表见刘世超：《湖南海关之贸易》第二章，第13页。)

从上述表可知，湖南进口洋布之数量，也是逐年增加。1900年时，进口洋布总值尚只407关平两，为数甚少，但到1911年，进口洋布总值就激增到3,288,252关平两，十年之内，净增加8,078倍，平均每年进口洋布总值达328,825.2关平两。

湖南进口洋布，以漂白布、染色布及印花布为最多。据调查“漂白粗布即普通所称之竹布，百分之七十以上系由日本及台湾输入，由英国及印度输入者极少。……羽纱，分染色及印花二种，输入湖南者，几全部为日货。印花细软洋纱即普遍所称洋纱及花标布，价值较昂者为英货，较廉者为日货，湖南进口以日货为多。至印花粗细斜纹布，俗称丁綢，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日本及台湾……。横工布、细哔叽几全为日货，即俗称直贡呢及棉哔叽者也。本色市粗布，即洋布，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货。绒布、棉法布，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日货。可知湘省今

日已完全沦为日本棉布市场”^①。

除了洋布和洋纱以外，日本向湖南倾销较多的商品还有白糖、纸张和海产品。据湖南海关册报，辛亥前十年间，输入湘省之糖，最少年份为一千六百余担，最多年份高达十余万担，“多由爪哇及日本进口”^②。仅常德一地，每年就输入日本糖约“四千袋”^③。湖南自1901年始有洋纸之输入，其时价值尚不过一百余关平两，至1909年，进口洋纸价值则增至三万三千余关平两，至民国元年，进口洋纸价值更增至十二万余关平两。进口洋纸中，尤以印刷用纸为最多，“平均每年输入约二万余担，占洋纸输入额百分之九十以上”^④，而此项进口印刷用纸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为日货”^⑤。海产品之输入湖南，主要为海带和海参。“海带类即包括海带、海藻及石花菜，百分之九十系由日本及台湾输入……海参有黑白两种，黑者来自朝鲜及日本内地，白者来自南洋，近年输入者，黑海参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固全为日货也”^⑥。

此外，来自日本的杂货商品在湖南也颇有市场。湖南杂货贸易，向以长沙为消费中心，然后销散于各府厅州县及乡村集镇。据说长沙“杂货小卖业之盛，长江一带，除上海、汉口外，无出其右者”。据日本农商务省1910年春初派员调查，当时日本在长沙开设专营杂货输入及批发业务的洋行，主要有日丰、小岑、盐川、大石、三合等数家。自日本杂货输入长沙

①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二章，第15—16页。

②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二章，第25、26页。

③杨志洵：《常德概况》，载《商务官报》戊申第28期，“参考资料”栏，第29页。

④同①，第二章，第49页。

⑤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二章，第49页。

⑥同①，第43页。

后，即由上述日本洋行“更批发于各府县商人及长沙附近之从事小卖者又约二三百家”，以致“长沙市内数百小卖店中，陈列日本之杂货”，约有百种以上。其中尤以洋伞、洋碱、香水、玩具、绒巾、镜子、牙刷、洋袜，夏洋汗褂、被面布、帽子、洋灯及洋灯罩、玻璃器等十数种东洋杂货“较有声价”^①。又如常德一地“外国杂货……各国皆有输入，惟西洋来货，品质较好，价值亦昂，中流以下遂多用日本之货”。^②日本杂货不仅充斥长沙、常德等市面，“至于田舍地方，对于外国杂货无判断力，以其（日本杂货）值斋，殊爱用之”，销路也很广^③。

与此同时，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日本还从湖南劫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

日本从湖南输出的大宗商品是谷米。早在1905年中日追加通商航海条约谈判时，日本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就达成了向日本特殊出口湖南谷米的协议。同时，内田公使还向湖南籍军机大臣瞿鸿禨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瞿也同意向日本出口湖南谷米，并准备用输出大米的收入作为修筑粤汉铁路的经费。这样，湖南就“以特别条约，年输出日本三十万担”谷米^④约占日本国每年进口大米500万担总数的6%。当时装运日本棉纱至湖南的日本船队，在归途中“大都从湘潭向

①以上未加注引文，均见〔日〕太田外世雄：《湖南工商业》，载《实业丛报》第4期“译丛”栏，第24、27页。

②杨志洵：《常德概况》，载《商务官报》戊申第28期，“参考资料”栏，第30页。

③〔日〕太田外世雄：《湖南工商业》，载《实业丛报》4期“译丛”栏，第24页。

④同③第2期，“译丛”栏，第9页。

上海输出米谷，以求收支相抵，减少拨兑”^①。当日清汽船公司成立，实行长江联运以后，日本抢购的湖南谷米，不再迂回从上海输出，而是把购来的谷米先集中到长沙，运到汉口，然后装在大阪商船公司的轮船上，从汉口直运往日本的大阪。因此，每逢秋季，新谷登场，长沙至汉口的水路上，“英日汽船之运米出口，颇形忙迫”^②。由于湖南谷米价值较日本低廉，日商每年可从抢购湘米中获得一笔巨利。

湖南的棉花在辛亥以前产量不高，几全为本省销用，很少输出。据海关册报，1903年岳州关出口棉花410担，1904年长沙关出口棉花879担，“大半系运往东洋，制成洋纱，仍米本省销售”^③。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日本认为那种“以花出，以纱入，运金关税，种种虚糜，不若就地购花售纱之为事半功倍”^④，乃进而图谋在湘设立纱厂。于是，在1911年，日本之“钟渊、内外、日本三大纱厂，皆有设分厂于常德之议，跃跃欲试”^⑤。

湖南的矿业，自戊戌变法以来，渐次开发。但因冶炼工业不发达，各主要矿产品，大部分销售于海外。就这些矿产品的出口途径而言，“由洋商就地收买者占出口总值的五分之四，由华商自己直接输出者不过五分之一”^⑥，其中“多由日本收

①日本外务省编：《清国事情》（下），第255页，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辑，第498页。

②章乃炜：《汉口商务之调查》，载《商务官报》，戊申第28期，“参考资料”栏第23页。

③《光绪三十年长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189页。

④、⑤《湖南民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缘起》，载《实业界报》第1页“杂纂”栏，第1页。

⑥张人价：《湖南之矿业》（湖南湘阴印刷公司1934年8月初版本）第90页。

买，转销欧美诸国”^①。外商不仅就地压价收购矿砂，而且还纷纷来湘索办矿产。如“光绪二十七、八年（1901—1902年）间，英、法、日本各国商人纷纷赴湘，索办矿产，湘中奸商地痞，以矿山赴汉、沪一带私卖抵押与洋行者数千契”^②。对此，湖南巡抚俞廉三在1903年2月20日一份奏折中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近来东西各国矿师来湘考验，项背相望，挟有巨资，往往纠合公司，争思染指；内而奸民私立合同，擅售山契，纷纷勾串，防不胜防”^③。

为了抵制列强各国对湖南矿产的侵夺，1903年冬，经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成立了“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该公司“章程初经刊布，德、英、美、日各国公使纷向外务部争言湖南巡抚所颁矿章，违背商约，请速作废，来往照会多次，要挟百端，风潮大作”^④。其中，尤以日本的要挟为最甚。1904年2月22日，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照会湖南巡抚部院称：“本领事按照中外新旧商约及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贵国外务部奏定筹办矿务章程，各国商人具有或承办或合办贵国各省矿务之权等，前经通行各省，一体遵办在案。本领事顷阅贵省矿务总公司所颁《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似有包揽全省办矿之嫌，于开浚利源、不分畛域之本旨及各国商人既得之权，稍有妨碍矣。相应备文声明，该公司章程者，不得羁束各国商人开办矿务既得之权也”^⑤。当收到湖南巡抚的驳拒照复之后，日领事永泷又于3月28日再次照会湖南巡抚部院，“辨驳矿务章

①《长沙总商会呈复省长调查上年各业盈亏报告书》，载《实业杂志》第13期，“调查报告”栏第20页。

②《中农工商部接管湖南矿政调查局呈》（1908年），载蒋德均，《求实斋类稿》卷六，第6页。

③俞廉三《奏请设法维持矿利折》，载《湖南官报》第308号。

④《移复湖南咨议局议案》，载蒋德均，《求实斋类稿》卷七，第5页。

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矿务档》（四），第2402页。

”。在照会中，日领事特别指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章程》之第3、4、38、39、40、44、45、48等条，皆有“包揽全省矿权之嫌”或“妨碍各国商人既得权利之处”，仍无理要求“将该矿章即行作废”^①。当遭到湖南巡抚的再次驳拒之后，日本又转而勾结湘中劣绅，重施其盗卖湘矿的故伎。同年4月29日，上海《警钟日报》就以《湖南危矣》为题，揭露了一桩日人小田氏找湘人龙兆霖“签押”，“以购湘矿事”的消息。报导中并引小田氏语，称该出售湘矿之合同，“龙兆霖不过署名第一耳，其次张祖同、孔宪敦、王先谦、叶德辉共五人等，湖南全省之大绅皆在”。看来这是一桩大规模的拍卖活动。就此，《警钟日报》发表评论说：“由是观之，湖南全省之土地、全省之性命财产，悉由龙、张四五劣绅之手，尽数卖与外人”。^②

（四）日本对湖南经济渗透的危害与影响

日本对湖南的经济侵略，首先受到直接打击的是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湖南的手工纺织业向称发达，素以本地所产之棉花，纺纱织布，销售省内，输出省外。自洋纱大量进口以后，纺织业直接采用洋纱织布，不用土产棉花纺纱了，以致湖南“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③。其间，不仅棉农受损，且因“洋纱鸣于市，而篝灯夜绩者无闻”^④，又使无数操纺纱为业的农村妇女失去生计，束手待

①日领事辨驳湖南矿务章程之照会全文，见台湾：《矿务档》（四），第245—246页。

②此处未加注引文，均见《湖南危矣》，载《警钟日报》第64号（1904年4月29日）。

③《城陵矶近讯》，载《湖南官报》第409号（光绪癸卯年五月二十六日）。

④《湖南民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缘起》，载《实业丛报》第1期“杂纂”栏，第2页。

毙。洋纱既夺土纱之销路，还使司机杼者亦不得不用洋纱，如属于日本销纱范围之“岳、常、澧等处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①。其结果，不仅土布之“原料既昂于前”^②，且“布的原料乃展转仰给于人”^③，其损失又无法计算。洋纱之外，还有大量洋布同时阑入，致使湖南“土布销行亦滞”^④，不仅再也无法远销外省，而且连本省土布市场亦为洋布取代，又使大批手工业机户因之破产失业。如《巴陵县志》载：“巴陵之产，有名者布。……自外洋贸内地，彼布盛行，都布（该县一都、二都、三都所产之布称都布）亦因之滞销……巴陵之利源日就于涸矣”^⑤。统而言之，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湖南“下等社会劳动之生殖（生产力）益穷”^⑥，土纺织业纷纷破产，大批手工业者失去谋生手段，被抛入无产者的行列。

其次，湖南旧式的帆船运输业也受到日本轮船公司的致命打击。湖南旧式的帆船运输业素称发达，湖南与汉口之间的贸易历来是利用帆船运输，据1901年外人统计，从事湘汉间帆船运输的“湖南民船约有一二万之谱”^⑦自岳州开埠。日本轮船往来湘汉间，逐渐将从事湘汉间运输的湖南帆船逐入内河；自长沙开埠，日本轮船公司又增辟内港航路，进而又从内河中排

①《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96页。

②同①

③《常德棉花纱布情形表记》，载《实业丛报》第6期“杂纂”栏，第11页。

④《湖南南民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德起》，载《实业丛报》第1期，“杂纂”栏，第2页。

⑤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34页。

⑥杨毓麟：《新湖南》，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第72页。

⑦〔美〕韩森：《光绪二十七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81页。

除出成千上万只帆船。随着日本轮船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广，“行客货商均以附轮为便，江船及陆路小车无人价廉”^①，结果出现“轮船夺利多”、“小民失生理”^②，“不独驾舟负纤者难于觅食，即在操奇计赢者亦无以资生”^③的悲惨局面，又使成千上万从事水陆交通运输的劳动者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这一时期，受到日本经济入侵打击的还有造纸业和制茶业。湖南印刷多用连史纸。自日本木浆制造之洋纸输入，印刷所用皆改洋纸，致使资金不足、设备不善之湖南“土纸工业，因之破产，利权外溢”^④。湖南茶叶，历史悠久，历以汉口为输出地。汉口茶市“除砖茶由汉口制出外，其他汉口茶之声价，全赖湖南有以维持之”^⑤。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由于“日本及印度茶渐次发达，与之竞争”^⑥，湖南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锐减。致使“办茶之富商，束手无策；种茶之山户，生计将穷”^⑦，造成大量的茶农和茶工的破产失业。

至于日本对湖南谷米的大量抢购，更无异于对湖南乡村的直接掠夺，使农民更陷入求生不得的困境。湖南农村的封建地租剥削本来就很重。庚子之后，湖南分摊了赔款七十万两，还有所谓地方赔款。如衡州一地，就有三十八万六千两的教案赔款。此外，从1905年起，湖南次第举办所谓“新政”，每年又增加“赎路费四五十万两，解京练兵银二十万两，添练常备新

①《卞制军奏议》第11卷，第71页。

②易顺鼎：《自沅上至江上杂诗》，载琴志楼编：《年诗录》第18卷。

③《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二十八”，第1038页。

④刘世超：《湖南之海关贸易》第二章，第47页。

⑤日本东京支那调查会：《湖南茶业报告书》，载《实业丛报》第3期“商业部”第21页。

⑥同⑤第22页。

⑦吴大澂：《奏湘茶亏折请设局督销折》，见顾廷龙编：《吴大澂先生年谱》第220页。

军薪饷杂支四十余万两，又出洋游学及京师本省各学堂经费银四十余万两，此外，巡警经费约需银十余万两，添设巡警、劝业各道、调查、諮议各局、筹办审判、自治各处一切开支，又需十余万两”^①。这一笔笔开销，最后大多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当时湖南农村“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任七八捐；有关税、有厘金、有统捐、有铺捐、有落地税、有销场税，一物经六七税”^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兼之谷米出口和天灾打击，更造成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的局面，又使大批农民背井离乡，纷纷流入城市。同时，由于“米之出境者过多，米价渐贵”城市贫民的生活更苦不堪言。1910年的湖南长沙抢米风潮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官府“不顾民食，纵米出洋”造成“米价愈贵”，主要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搜括湖南谷米的结果^③。

日本经济对湖南的大举渗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从通商大埠流入穷乡僻壤，破坏了湖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一批又一批的城乡手工业工人，旧时水陆交通运输劳动者和农民纷纷破产失业，被抛入无产者的行列，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在外国轮船所经之处，以及外国商品影响所及的地区，又出现了一部分农民转而从事以出售为主的商业性农业和城乡商品市场规模扩大、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情况。这为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是日本对湖南的经济渗透，不是为了给湖南人民带来发展资本主义的“福音”，而是为了把湖南变成日本商品倾销的市场和原料供应的市场。这样，又刺激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

①北京《帝国日报》1910年11月15日。

②《御史胡思敬奏折》，载《宣统政纪》卷11，第25页。

③《湖南省城饥民焚巡抚衙门及教监学堂》，《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五期。

迫的夹缝中挣扎崛起的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以前，就组织了诸如轮船公司、矿业公司、铁路公司、瓷业公司、电灯公司、纺织公司等实业团体和各种行业的商会组织，展开过各种形式的抵制外货，挽回利权（如航权、矿权、路权等）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一切，汇入近代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所使然！

我们所知道的刘廷芳先生

蓝肇祺 朱曙永

1930年初，肇祺开始随刘廷芳先生参与湖南国货陈列馆的筹建，并任该馆庶务。1936年，刘调任资源委员会锑业管理处长，蓝又随入该处工作。1942年刘出长燃料管理处，复任蓝为主任秘书、分处主任。其时，曙永亦被邀入该处任稽核、专员及分处课长、秘书等职。我们二人先后从刘先生工作有年。近年刘先生多次回国，肇祺均参加联系接待，乃各就闻见，写成此文。

刘廷芳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梁焕奎兄弟在湖南经营华昌锑业公司时，因锑砂运销美国，需要翻译人员，刘经面试录取。1926年回国后，曾一度在熊希龄主办的平民大学任英语教师，后在长沙私立大麓中学任商科主任。1929年，何健以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得任湖南省主席，余籍传出任建设厅长，成立建设委员会以延揽人才，刘经湖南大学名教授任凯南推荐，得任建设委员，最初主管湖南模范劝工场。九·一八以后，日货排山倒海般地倾入中国内地，强弱悬殊，外交困难，又不能明令排斥。国民政府工商部乃令各省设立国货陈列馆，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何、余以这项任务与刘所任劝工场业务相近，遂派刘负责筹备。刘当仁不让，于1930年1月成立筹备处，选择今中山路旧贡院（前清乡试考场）地址为建馆地点，耗洋24万元，历时3年，于1934年落成开业。该馆楼高7层，临街排列16根圆柱，外形雄伟，气势堂皇。主楼3层，遍征全国各大城市名牌国货和本省特产，分类陈列，底层

辟为商场，招商承租营业，一律限售国货。事属创举，轰动全城，省内外不少人赶来参观。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湘视察，就曾在该馆流连。宋美龄听不懂长沙话，刘在旁用英语为之向导介绍。蒋宋听刘谈及创办意图及各项设施，非常满意，深为嘉许，随后即任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

刘因缘时会，款款进言，说他办了国货陈列馆，还要开国货展览会，以激发国民爱国热忱。然后便谈到他在美国推销我国锑矿砂情况，表示要改变国家矿业濒于衰败的状况。刘说：我国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有色金属在全世界占有极为重要之地位。湖南锑矿储藏量占全世界85%，江西、湖南的钨占全世界60%，云南、广西之锡占全世界之一半。这些资源均未得到充分利用，根本原因是矿业管理久已成为无政府状态，因而洋商得以操纵，以致矿山停采，炼厂停炉，商人破产，工人失业。他正式提出矿业国有计划，并说此事非如此不为功，然阻力太大。蒋听了连连点头，表示极为赞赏，最后蒋说：“你去做，我作你的后盾。”随后，蒋召刘赴汉，并亲笔致书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嘱介刘与钱昌照切实讨论，并郑重指示：“此事志在速办。”接着，资源委员会设矿业处，制定特种矿产品管制方案，于1936年1月在长沙沙河街成立锑业管理处，又设锡业管理处于桂林，钨业管理处于江西大庾，汞业管理处于湖南晃县，并在其他矿品产地筹设分处，进行全面管理。刘得任第一任锑业管理处处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国争购军需原料，我国所产钨、锑、锡等，均成为国际市场的热门货，由产地空运出国，换取军火物资，平衡外汇赤字，大见实效，刘亦益为官方所倚异，被任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1942年，在重庆出任经济部燃料管理处长，掌握全国煤炭燃料，其后盟国建议设立战时生产局，翁文灏以经济部长兼任局长，美国客卿某任副局长，燃料

管理处更名为煤焦管理处，隶战时生产局，刘仍蝉联处长职务。胜利复员后，燃管处撤销，刘改任汉口工商管理处长和桂林有色金属管理处长，1949年因病赴美就医，加入美籍。近几年来，刘老以80多岁高龄，先后多次回国，其子国荣、国正亦回国七次为引进外资，加强经济联系效力。刘氏父子所为，深得中央及湖南省、市有关部门高度赞赏。

刘老1980年初次回国，看到祖国一片大好形势，深为感动，马上挂通电话，命其三子国荣和另一位美籍华人吕高辉博士，迅即回国观光，洽谈贸易事宜。国荣到长，刘老领其游览市区，随处指点，告以30年来之大变化，说明共产党改造社会、除旧布新之功。一行回美以后，于1981年创建廷兴公司，专为湖南矿产和土特产输美服务。公司由刘老父子分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几年来，廷兴公司除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所承接之贸易业务，因不详悉内情，无从计算外，单是湖南方面成交的业务，就我们所知就有：一、为美商加工锆矿砂；二、中国瓷器成批出口；三、九龙服装店承接来料加工；四、湖南绸厂产品出口等。其中经济效益较大的是，与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达成的加工绸料服装出口，仅此一项，信托公司就获利220万美元，为国家创外汇400余万美元，且打开了我省服装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加强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刘老在美籍华人中筹措美金10万元，于1983年邀请湖南省花鼓戏剧团赴美演出。该团在美演出期间，受到当地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六场演出，场场暴满，观众和报刊、广播大为赞扬，对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

1982年至1986年间，我省外经委、外贸专业公司、省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访问美国，都受到美国朝野的欢迎。1984年刘正省长和1986年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佟英先后访美，

刘老父子均邀约当地华侨和彼邦知名人士设宴款待，为沟通经济、联络友谊、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去年，刘廷芳先生在纽约《中报》论坛版发表题为《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文章，“叙述平息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紧接着，李默庵先生也发表《我也谈谈两广事变的内幕和经过》一文。刘文着重谈他卸命进行政治活动的情形，李文则重点叙述当时重兵入粤所起的作用。军事与政治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两先生各就其所亲历追忆成文，求真存实，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史料。刘先生虽身在国外，却心系祖国，实在令人感佩，故志之不忘。

（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供稿）

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

——记两广事变未尝公开的一段内幕

刘 廷 芳

在人生的长河里，每个人总是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时光流逝，往事纷纭，不少事已成为过眼烟云，记忆不清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那虽然是60年前的事了，但至今总是难以忘怀，它仿佛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湖南故乡初晤蒋氏伉俪

那是1931年初(民国二十年)的春天，蒋介石先生到湖南视察，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键家里。一天傍晚，蒋先生与何键先生在阳台上观赏夜景，蒋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说：“那是什么地方？”

何先生答道：“是湖南省银行。”

蒋先生听了颌首笑问：“你们湖南省以前有银行吗？”

何先生答：“没有。”

蒋先生一听此言，兴致甚浓地问：“这个银行是谁办的？”

何先生说：“是个留美学生刘廷芳创办的。”

蒋先生转身又指着另一座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本文1986年3月于美国《中报》月刊上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反响，上海、北京、台湾的一些报刊曾予转载，我会主办的《湖南文史通讯》亦于1986年第二期转载了此文。现遵照作者意见，在《湖南文史资料》上再次刊出。

何先生说：“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

“什么？”蒋先生加重语气地说：“湖南还有个国货陈列馆？是省办的吗？”

“是，”何先生点点头，“那也刘廷芳主持创办的。”

“呀！”蒋先生望着那两座建筑物很有些感触。

第二天，蒋先生便派了他的副官通知我去见他。没想到我一到何先生家，何先生的脸色都变了。因为蒋先生住在他家里，他时刻都要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唯恐有所疏忽。当我告诉何先生是蒋先生叫我来见他时，何先生就立即陪同我进了内厅。

蒋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办这两件事。我告诉他：我是1926年（民国十五年）自美返国后，在鲁涤平任省政府主席时主持湖南省建设委员会至今。后来，亲眼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冲击国内市场，而湖南的财政金融管理又十分混乱，经济凋敝衰败，百姓怨声载道。湖南省银行建立之后，扭转金融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市场经济得以调整。国货陈列馆旨在长中国人的志气，扬中国的国威。馆内陈列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数量达几十万件之多，这对抵制日货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外，我还准备筹办一个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一起共有三个“国”字，有人就说我刘廷芳是“三国主义”，可有的人却讥讽我完全是空谈。

蒋老先生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他见我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便紧接着问道：“你做了这三件事情之后，还有哪些打算呢？”我说：“我非常想改变国家矿产濒于衰败的状况，我们国家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有色金属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湖南的锑的储藏量占全世界的85%，江西等省的钨砂占全世界的60%，云南的锡占全世界一半。可是这些资源都未得到充分利用，矿业管理一盘散沙，任洋商操纵以至矿山停采、炼

厂停炉、工人失业、经济破产。我主张矿业国有，但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旧势力太大，无法达到目的。在此之前，孔祥熙、宋子文等先生都曾力图挽救这种局面，但均未成功。”

蒋老先生听了我的话连连点头，我的话引起蒋老先生极大注意，说：“你去做，我作你的后盾。”

第二天，我邀请蒋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到我家看兰花，因为我家兰花品种是浏阳的素心兰，清馨高雅（当时孙中山总理陵园、蒋介石先生家里和宋庆龄先生家里都放有我送的素心兰）。看完兰花后，就邀请他们聚餐。席间，谈到湖南矿业的壮大发展，蒋先生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当时我们曾合拍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矿业救国获蒋氏器重

约两星期后，我又接到蒋先生从汉口打来的电报，电文大意是：“立即来汉口，面谈一切。”我遵蒋先生之嘱到了汉口，他下令将全国的锑、钨、锡管理起来（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矿业的统一管理）。蒋先生还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将我介绍给蒋先生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要我亲自交给他。

由于蒋介石先生以及何键先生的竭力支持，在我与钱昌照先生奋力合作下，经过多方努力，于是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开始了在中国的管理。这个机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考虑到保密的原因，对外的名称是“三元巷二号密”。后来改名为参谋本部资源委员会，为了实际工作方便，又改为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从此，全国的工矿事业机构不断成立，终于首先使湖南的矿业生产有了很大改观。而那些土豪劣绅顽固势力却指责我把湖南的银山（锡矿山）阴谋献给中央，甚至还有人对我进行诽谤恐吓。

面对这一切压力，我毫不气馁，义无反顾，继续坚持走自

己的道路，使矿业收益猛增，当时建筑湘桂铁路的大部分费用就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矿业收入。

正因为我在湖南办成了几件事，我同蒋先生所谈的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和国际贸易处三项事业全部办成功，有人说我“三国主义”是大话是空谈，但是早已成为事实了。因此，蒋先生认为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样也就引出了历史上一件有价值而又鲜为人知的事。

两广军头密谋兵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国家局势很不稳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就在这年夏天，广西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黄旭初各位先生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何键先生相晤。一天中午，何先生请李品仙先生到长沙“蓉园”吃饭。当时何先生只邀我一人作陪。席上只有四人：何键先生、李品仙先生及其秘书和我。李品仙先生一边吃一边高谈阔论，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接着，李品仙先生便含糊其辞地向何先生提出了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刻，何先生未作表示，他迅速地看我一眼，我深知其意，便从容地向李品仙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与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我敢断定凡是中国人，全国无论男女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李品仙先生一听，猝不及防，无以对答。何先生为了缓和空气，便说：“李先生一路辛苦，早点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于是，何键先生与我将李先生送到招待所，接着，何先生邀我

立即前往他家。何先生说：“现在情势很紧张，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对抗。”何先生又说：“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趋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当时两广军队有十多万，中央军有陈辞修先生与胡宗南先生等部队驻守于岳阳等地，惟人数不多，寡不敌众。如两广军头游说成功，获何先生首肯，使两广得以假道湖南进军武汉，则势将造成分裂，情势将完全改观。

次日我又应何先生邀约，前往商谈。何先生意欲派我前往南京见蒋先生，请蒋先生设法制止两广军队进军武汉发动兵变。何先生告诉我，前几天他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前往南京，过了七天，易书竹先生没有一字报告何先生，因为蒋先生不见他。所以何先生对我说：“是否请廷芳兄前往南京，面见蒋先生，”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那时，我完全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我绝对地不忍任何内战再给人民带来痛苦。何键先生与我仔细磋商，反复权衡到深夜。最后他说：“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因为，一、你与蒋先生相识，他对你印象很深；二、蒋先生了解你的为人，并以为你很有作为，你的意见蒋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说，你是能面见蒋先生而又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唯一人选，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属啊！蒋先生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信不就称赞过你吗？”

南京谒蒋氏紧急献议

当下，何先生便派了专车立刻送我到汉口。由于走的匆忙，忘了带钱，便向铈、钨、锡管理机构高级顾问王宠佑博士拿了一笔钱，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直飞南京。在飞机上，我直

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后来翁文灏先生奉蒋先生之命在码头上接我。我与钱昌照先生交往已久，认为他有远见，所以先去看他，并简略地同他作了交谈。然后，我就再回到行政院立即与翁文灏先生一起去军事委员会。当时，蒋先生的客人很多，听说他在隔壁房间里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各位先生商量事情。一分钟不到，蒋先生就从隔壁一个房间来到小书房。我首先向蒋先生报告了湖南当时紧张局势，以及何键先生派我前往南京的目的，也就是请求蒋先生设法遏止两广军变的危机，避免国家在亟需团结抗日的时刻陷入分裂。我还告诉蒋先生：“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不会朝西走的，他绝对服从您的领导。”我又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20年、30年后出一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地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蒋氏密函化解危机

蒋先生连忙说：“不会，不会，不会。”并且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嘱我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浚两位先生。

这次去汉口，是蒋先生亲自吩咐侍从黎秘书派“美龄号”机送我去的（当时，俞国华秘书也在蒋先生的侍从室做事）。我始终不知蒋先生的密函里写些什么，但是当我将信交给杨永泰先生，从汉口返回长沙时，已发现两广军队在撤兵了。曾几何时，两广军队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向湖北进军，而此时却懊丧地向西撤退了。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部队来的如此之快，他们惊呼：“神兵来了。”蒋先生之所以果断出兵，正是听了我的报告才作出的决策。

我的报告究竟有何玄机？原来蒋先生对何先生一直不放心，怕他在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军头。我此行主要成果就是说服了蒋先生：何先生是忠于他的。因此他才放心采取行动，把一场内战危机消弭于无形。

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

事后，我专程到汉口与何键先生专门研究两广事变之往事，我同何键先生根据史迹的引证，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足以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因为如果让两广军队分裂阴谋得逞，那么他们就会在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从而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那么整个国家必定遭到一次大分裂，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蒋介石先生面临分裂局面，也一定不会从容地去西安，因此历史上也就不可能出现西安事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全民团结抗日的历史势必重写。

就日本而言，他们面对内战不断、四分五裂的中国，便会坐收渔利，其全面侵华的时间表可能比1937年7月7日更早，地点也可能不止于卢沟桥，而其侵略势力也将更为嚣张。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力量将会大大加强，与法西斯相对抗的同盟国力量亦将相应削弱。

总之，如果两广军变得逞，不但中国将陷入内忧外患的深渊，而且同盟国的人民也很可能因为中国无力抗日，而受到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更大威胁，使世界局势更加恶化。史家总是津津乐道某一事件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诸如西安事变和珍珠港事变，都被赋予高度的历史意义。我想，1936年的两广事变，又何尝不可以作如是观呢？只不过，我本人参与解决两广兵变危机的经纬，迄今一直没有被史家发掘罢了！

后 记

以上我把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未曾公开的内幕，如实地写出

来，公之于世。这段秘辛，史书没有记载，民国人物的传记文学没有提到，国共两党的党史文献大概也没有记录。当时知道这段内情的，只有蒋介石先生、何键先生、杨永泰先生、何成浚先生、翁文灏先生、陈布雷先生和我本人。现在这几位先生均已作古，而我已高龄八十六，人生苦短，如果我再不执笔，这段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进程的秘辛，势必永远湮没于历史的浩渺烟海里。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对于两广事变，也没有更多材料可以补充。我只不过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以白头老翁说民国旧事的心情，为历史留见证而已。

